

2935

历史教学

12



9520M

12 MAR 58

1957



圖一 漢画像石紡織圖

約公元二世紀。江苏省銅山县單集區洪樓村出土，現在徐州市云龙山下乾隆行宮。（采自照片）。



圖二 唯物論者王充（公元27—101年），采自“于越先賢傳”。



教 学 参 考

- 商鞅变法与西方秦国以及秦汉统一帝国封建制的成长..... 叶玉华 (2)
- 从烟業看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 唐垂裕 (9)
- 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 陈翰笙 (14)
-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历史..... 吴世璜 (19)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和进步报刊简介..... 文 琪 (24)
- 記1930年九月中国工农紅軍解放吉安城..... 江西吉安高中历史教研組 (30)
-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选輯 (四)..... 耿淡如 譯注 (32)
- 中苏关系史上的新文献..... [苏] A. H. 布洛依娜 (35)

文 物 介 紹

- 略談汉代画像石及其史料价值..... 孙宗文 (37)

教 学 問 題

- 关于繼續學習貫徹历史教学大綱改进教学的几点意見..... 湖北省教育庁教研室 (40)
- 河北省中等学校历史教学情况及今后改进意見..... 河北省教育庁教研室 (43)
- 試談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思维問題..... 刘方义 (48)
- 我怎样依据教学大綱講授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 哈尔滨第一中学 刘 瑜 (52)

× × × × × × ×

- 中国历史参考圖片 (三十六)、世界历史参考圖片 (二十三)..... (封里、封底里)
- 問題解答一則..... 程 丁 (54)

历史教学

• 月 刊 •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号

(总第84期)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
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天津市报刊推广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售: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预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本期印数1—32,700

教学参考

商鞅变法与西方秦国以及秦汉统一帝国 封建制的成长

叶玉华

去年秋有人写论文称述商鞅变法促进奴隶使用制发展^①，今年夏更有人写论文称述商鞅新法为奴隶占有制的法律^②。这些说法都从商鞅变法使秦国公有制开始转变为私有制的角度考察而提出商鞅新法和封建制无关的结论。但是，我们探讨史实却不能不认定商鞅变法的重要性，可从它对秦汉帝国封建土地制成长的影响中看出，并没有具体史实表明商君变法对奴隶制起过重大作用。商鞅变法纵使不是扭转正在发展的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趋势，至少它是通过这种趋势来助长封建制的成长的。依据史料记载，我们只能肯定秦国在变法前，它的公有制早已转变为私有制并发展了奴隶使用制，而在变法后却又导致封建制的成长。下文先从西周春秋时的秦国社会的发展作为讨论的开端。

一 商君变法的秦国社会基础和 历史背景

有人称道秦国在商君变法以前（秦献公时）和变法以后（秦惠文君时），“秦国才开始有市场和货币的出现，这表明变法前商品货币关系并不发达”，从而推论“奴隶制不发达，商君变法没有接触到奴隶使用制度”。又指出变法“首先在经济上彻底破坏公有财产的关系，促进私有财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奴隶使用制的发展”^③，这些论点全不符合史实，我们应该注意下列一些史实。

（1）秦襄公“始国”（公元前771年）至穆公称霸（前659—621年）时代，秦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奴隶制已经发展。

史记秦本纪叙述：襄公立七年，周平王避犬戎东

迁，“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武公十年，伐邽翼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郿，……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按此文称秦文公收周余民，而周余民决非停留在公有财产关系尚未彻底破坏的阶段，因为西周已有“嗟矣富人，哀此穷独”诗句表明私有制已很发达。）又叙穆公夫人滕臣百里奚逃楚，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以为大夫，又“使人厚幣迎蹇叔，以为上大夫”（按皮幣和厚幣虽非鑄造的錢幣，但已具有貨幣的作用和价值）。又叙“晋旱，来請粟，……与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亦在从死之中。”此叙从死者近二百人，有“良臣”，当然是奴隶殉葬。不能誤解为“近亲殉葬制度”系母系家長制的残余風習^④。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秦伯送衛于晋三千人，实紀綱之僕。”

綜觀上列史文表明秦国社会发展到春秋秦穆公时

- ① “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罗祖基：“商鞅变法促进奴隶使用制度发展说”。
- ② “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冉昭德：“试论商鞅变法的性质”。
- ③ 同①。
- ④ 罗祖基的論文認定秦国殉葬制是“近亲殉葬制”，系母系家長制的残余風習，試問“从死者百七十七人”若全系近亲，豈非把近亲都活埋光了。

已使用貨幣，奴隶的使用和贖賣已很发达，甚至遣送到晋国的僕人已多到三千人了。

(2) 秦穆公后至商君变法前的秦国社会

秦本紀：“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晋，車重千乘。晋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按这是私有财产制异常发展后的史实。）后汉書西羌傳：“羌无弋爰劍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羌人謂奴为无弋，以爰劍嘗为奴隶，故因名之。……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荀子大略：“氏羌虜也，不憂其系繫而憂其不焚也。”据此可知氏羌以見虜为奴著名，秦厉公且虜羌之首領爰劍为奴，不难理解，秦霸西戎，实际是战胜羌戎以增广奴隶来源的。詩經秦風权輿：“于我乎夏屋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权輿。”据此知秦国社会已出現“每食不飽”的貧人，怎未能說秦国在春秋时尚未徹底破坏公有财产制呢？

(3) 商君变法前后的秦国一些新措施

从秦簡公时起，就推行下列一些新措施：

簡公六年（前 407 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秦本紀）

七年：初租禾。（六国年表）

惠公十年：县陝。（同上）

獻公元年（前 373 年）：止从死，二年，城櫟陽。（秦本紀）

六年：初县蒲藍田，善明氏。（六国年表）。

七年（前 378 年）：初行为市。（始皇本紀）

十年（前 375 年）：为戶籍相伍。（同上）

十一年：县櫟陽。（六国年表）

由上表可看出秦已推行“租禾”的剝削方式，和筑城立县运动。已經“止从死”的殉葬制度，（不能忽略此事，而誤認殉葬的野蛮的奴隶制社会的習俗流行到商君变法之时和以后）。

从变法起，又有下列一些新措施：

孝公三年（前 359 年）：衛鞅說孝公变法修伍。（秦本紀）

十二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六国年表）

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同上）

十四年（前 348 年）：初为賦。（同上）

惠文君二年（前 336 年）：行錢（同上）（始皇本紀作“初行錢”。）

上面的表，叙明从公元前 407 年經過前 359 年頃的变法改制，到前 336 年，这約近百年中有：（一）

初租禾，初为田开阡陌，初为賦等新措施，都体现奴隶制统治的政治形态的变化，是管理土地人民的新政策。（二）“初行为市”，“初行錢”——在大约三百年之前秦穆公时已有貨幣的記載（如上所引）当然也有市場。我們理解这两条記載中的“行”字^①，战国时語言中的“行县”的“行”字是巡視之义，已有如史記范睢傳：“秦相穰侯东行县邑”，战国策赵策：“赵襄子行城郭”等例子所示明那样。此文“初行为市”“初行錢”只能解釋为“开始巡視所为之市”“开始巡視錢制”。原来早初的市場是自发地发生的，后来政府管理确立的市場便要巡視。早初的貨幣是龟貝珠玉金石，后来发生鑄幣以及仿鑄耕具錢鏹形狀的貨幣称为錢，由于幣值輕重常有变化，所以要巡視。战国策秦策叙載蔡澤称道“商君为孝公調輕重”，便是調剂幣值物价輕重的措施。这在惠文君二年“初行錢”之前二十多年。試問如果惠文君二年“才开始有貨幣的出現”，那末在这之前二十多年秦国尚无貨幣，怎么会有商君“調輕重”的史实？我們認為在惠文君“初行錢”之前，甚至在商君“調輕重”之前，上溯約三百年到秦穆公“厚幣迎蹇叔”时貨幣关系已經发达了。

綜上所述，在秦国已經破坏公有财产制，階級剝削制度已經严重地存在着，奴隶制已經发达了，至少經過三百年才有商君变法的出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去推行商君新法并且实现了社会改革。

二 商鞅变法的緣由和历史意义

商君变法要求秦国富强，“修耕战之教”不能不积极发展小农經濟。在已发生階級剝削、貴族占有土地和奴隶的情况下，奴隶社会里的小农經濟遭遇窒息的厄运，商君新法要求发展小农經濟，正是提高生产力的突破奴隶制生产关系桎梏的进步措施。有关这方面的史实分列于下：

(1) 发展小农經濟的法令和理論

史記商君列傳叙他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举以为收孥”。这样便促进“二男以上”的大家族“分异”为小家庭。并且提示“事末利及怠而貧者，举以为收孥”的惩治条例，其理論根据，正如商君書徠民篇所說：“故貧者益之以刑則

① 罗文誤解“初行为市”“初行錢”为“开始有市場和貨幣的出現”。並未理解战国語言中“行”字的含义。

富”。商君并不希望人民都“事末利或怠而貧”以便好“举以为收孥”，从而发展奴隶数量，恰巧相反，他希望人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貧者益之以刑則富”，这正是发展小农經濟的措施①。商君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这样不仅分解了族居制，而且集諸小都乡邑聚为县以便管理小农土地的經營。其理論見于商君書：

垦令：“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民不賤农則国安不殆。”

农战：“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倉，收余以食素，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

壹言：“富者廢之以爵而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务农。”

这些都說明商君发展小农經濟的基本精神。

(2) 关于奴隶使用制度

商君法令指出：“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列傳）

这是限制宗室貴族占有逾額奴隶的命令。“名田宅臣妾”的“名”字，和汉代“限民名田”的“名”字同义，是按戶籍名目占有的意思②。試看商君書境內篇載：“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者著，死者削。”这就是政府掌握戶籍名数不讓匿名占有逾額奴隶的議論。商君書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注：令商役人众多者必当名应役），則农逸而商劳。”按此文所謂“当名”即限定名額之义。由此可見，商君变法是限制貴族和商人占有逾額的大量奴隶的，必須如此限制，然后才能保証小农經濟的发展。因为貴族奴隶主和商人奴隶主剝削奴隶劳动过多，而有逃避納稅于政府的流弊，从而將賦稅負担轉嫁于小农，小农破产便轉化为奴，这是商君新令所不能容許的。从政治实践和理論上看，商君是和貴族奴隶主商人奴隶主进行斗争的政治家，但应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根除奴隶使用制，而是限制奴隶主利益的法令。商君变法以后的历史，証明奴隶使用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的。

(3) 商鞅变法的重大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的客观效果，导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于秦国。历代学者公認的事实是商君变法在土地所有形态上起了划时代的变化。战国以至西汉时人对此常加称引，西汉时反对封建地主的剝削罪惡的人士，也經常把西汉土地兼井的根源归咎于商君变法。例如史記蔡澤傳叙：“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决裂阡陌以

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农利本，一室无二事，力田畜积。”这显明是发展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哪里是巩固奴隶主占有土地制。汉書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开阡陌。”这样就改革了古代田地換主易居的旧制，而制定了战士賞田并未換主易居的制度即“制轅田”的措施，战士領有田地乃有永業权。汉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上疏：“至秦用商君之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人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商君既从法律上巩固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制度，在土地商品化的傾向中，形成地主經濟的发展。虽然他要求发展小农經濟，但农民經濟的不穩定性决定了农民階級的兩極化，这就导致富农升为地主而貧农淪为佃耕者或隶农的情况。秦国經過了商君要求发展的小农經濟和后来逐渐形成的地主經濟这两个步驟而过渡到封建社会，西汉初又上承秦制所以秦汉帝国的封建制开端于商君变法而大异于兩周的土地所有制。西汉人士討論土地制度时每將秦汉田制和兩周田制区别为两个体系，其真实原因就在这里。

(4) 商君变法的政績和斗争的經過

史記秦本紀叙：“孝公变法修刑……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貴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国。”又商君列傳：商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无盜賊，家給人足”。战国策秦策：“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罰不諱强大，賞不私亲近。……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諸侯畏惧。”

如上所叙，商君的政績既然使得“秦民大悅”，出現“山无盜賊，家給人足”的景象，这当然是挽救奴隶制危机，緩和階級矛盾的后果，决不会是发展奴隶制剝削的，也不会有着促进階級矛盾尖銳化，逼民轉化为盜的所謂“促进奴隶使用制发展”的作用。实际上商君变法时抨击着貴族奴隶主，所以“宗室貴戚多怨望者。”他又抨击商人奴隶主，正如商君列傳所叙：“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战国策秦策叙蔡澤称

① 罗文解說商君变法是促进奴隶使用制的，尚未解析发展小农經濟的情况。

② 罗文誤解“名田宅臣妾”为發展奴隶使用制，是由于忽視“名”字的含义。

道：“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遗存至今的尚有“大良造鞅量”器物，这些都表明商君曾和不法的商人和商业行为进行斗争。不使商业发展受奸商操纵。我们知道，在当时雇佣劳动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商人经营商业不能不使用奴隶劳动而形成商人奴隶主，商君对于他们是采用抨击方针的。

三 商君变法和西方秦国封建制的发生和发展

商君变法，在土地所有形态方面，导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述如上。兹再就封建主义(Feudalism)的具体制度加以论述，并参证以史实，从而不难理解，秦国社会的路向，决非奴隶制的，而是封建制的发展。

(1) 商君新法中有关秦国封建主义的规制——
韩非子定法篇：“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商君调整秦爵为二十级，于是便有各级封建主领有着土地和人民的定制。商君书境内篇：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于)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按此即封建的隶属关系，和奴隶的隶属身分不同。)

又称：

“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虜，六加五千六百。”
(注：“六次加秩可至五千六百石。”按此文“赐虜”即转化为封建主的领民，向领民征粟可以增加至五千六百石^①。赐虜不一定转化为奴，也可转化为领民，说详下文。)

“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赐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显而易见屡次“赐虜”，可以增加对“虜”所征之粟，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等等规定具体表明各级封建主领土领民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后来秦国和西汉初建帝国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主领土领民制一贯遵守而未加以推翻的。荀子议兵篇：秦人赏赐军功有“五甲首而隶五家”的规定，这也是指基层封建主——武士领有的以“家”计数的领民而言，并非奴隶。战国时奴隶已消失了西周那样的以“家”计数的奴隶制度(例如“臣十家鬲百人”的制度)。

(2) 秦国的“出人”“迁人”史实和封建制的“属籍”的关系

上引商君列传叙述商君法令：有军功得为“属籍”的封建制度，就是封建主可以隶属民户而这些民户不再担负国家的赋役。为了推行“属籍”制秦国出现了大量的“出人”“迁人”的史实。

原来“迁人”是国家迁移被征服的人民的政策，春秋时已经流行着了，例如左传载“楚公子申迁许于叶”(成公十五年)。这类事件未必像后来秦用商君变法时的那样结合“属籍”的情况。商君初变法时也曾将“初言令不便，又来言令便者”的人民，“尽迁之于边城”(商君列传)。值得注意的是商君变法之后，“迁人”和“出人”有关，而两者又是结合着“属籍”制推行的。列举史实如下：

秦本纪：惠文君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史记樗里子列传：秦惠王八年，使樗里子“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按此均叙取其地而出其人，可见秦国作战不是为着争夺俘虏以作奴隶，也表明它非奴隶制社会。

秦本纪昭襄廿一年：秦“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这条记载表明所迁之人有“赐爵”者是封建主，又有“赦罪”人便是他的领民，亦即“属籍”。

此类记载见于秦本纪的有：昭襄王五十年，“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这是封建主领有的“士伍”。又廿五年“拔赵二城，……赦罪人迁之。”又廿七年“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又廿八年“攻楚取鄢郢，赦罪人迁之”。史记货殖列传：“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既然是“不轨之民”成为“迁人”后又就成为“属籍”而非自由民可比了。又三十四年，秦以韩魏“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这也表明“迁人”既非奴隶又非自由民，只相当于封建主的“属籍”。这种“迁人”的措施不但引起新占领区的人民财产关系的变动，而且建立新的封建隶属关系。因此被秦攻破的地区人民常有逃亡之事，例如史记王翦列传：秦昭王四十七年，“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因此苏代说秦相应侯曰：“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秦本纪叙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五十二年，周民东亡”。这就是鲁仲连说“秦虜使其民”即赐虜以作

① 罗文摘录上半句“爵吏而为县尉”而删去下半句“六加五千六百”，从而而解说“赐虜”为奴隶，是太不合理了。

領民的情況。也許有人會問“屬籍”是不是奴隶呢？我們的答复是否定的，不但上引商鞅列傳敘商鞅法令已將“屬籍”和奴隶身分的“臣妾”区分开来，而且秦献公十年“为戶籍相伍”，經過二十四年后商君法令規定有軍功者得为屬籍，当然是說人民戶籍可以隶属于有軍功者而作为他的領民。汉書百官公卿表称“秦汉之制，列侯封君租稅，岁率戶二百”，所指称的“戶”应系納租稅的領民而非奴隶。从商君变法时起，秦国“屬籍”制的規定，是和商君改革土地所有形态等一連串的措施密切联系着的。从而秦国建立的农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是在变革社会經济結構和财产关系的基础上實現的。总之，从商君变法以来，秦国在征服六国的战争过程中，通过“出人”“迁人”和“屬籍”相結合的措施，破坏六国原有的社会組織。和日耳曼族当初建立查理曼帝国的封建制度的情况相类似，秦国建立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封建隶属关系，而且“秦汉之制，列侯封君租稅，岁率戶二百”的記載又表明秦汉封建制度是一貫相承的。难理解，商君变法促使秦国发生封建制，后来又发展为秦帝国和西汉帝国的封建制。

四 附論商君新法在法制史上的地位

(1) 西方的周秦旧法和商君变法改制的区别

有人認為“商君土地改革的另一后果，就是由公有制开始轉变为私有制”。把商君法理解为奴隶占有制的法。認定“商君法的藍本是李悝的法經，这种法經和商君法都是奴隶占有制的法，是巩固并严格保护随着过渡到奴隶占有制而形成的私有制。如巴比倫的哈漠拉比法典，雅典的德拉柯法律和羅馬的十二銅表法都是如此”^①。但由本文引証史料的証明，可以使得此种說法难以令人首肯。再就法律和变法改制二事的涵义和作用来看，此种說法也难以成立。首先，这种說法把商君变法改制的內容和李悝法經等同起来，就很成問題。張佩綸老早已指出：“律令与法家有間矣。”（讀史記老庄申韓列傳書后）因此我們不能不考虑到总结旧律令的法經和变法改制的商君法家主張這兩者間的差异。巴比倫、雅典、羅馬的法律何尝有变法改制的意义？焉能和商君变法相提并論？至于李悝法經的內容，正如晋書刑法志所說：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諸国法，著法經。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剋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商君接受李悝法經以治秦的，主要在于捕盜及杂律方面，而这又是李悝“撰次諸国法”的总结性的法典。“諸国”包括李悝所治的魏国在內，均不會像商君所治的秦国那样推行商君变法改制的措施和成就。商君变法使秦富强，而李悝法經就不一定有此效果。因此很难得出結論來說，商君新法的精神和內容等于李悝法經。

其次，汉書刑法志称：“相国蕭何據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这表明由商君变法到西汉建国时逐步形成封建社会，从而西汉不必再来一次变法运动。承認西汉是封建社会的人也就不能否認商君新法是秦汉帝国封建制的主要源泉。問題的关键在于商君为什么要变法，就是由于秦国已經早有旧法，所以商君才去变法。我們知道，在商君变法之前，秦文公二十年（前754年）便有了“三族之罪”一类的旧法，就是例子。不能推测商君是首次为秦国創法，而所創的法就相当于奴隶占有制的法，这样是不符合中国史实的。要从秦国史实考察在商君变法之前的秦国旧法即秦襄公“始国”以来的旧法方才是相当于秦国最早的累积的奴隶占有制的法，“巩固随着过渡到奴隶制而形成的私有制的法。”它可能是習慣法，即使是成文法，也在商君新法推行之后而傳述缺失，仅是部分地为商君新法所吸取，如秦文公“三族之罪”的刑律，为商君吸取而制訂“参夷之誅”的刑律即是一例。至于李悝法經，我們可以肯定它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总结性的成文法典，是巩固私有制的。但是，这也不等于說，它就是最早的第一部奴隶占有制的法典，因为由法經的篇目可以測定其內容并未涉及惩治奴隶的条文。商君以李悝的法經治秦，也不意味着商君的变法改制是巩固并发展奴隶占有制的措施，因为总结性的法經有肯定当时旧制度的精神，而商君变法恰恰是想推翻旧的制度法規習慣的，如上文所論証，它是要求发展小农經济的新法。从商君“廢井田”而井田制被理解为农村公社制的前提出发，不能推論商君新法是把公有制开始轉变为私有制的。因为村社成員对于自己的“份地”已經具有私有權（原始公社尚无私有權，在村社制之前），商君新法破坏“井田”制村社制并不是私有制发生的指标而是依据村社制已經发生的私有制的现实基础拟定发展小农的法令，由是小农經济得以发展，并按田地比例地負担賦稅，所以說“开阡陌而賦稅平。”

(2) 商君新法和秦国社会封建化过程

① “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冉昭德：“試論商鞅变法的性質”。

从商君变法的历史前提上講，在变法前，秦文公便“收周余民而有之”，这些“周余民”早已进入私有制奴隶占有制，关于此事，左傳曾經叙述：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

（昭公七年傳）。此法指明发生奴隶逃亡时大家实行大檢查，这正是奴隶占有制的法。

“周公制周礼……作誓命……在九刑不忘”（文公十八年傳）。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昭公六年傳）。

誰也无法否認周文王、周公的刑法是旧法，已表明其为奴隶占有制的法令用以巩固周族的私有制。后来为秦人统治的“周余民”当然在商君变法之前老早进入私有制奴隶占有制。既然如此，我們認為把“周文王之法”、“九刑”，比拟于哈漠拉比法典、十二铜表法等奴隶占有制的法，较为适宜，而把变更周秦旧法的商君新法看为变更旧有的奴隶占有制和开辟封建制道路的法，也是切合上文論列的史实的。我們知道，世界上任何部族的最早的成文法典都不是在“公有制开始轉变为私有制”时期产生而是在公有制已經轉变为私有制之后写成的。因此我們說，商君新法的出現并不足以証明它把秦国公有制开始轉变为私有制，何况西周和秦人的根据地早在四百年前已有周秦旧法表明这一地区已經进入私有制奴隶制呢。

总言之，秦人在商君变法之前，存在着落后的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这些公社发展到高度导致私有制的发生。春秋时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已知使用战俘为奴，从而形成奴隶制政权。商君变法破坏了村社制发展小农經濟，推动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君变法限制贵族奴主、商人奴主占有过多的奴隶，并且獎勵立軍功者給以領土領民，这样就促进秦国封建制的成長，从而形成后来秦汉帝国封建制的先行阶段。

五 汉初封建制是战国时秦国封建制的繼續和发展

依据董仲舒上疏称述，自秦用商君变法对土地的私有和买卖起着保証作用，客观上导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等地主經濟发展的情况，这种情况“汉兴循而未改”。由董氏这些詞句，可以見到汉初是繼續秦代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发展的。王莽始建国元年的詔書更指出：

“秦为无道，……坏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馬同蘭（欄），制于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为利，至略卖人妻

子。……汉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罢癘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实什稅五也。”

原文列举“秦之无道”：一为廢井田是指商君，二为买卖并屠杀奴隶①等情并不一定始于商君变法（上文列举史实已肯定此点）。为了进一步理解商君变法的历史作用是在改革土地而非在于发展奴隶使用制度，必应參閱王莽改革失敗后有人曾提出的总结，如汉書王莽傳叙中郎区博諫莽曰：

“井田虽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灭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复千載絕迹，虽堯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漸，弗能行也。”

这些话并未強調奴隶制发展是秦用商君新法的后果，而是郑重申明商君变法导致的秦国封建的土地制度具有“順民心”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性，甚至到西汉时仍被認為是“海內未厭其敝”的封建制上升期的制度。因此我們尊重客观史实却应考察秦代和汉初的封建制的連續性，而从下列各方面加以討論。

从封建主的領土領民方面看，商君列傳曾叙：

“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郢。”这就是領有徒属和邑兵的封建主的叛乱行为。韓非子定法篇叙：“秦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韓八年乃成其汝南之封。……故战胜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此文指明秦国封建主的“私封”的发展。秦始皇統一后，虽然“不立諸侯樹兵”但有軍功的將士仍得領其封邑食其租稅，此制延續至于汉初，例如汉書公卿表曾叙列“爵一級曰公士”至“二十曰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劳”。我們知道，春秋时楚封大臣以土地，三世即收回。孟子也称道古制“臣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凡此均表明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君，而自秦的大臣領有“私封”后即具有土地私有權。西汉初期封侯食邑制推行更广，封建王侯均对封邑握有私有權，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六引楚汉春秋：

“汉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鉄券曰：使黄河如帶，

① 罗文摘引莽語“秦为无道”一段而略去“坏井田”四句有关土地改革的文辞，仅抄录“又置奴婢之市”六句用以說明变法促进奴隶使用制，这种引用史文的态度是不够嚴肅的。因按原文“又置奴婢之市”的主辞，毫無問題，是首句“秦为无道”的“秦”字，“秦为无道”並不一定开始于商君变法。在他以前的秦国可能已經“置奴婢之市”了。

太山如礪，汉有宗庙，尔无絕世。”

原来从汉高祖时就作出这样的规定，王侯永世領有封邑的土地和戶口并享用其租稅。張錫瑜“史表功比說”推究当时受封的領主近百四十人之多。例如樊噲从击秦軍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从攻項羽至滎陽，益食平陸二千戶，項羽既死，益食八百戶，从破燕執韓信，受封为舞陽武侯，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又如陈平从刘邦至平城，为匈奴所圍，用平奇計得出，乃更以平为曲逆侯，曲逆見五千戶，尽食之。其后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封曲逆獻侯五千戶。甚至有封數百戶的，例如楊武以郎中將，汉王元年从起下邳，击夏陽，以騎都尉斬項羽有功，封吳房壯侯七百戶。这是由于“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汉書地理志中語）。和商君以来的秦国“迁人”“出人”“屬籍”的情况有相类似处。这些汉初封侯領戶的例子足够說明封主的領土領民实际情况。可見“秦汉之制，列侯封君租稅岁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万，朝覲聘享出其中”，这种記載真实地反映着秦代汉初封建制的連續性。史記平淮書：“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廩與服僭于上，无限度。”这說明汉初封建貴族領主在禮制上有僭越天子的物質享受之处。西汉遭受封建剝削的农民，如晁錯上言所描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时之間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养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急政暴虐，賦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賣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償債者矣。”

（汉書食貨志）

淮南子主术訓：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曉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

食之。时有滯旱灾害之患，无以給上之征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

西汉文帝景帝时屢減土地租稅，然而实际上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私租尚未随之减少，所以荀悅汉記特別指出：

“今汉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逾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逾大半之賦（按此指地主私租），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能正其本而务除稅租，适足以資豪强耳。”

这些话清楚地指出地主封建剝削的严重性，“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这句话正指明西汉地主剝削是繼承商君变法以后的秦国地主剝削制度而繼續发展以致露骨地呈現其殘酷性。

从田畝制度和农民担負上看，周田以百步为畝，而秦田以二百四十步为畝（說文晦下云“秦田二百四十步为畝。”通典州郡門云“商鞅佐秦改制二百四十步为畝。”）。再看汉代，据鹽鐵論未通篇載：

“古者制田百步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借一，必先公而后已，民臣之职也。先帝（武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由此可見，秦田二百四十步为畝的制度至汉武帝时也推广施行。秦汉的田畝制度和周代的大不相同。鹽鐵論又叙說：“田虽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口賦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农民所受的封建剝削如此严重，也源出于秦制，“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汉書食貨志）汉初的田賦更徭之役的沉重即出于此。在上述諸汉制承襲商鞅变法后的秦制，都不是偶然的，乃系商君变法导致秦代和汉初的统一帝国封建制度的必然的后果。

从烟业看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

唐 垂 裕

一 帝国主义对华卷烟输入

我国种植烟草的时间至今约四百多年。根据历史记载，烟草是一种外来物，盛产于菲律宾。明嘉庆年间，我国海上交通线逐渐开辟，海外贸易随着有了一定的发展，就在这时，烟种传入我国①。传入之初，仅在澳门、福建、台湾等沿海各地种植。到了清代，才在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山东、热河、甘肃……等全国各地普及起来②。

从菲律宾传入的烟种，称为淡巴菰，其主要用途是制造各种水烟丝和作为旱烟的原料。在我国，人们于明末清初才学会吸食水烟或旱烟。起初只是一些行商富贾的奢侈品，清以后，吸烟的习气便普及全国各地，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不可少的嗜好品了。这是卷烟传入以前我国烟草史上的简单轮廓。

在中外贸易中，烟草进口见于海关表册，还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即1895年，输入数目约值二十余万两③。这时，卷烟在中国还处于商品的试销过程。吸食卷烟的还只限于大城市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买办商等上层人物，一般人没有吸卷烟的习惯。这不能不给外国卷烟在华推销带来困难。为了开辟市场，帝国主义分子用尽方法在我国进行各种调查，以推进商品的销售工作：如经调查，发觉我国人民的购买力水平很低，便采取小包装（每包五支）和托马斯的薄利多销政策，因而对华烟草输入进展很快，下表④可以看出，烟草输入的增长速度。

单位：万两

年度	烟草输入值	输入总值	占输入总值百分比
1895	20	17,170	0.115
1900	100		
1906	790	41,029	1.9
1911	1,000	47,150	2.1
1916	3,000	51,641	5.8

当时，广大的中国农村，虽仍保持原来吸食水烟和旱烟的习惯，但在城市及交通要道，已逐渐改吸卷

烟了，这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的卷烟推销政策已经完成了开辟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上表的烟草进口统计中，包括纸烟、雪茄和烟叶，在1895年至1917几年，大致以纸烟进口为最多，雪茄次之，烟叶最少，进口速度最快的也是纸烟。到1919、1920……以后，纸烟进口值却逐渐降低：1917年纸烟进口数值为3100余万两，雪茄亦增至五十八万余两，1918、1919、1920年纸烟进口数值不过2300万两，1921、1922年也不过2800万两，1925年竟下跌为1700余万两⑤。但烟叶进口则逐渐增加。半殖民地性的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某些工业原料的供应地，为什么在烟草对华输入中制成品的卷烟输入相对减少，而作为原料的烟叶输入却相对地增长着呢？这里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经济侵略内容，留待下节分析。

在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卷烟输入时，我们不应该轻轻地放过美国帝国主义。因为它在对华输入中一直占着首要的地位。甚至处于垄断的地位。下列两表⑥就明确而尖锐地指明了这个事实。

历年进口纸烟比较表（单位：百万枝）

年度	由美国进口数	由英国进口数	由香港进口数	各国进口总数
1910	532	2,112	217	3,723
1914	206	4,480	368	6,130
1919	4,239	153	707	7,771
1923	8,197	518	400	10,116
1924	7,994	543	625	9,753
1925	4,951	654	636	6,490
1926	6,613	533	80	7,739

① 参看“中外经济周刊”第46页。

② 参看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第134—135页。

③ 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历年烟酒输入价值比较表。

④ 武增干编：“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79—80页及注③。

⑤、⑥ 同注④。

1923—26年烟叶进口表

單位：万海关兩（总計中包括朝鮮）

年份	美国	香港	日本	总計
1923	1,050	102	35	1,233
1924	2,250	153	57	2,431
1925	1,740	177	40	1,960
1926	2,307	107	33	2,557

从这两个表中，大致可以看出三点：（一）美国排挤了它的劲敌——英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华贸易都是首屈一指的，1914年紙烟輸入为美国的二十倍，战后，美国则反过来超过英国二十倍。其原因是由于英国战后无力恢复在华原有的经济地位，美国的经济实力却继续增长，因此，英国对华输入的优势便为美国所代替。（二）不仅美国对华紙烟輸入占优势，即烟叶輸入亦占重要的地位。上列第二表1923至1926年美国烟叶輸入占历年中国烟叶总进口百分之九十左右。直至1939年和1940年，各国輸入中国的烟叶总值为7,700万磅，8,700万磅（海关统计），而美国独占的英美烟草托拉斯輸入烟叶达6,400万磅（1939年）和5,300万磅（1940年），占輸入总值的84%、61%。这就表示了美国对华烟叶輸入的壟断地位①。（三）从上面两表可以看出，二十年代以后对华的紙烟輸入在减少，烟叶輸入却在增加，这表明我国内地紙烟設厂制造已有发展，当然主要是外資在华設厂。但是，紙烟輸入降低的趋势是十分缓慢的。这又说明帝国主义在直接投資建厂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商品輸入的侵略方式。

二 外資在华設厂及对烟农的盤剥

紙烟輸入的减少和烟叶輸入的相对增加，表明外資已在中国設厂制造，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以攫取高额利潤。在华設厂的外資企业先后有日本的东亚、东洋，美国的大美、花旗、美迪，意大利的宝大，希腊的錦华、杜河、健身等等，在卷烟輸入上一向占壟断地位的英美烟草托拉斯②，也很快地轉而在华設厂，在1908年建立汉口烟厂，1909年在东北建立奉天烟厂，1915年扩建上海浦东烟厂，吞并了哈尔滨烟厂，1922年成立天津烟厂，1925年成立青島烟厂……等共十多个。

这样多的外資卷烟制造厂在我国設立起来，当然需要日益增多的原料来供給，这就是烟叶进口增加的原因。烟叶进口愈多，制造出来的卷烟也愈多，照說应相对地减少卷烟进口的需要。可是，商品市場在发

展，卷烟的銷量日益增大，原料的需求也愈益迫切。攫利无厭的外國資本家，这时开始考虑一个问题：还是繼續增加烟叶的輸入以供制造呢？还是在中国种植烟叶以就地取材为更有利呢？显然，在中国适当地区种植烟叶，可以比輸入烟叶减少运输費用。同时，由于烟叶在中国种植，生产成本远比在美国为低，加上外国資本家資本雄厚，可以压制中国民族資本的发展，可以更有利地操縱收購价格。这許多有利条件，成了英美烟草公司在华发动种植烟叶的前提，于是，我国一向生产粮食的某些地区，开始成为播种外国烟种的沃壤，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就开始成为外国資本主义的农奴了。英美烟草公司同时也就在这些地方进行原料收集，設立烤烟厂，如安徽鳳陽的門子台烤烟厂，河南的許昌烤烟厂以及山东濰县二十里堡的烤烟厂等。还創立中国包裝公司、运銷公司（Y. T. T. D.），連印刷包裝紙也有自己的公司。因此，英美烟草公司从原料收購到制成品的生产，以至包裝运銷，形成了一个極其完备的经济侵略体系。

英美烟公司的資本約三千六百万磅，每年生产多至五百四十三亿支③，运銷量最多时約占中国卷烟全部运銷量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原料收購上占中国烟叶的百分之六十④。因而，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烟草工业史上，英美烟草公司是掠夺我国人民的财富的主要魁首。

外資在华設厂，利用移植中国的美种烟草，雇用中国工人，生产卷烟，再向我国推銷。这就是他們用較少量的資本，从中国取得巨大的利潤。在1926年，英美烟公司所得利潤为六千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我民族資本烟公司資本总和一千五百四十六万元的四倍弱。如此对比，其利潤收入就显得十分惊人了。

显然，英美烟公司所获得的无数千万的利潤都是对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榨取。由于中国人工低廉，工資比任何国家都要少，榨取的剩余价值远超过在本国或他处設厂制造。但是，一当经济危机来临，产品銷

① “中国烟草月刊”第三卷第二期，第541頁，慕鍾鼎譯：“英美在华烟草托拉斯調查報告書（續）”。

② 英美烟草托拉斯是一个国际烟草壟断組織，成立于1902年，本店設于倫敦，是英国威尔斯公司和美国香烟公司長期競爭互相妥协的結果，拥有資金三千四百万磅，各地設有子公司及旁系公司。在华設有駐華英美烟公司、掌握其他子公司如頤中烟草股份公司、花旗公司、頤中运銷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③ “中国烟草月刊”第三卷二期，第540頁。

④ “中国烟草月刊”第三卷八期第731頁及第三期第542頁。

售受到影响时，他们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把已经很低的华工工资再减低下去，这样来维持他们的巨额利润。下面是英美烟公司残酷地剥削我国工人的一些记载：1934年5月28日申报说：“浦东英美烟公司于本年上月间，借口营业清淡，未及一月，连续减工三次之多。始由每星期六日改为五日、五日改为每星期四十小时，又递减至三十六小时，……孰意公司竟以我工人为可欺，突于本月十二日将公司首创老厂无故封闭。”同年五月十九日的新闻报写道：“窥公司的用意，无非以老厂工人工作最久，工资最大。今日停厂，既可省去大批抚卹金，将来复厂之日，雇用新工人，工资既可减少，工人亦可减少。”^①新闻报指出，公司说生产过剩而停厂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加强对华工的榨取才是真正的目的。“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从这件事例可以证明。

但是英美烟公司在华设厂对中国工人的压榨只是“血和污”的一部份。比这种压榨更为残酷的是对我国烟农原料生产的掠夺。

外资在华卷烟企业，如果原料完全从其本国输入是不合算的，利用我国当时的淡巴菰烟叶作卷烟原料又不合用，因此着手在中国移植新烟种。民国初年，英美烟公司派人在山东、安徽、湖北、河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和试种美国加里佛尼亚烟种以后，于是便以高价收购的办法引诱中国农民种植美烟。同时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定期贷款。由于农民在反动统治下十分贫困，挣扎在饥饿线上，为了生活，便也开始种植这种不可靠的赌博性的烟叶。因此，种烟面积日见扩大，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省成为美种烟叶的主要产区，其他湖南、广东、东北等地也产一些，但数量不多。其中河南是全国最主要的烟产区，河南1947年的种烟面积达到约六十五万七千四百二十亩，所产烟叶最多时可供全国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七^②。各地种烟面积的增加，促使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农民日益脱离粮食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性随之加强，也就是烟农被牢固地贴在帝国主义、买办商的剥削链上了。

据山东调查，除了种烟面积日见扩大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农家种烟面积随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种烟是极费人工的事情，一般有十亩地的中等农户最多能种三、四亩（当地是大亩，一亩约合三市亩），富农也只能种五、六亩，地少经济能力薄弱的贫困农民种烟面积的比例倒反来得大，有时甚至连零星的土地也种了烟^③，在安徽、河南、湖北等地，情况也大致差不多。愈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下层农户，他们也就愈将希望寄托于种烟上，因此，他们所受的剥削程度也就最深。

种烟需要较复杂的农作技术，需要付出较多的成本费。抗战前普通一大亩的烟叶种植，除人工以外约有下列开支：烟苗需三、四元，肥田粉或豆饼十五元至二十元，烤烟用煤二、三十元，租炕一、二十元^④。一般贫苦农户常以赊取方式忍受高利贷的盘剥，如豆饼一片的现售价是五角五分，而赊取则需七角；煤每百斤现售八角，赊取就需一元，赊取的时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并需请担保人保证。

除上列各项种烟费用外，还有耕牛、农具等等。富农有着足够的生产资料，有的还兼放高利贷，中等农户可以不受或少受高利贷的盘剥，只有贫农负担最重，除了忍受高利贷剥削外，还要向地主交纳地租，因此贫农的种烟成本是最高的。

当新烟上市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所设立的收购机关便首先用抬价的手段排斥中国民族资本的烟公司，使之不能同时同地收购烟叶，以取得在收购上的垄断地位，然后，根据供应情况尽可能将烟价压低到最低限度。洋人看货定价，烟农没有讲价的余地，一筐不愿出卖，其他各筐就不能售出。为了不窒息利润来源，有时故意将烟价提高一点，用私造的大磅秤进，烟农反受巨大损失，特别是提高了收价以后，造成烟农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外国烟公司便大肆压价，常使烟农宣告破产。例如1917年英美烟公司在许昌以每磅四角八分的（折合当时物价可买十几斤麦）价格收购，1919年压价至每磅八分，坏的每磅三分，最差的一分半，使烟农无不亏折，贫农持此为生计，陷入绝境。刁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收购快结束时，却又故意提高烟价，上等烟每磅两角八，中等每磅一角八，差的不到一角^⑤。用这种欺骗方法使已受损失的烟农，寄一线希望于明年，继续种植，以便帝国主义长期的剥削。血的事实表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毒辣手段：如1919年新烟上市时，英美烟公司一连关门几月，及至看到获得暴利的机会已经成熟，才派出走狗四出宣传开始收购，许昌附近十几县的数百万烟农在生活逼迫下，闻讯从各处赶来，美英帝国主义却又故意推说款子没到，延不开磅，使烟农在雪天中一连等了几夭，冻死了十四条人命，五十二头牛和骡。烟农毛福顺没有卖掉烟叶回到

① 引自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卷，第94页。

② “中国烟草月刊”第三卷七期，第713页。

③ “中国农村”第一卷十一期（1935年8月号），第71页。

④ “中国农村”第一卷十一期（1935年8月号），第71—72页。

⑤ “许昌烟叶血泪史”，人民日报1951年1月24日。

家里，兒媳四处張罗，借不到一粒粮食，一气之下，煮了一鍋烟叶，吃饭时毛福順見煮的是烟叶，便抱怨悬梁自尽，他的兒子和兒媳也相繼寻短路而惨死了。留下来的是一個殘弱老婆和兩個幼小的孫兒^①。這筆血債，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農產品所製造出來的慘案何止百十次，這不過是其中一項較突出的罪惡記錄而已。

銀行、錢莊和販運商人是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人民的得力助手。在山東濰縣，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實業銀行均設有分行，還有官錢局和二十五家錢莊，河南、廣東各產烟區也不例外，烟叶上市時，銀行、錢莊便供給英美烟公司所需鈔票，中國銀行青島分行在該公司有辦事員，濰縣錢莊以送鈔票賺“腳步錢”為主要業務之一。不管他們功用如何，都同是為帝國主義服務。錢莊與外國資本收購處還勾結進行額外的剝削，當烟農賣烟時，收購處叫烟農到指定的錢莊領錢，錢莊付給不等價的地方紙幣，例如平市官錢局錢票在市場使用每元比通用銀行鈔票要差一百文^②。其次，烟農賣烟也在預購的方式下慘遭盤剝，預購是通過販賣商來進行的，販賣商從錢莊領取資金，把現款用高利貸借給烟農，以低於一般的价格向烟農定購未成熟的烟叶^③，然後轉賣給烟公司。這樣，錢莊、販賣商一面為帝國主義盡了收集烟草的功能，一面參加了對烟農的剝削，構成帝國主義殘酷掠奪中國農村的支柱。

三 英美烟公司的推銷制度及其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傾軋

在商品推銷過程中，英美托拉斯在華建立了一個遍及全國的推銷網，有自己公司的直轄推銷地區，有所屬買辦企業的推銷區，制度十分嚴密。英美烟草托拉斯的制成品，由其子公司頤中烟草運銷公司承銷，頤中烟草運銷公司擁有自己的推銷系統：十五個“甲級經銷人”是其在各城市的直屬代銷組織，向“總經銷人”發貨，所收貨款直接上繳。總經銷人在經銷售價上加上利潤百分之一、二，派銷給批發商，批發商又加上一定的利潤發給零售商。甲級經銷人亦有兼任總經銷人者，批發商亦有兼為零售商者。但各級推銷組織必須嚴格劃定所屬銷區按照組織層次行事。推銷得力者歷年有獎^④。因此，英美烟公司通過這些組織可以掌握各地市場行情，按各地所需的香烟品類與數量及時運送，加速商品的流通。

永泰和烟草公司是一支買辦性的巨大推銷組織，它完全仰外資鼻息，從頤中運銷公司領取商品，收取一定手續費，它忠实地替帝國主義服務，從而鑄成了

它的巨大財富^⑤。

英美烟草托拉斯的推銷網除新疆、康藏高原、東北外，差不多深入全國各地^⑥。外國資本在華發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國民族企業遭受厄運的历史，中國民族企業競爭不過外國資本侵略勢力的原因很多，我們從香烟業方面可以找出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外國香烟享受低稅待遇，而民族資本則無此權利；一是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小，資金不足，缺乏與外國資本的競爭條件。

外國香烟（包括外資在華企業的香烟）繳納的烟稅十分輕微。1901年到1915年是按海關稅百分之五和子口稅百分之二點五繳納的，此後北京軍閥政府和南京政府雖然對香烟稅有各種規定，但是，外國香烟的繳稅却經常受到寬待。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開始征收香烟統稅，為了勾結帝國主義，訂立了極不公平的香烟稅率，1927年英美烟公司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下，以供給國民黨反動政府“剿共”經費為條件，要求改變烟稅制度，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多級制稅率改為少級制稅率，起初由九級征稅改為七級征稅，1930年十月又將七級改為三級，1932年又將三級改為二級^⑦，這樣就大大地便利了外國帝國主義香烟在華行銷。因為按多級制稅率計征，烟價愈高，稅率也愈高，這對於以製造高級烟為主的英美烟公司和其他外資企業是不易討得便宜的。反之，中國民族企業多製造低級香烟或中級香烟，在多級制稅率下可以適應較低稅率。現在改為二級制，高級烟的稅率只一種，低級也只一種，這樣必然加重中國民族企業的納稅負擔，減輕外國企業的負擔。試看：“在三級稅時代，……英美銷售箱數及其他公司的四成，不及五成。在二級稅時代……則英美銷烟數量已比諸其他公司超過4,485張（五萬支貼印花稅一張）即增至加一。”顯然，銷量是大增了。但從其負稅情況來看，“在三級稅時代，英美烟公司每月平均納稅數目為2,417,403.82元，其他公司平均納稅為2,006,252.65元。在二級稅時代，英美烟公司平均數目為2,726,392.52元，其他公司為2,554,466.99元……”^⑧。同時華商企業在統稅之外，

① “許昌烟叶血淚史”，人民日報1951年1月24日。

② “中行月刊”第四卷第三期（1921年3月份）齊行、陳德人：“山東烟草產銷調查”。

③ 嶺南大學調查報告，轉自“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一卷，第97—98頁。

④、⑤、⑥、“中國烟草月刊”第三卷六期，第668—672頁。

⑦ “中國經濟年鑑”，商務印書館版K577頁。

⑧ 華商捲烟廠24家聯名呈請修改稅制文，“申報”1934年3月20日，引自“中國經濟論文集”一卷94頁。

还要交纳各地的苛捐杂税,而外商则可免纳。

当七级税制改为三级税制时,民族资本在高额赋税压迫之下,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修改税制,但宋子文的答复是说外国人尚且愿意纳税,而中国商人却不“爱国”。1932年,英美烟公司公然宣称将机器卷烟税全部包了下来,以示拥护二级税制,并祝贺宋子文财政外交的成功。宋子文打击中国烟草业并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恶毒阴谋,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的极端反动性,也说明了半殖民地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运。

就资金规模来说,民族资本是小得可怜的。六十家的总资本约一千五百四十六万元。而英美烟公司一家的总资本为三千六百万英镑,折合旧币四亿元左右^①,也就是说,英美烟公司的资本约为六十家民族卷烟企业资本的二十五倍。这样小的资本,在各方面都不能抵御外国企业的排斥,当然更谈不上竞争了。我国最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工厂亏损也曾一度依靠英美烟公司,其他小的企业在外资企业的倾轧下多纷纷倒闭,能够继续开工的,也多半依靠美国的烟草、外国纸烟、玻璃纸和香精来进行生产。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扼杀下,中国民族卷烟企业的经历是艰苦的,表现了一段挣扎过程。它们只能在人民群众反帝高潮对外执行经济绝交使外资企业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时不能开工的空隙中,或因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而致外国资本无暇顾及的时候,才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在1924年,民族资本烟厂仅有十四家,1925年著名的五卅运动形成了全国反帝高潮,民族资本的烟厂,一鼓作气增至一百八十二家,但到1928年又减为九十四家,1929年再减至七十九家,1930年为六十五家,1932年仅存六十家^②。此后还在陆续倒闭。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卷烟工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1932年,许昌王杰亭设立第一架卷烟机,这家烟厂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生产的。半年后被发觉,结果财产遭没收,经理入狱。以后虽搬至农村开工,但几年间从范坡搬到石固,从石固搬至繁城,再由繁城迁至糾城,先后被发觉二次,受到了四千元以上的巨额罚款^③。这一事例说明在反动政权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处境。

我国近代烟草工业的发展,烟草经济作物的发展,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近代社会一般企业的发展相一致的。烟草侵略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中的一环。一开始,帝国主义就以垄断组织的形式出现。在收购、生产和推销过程中垄断了中国市场,剥夺了我民族卷烟工业发展的生机,迫使广大农民贫困破产。中国买办势力是紧紧地依附外国企业发展起来的,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体系的一成员,反动政府

出卖民族利益给外国帝国主义企业以种种特权,也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扼杀民族资本企业的帮兇。所有这些都是我国近代半殖民地社会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本文承彭雨新教授热心指导,甚表谢意。)

① “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一卷,第65页。

② “中国经济年鉴”K575页。

③ “许昌烟叶血泪史”,人民日报1951年1月24日。

(上接第42页)有些历史教师,通史基础较好,业务水平较高,就可作两三年以上的规划,系统进修。

此外,教师提高的一个更切合实际的重要途径是积极参加教学研究活动。开展好教学研究活动的主要问题在于历史教研组和历史教师重视这些活动,并在已有的基础上共同努力。那种认为参加教学研究活动不能提高业务水平的看法,是不对的。为了保证教学研究有所收获,当前应该很好开展下列的活动:

(1) 互相听课。这是历史教师平时相互帮助,共同提高业务水平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必须注意课前认真准备,听课后再认真研究,避免流于形式。

(2) 公开课。举行公开课,对于讲课教师和参加的教师,都是有好处的。要使公开课有一定的质量,必须注意:每次公开课要有明确的目的和要求;讲课教师和参加的教师都要有充分准备;认真听课和开好评议会。如条件许可,可试行小单元的公开课,较系统地研究教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3) 专题研究与专题总结。在学期之初,教师可就教学问题中确定一个专题以较长的时间(最好是一学期)进行研究,然后加以提炼总结,不仅教师自己可以得到提高,这些研究与总结也是历史教学中的“财宝”。历史教学问题中如关于大纲的学习,单元教材的研究与处理,课堂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历史教学法的改进以及历史教学理论的研究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的重要问题。

至于历史科学理论和教育理论方面的知识,作为历史教师的业务进修来说是不可少的,在要求上可因人而异,一般也可先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入手,有步骤地进行学习。

历史教师的进修提高,是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是历史教师艰苦学习实践的过程,因此还希望历史教师根据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个人的或教研组的进修提高计划,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加强团结,坚持不懈地努力,以逐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从而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

陈 翰 笙

第一个英国人到印度的是湯麦斯·史蒂文斯，他在1579年赴果阿，去当天主教傳教師。过了三十三年以后，英国商人始在苏拉特建立东印度公司。从那时起英国海軍不但遏制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人在海上的势力，并且到1757年英国在印度战败了法国。此后莫臥兒王朝就逐漸向英东印度公司低头。

英人在印度战胜法人的一百周年时，印度人大起抗英。在这大起义前七十余年内，英人确已統治了印度大部分地方；而当这大起义失败时，曾經統治印度三百三十年的莫臥兒王朝也就灭亡了。英国駐印的第一任总督赫斯汀斯在1750年到达加尔各答；三十多年以后他就說，英国在印度几个省份內的統治权已无法可以隱蔽^①。到了1813年，駐帝俄的英国大使格蘭維爾伯爵更說，英国王室已成为实际統治印度的权力。从那年起，东印度公司的权威逐漸下降；而英国議院的权威在印度逐漸增長。从那年起，英国的工業資本开始投放到印度^②。但拥有商業壟斷資本的东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才解体。我們可以說，随着抗英大起义的失败，不仅莫臥兒王朝灭亡了，东印度公司也就此結束。

这个划时代的抗英大起义，比过去 1764, 1806, 1816, 1824, 1831, 1844, 1847, 1849, 1851, 1852, 1853, 1855年各地的起义規模大得多。大起义的那年印度人口約有二亿左右，每六百八十余人中就有一个武装兵士。但那年的印度兵士虽从233,000人增加到257,000人，駐印的英国士兵却从45,000人减至36,000人^③。这样，印兵和英兵的比例从五比一上升到七比一。据一位英国在印度的武官說，当时英兵减少并非構成大起义的原因，但他以为如果英兵能增加20,000人的話印度人还不敢起义^④。在大起义以后，在东印度公司解散以后，英国的政策不仅是拉攏印度剩下來的土邦酋長，使他們一面效忠于英人同时也加紧剝削人民，并且把印度兵士减少而把英国駐軍增加到65,000人^⑤。

从維多利亞女王和駐印总督康宁伯爵的信札往来中，我們也就明白英国当时在印度增兵的政策。維多利亞女王在1857年六月二十九日写道：“英帝国在最

近二十年内已經加倍地擴張，但女王的部队还依然如往昔那样少”。她主張借印度大起义的机会扩大軍备。同年七月四日康宁和她写信說：“从印度情况看来，英国权威这次受到損害。如果要重新振作，恢复帝国的名望的話，非要在全体印度人面前摆出英国人的实力不可。要使印度人觉悟到反抗是无用的，才会有安全的保障”。

印度大起义爆发时，英、法、美、俄四国早在我国共同策动1856至1861年的第二次鴉片战争。主持这一次对我侵略战争的是英国額尔金爵士。当他率兵东来于1857年六月三日路过新加坡时，他忽然收到康宁伯爵要求調兵援助的信。这样，原来要到中国参加侵略的一大部分兵力，就移到印度去鎮压印度人了。英軍在1856年十月二十三日开始进攻广州，因为兵力單薄直到次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英法联軍才攻入我广州市^⑥。英法联軍入广州时，印度大起义已經挫敗。因此法国的拿破崙第三不曾敢于乘隙侵英，而比利时要派一个分遣队到印度去援英和美利坚合众国要派五万名志願軍同样去援英，都被婉詞拒絕了^⑦。

当1857年五月印度大起义爆发时，对帝俄的克里米亞战争（其中英軍曾死亡二万五千）已經結束了將近八个月。从1856年十一月开始的英国侵略波斯的战

① Philip Woodruff, "The Men Who Ruled India", London, 1953, Vol.1, p.379.

② R. Mukherje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Berlin, 1955, p. 246.

③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Vol.14, p.446.

④ Woodruff, 前揭書, Vol. 1, p.387.

⑤ A.L.Morton, "A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51, p.469.

⑥ 夏燮：“粵民义师”，見“中西紀事”13卷。魏建猷：“第二次鴉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頁。季美林：“試論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起因性質和影响”，見“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第32，34頁。

⑦ "The Times", London, August 19, 1857.

爭，也在印度大起義爆發前兩月已經停止了（1857年三月四日英波和約在巴黎簽訂）。因此，倫敦泰晤士報說：“不久以前，印度的奧德省（即現時北方省）和平地歸并給東印度公司，西北方面的旁遮普省也已變為附庸。這次叛亂又幸而沒有在克里米亞戰爭或波斯戰爭時期同時發生。”^①英國基督教青年會創辦人之一，久在下議院做工人福利工作的夏夫斯伯利伯爵（1801—1885年）也曾說，印度大起義的時會太幸運了，“好像上帝在那里屈指計算的”^②。他的意思是那時英國有足夠的力量去鎮壓印度人民，起義是無效的。

我們再要看看，當時英國內部是個什麼局勢。從1836到1848年十餘年間，英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進行了要求用選舉票選出議員並要求實施無財產條件的成人男子選舉權。這是英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民權運動。法國1848年的革命給予英國社會很大的影響。恩格斯曾說過，“勝利的法國工人們的社會主義宣言和口號嚇倒了英國的中產階級，也瓦解了實事求是的英國工人運動。民權運動不等待1848年四月十日被壓倒，而它內部早就無形中崩潰了。從此工人階級的活動被沖到後面去，而資本家却長驅入勝”^③。

那時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而領導這個民權運動的是一位英人，名叫瓊斯（Ernest Charles Jones, 1819—1869年）。他父親曾任駐德的軍官，他自己出生於柏林並在德國受過教育。他是馬克思的好友，馬克思到倫敦後常和他往來，他們二人也有許多相同的見解^④。瓊斯於1848年四月十日率領三萬人到英國眾議院為改革憲法而請願。群眾當場被武裝警察所驅逐，瓊斯以叛國罪名被處徒刑三年。民權運動遂告中斷。當瓊斯在獄中時，他曾寫了幾篇文章反對英國統治印度。他在1851年聽到印度起義的消息，就用他自己指頭的血寫著一首詠史體的詩，題為“印度斯坦造反”。當時獄中無紙，他就從基督徒禱告本上撕下一頁來寫這首詩。出獄後，特別在印度1857年大起義時，他更寫了好些文章和做了許多演講來支援印度人民正義的抗英運動^⑤。

但當印度大起義爆發時，像瓊斯這樣同情的人已不多見，因為那時英國工人運動早已進入銷聲匿迹的時期。從1848到1868年那二十年內，英國的工商業獨霸於全世界，幾乎所向無敵。英國在海外剝削所得，足夠分給國內的工人階級。因此工人們生活有些提高而無意於革命運動。那個二十年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彷彿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十年中的美國（1945—1955年）。難怪馬克思在1858年曾帶著不甚高興的語氣寫道：“英國的無產者日愈走向資產階級，因

而在这个世界上資本主義最濃厚的國家就會出現一個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階級，一個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和一個資產階級本身。作為一個剝削全世界的國家來講，當然這是有幾分正當的道理的。”^⑥

儘管整個英國資產階級在那二十年內享受了他們的黃金時代，印度的大起義還是震驚了它們。1857年七月十一日倫敦的泰晤士報有社評說：“目前銀行中的硬幣繼續不斷地增加而農產丰收又可預測，交易所衰退的現象幾乎是空前的。然而比這些問題更使人焦急的，就是印度方面傳來的消息。萬一沒有好轉的希望，可能造成恐慌”。有些英國人明白印度大起義的真相，知道這一次決非什麼普通的兵變而是全民族的反抗。瓊斯在人民報（1857年八月一日）也發表過這樣意見^⑦。

印度大起義和東印度公司的積年累月的、兇惡殘酷的剝削是分不開的。十八世紀中葉，英法在印度利用他們已經占據的沿海基地和印度各邦分裂的局勢，在那里爭奪殖民地。英法兩國的東印度公司各代表著本國的商業壟斷資本，彼此干預印度土邦的內政，使土邦的領袖成為政治傀儡，又各自招募印度兵士建立雇佣軍隊。英法七年戰爭（1756—1763年）的結局才使英國獨霸於印度。1757年六月英方在普拉西打敗了法軍後，英東印度公司就在孟加拉征收田賦。從此這個公司不僅是一個商業上的權威進而成為一個擁有軍事和領土的權威。

英國當局在印度要農民把他們農產收入的55%納為田賦^⑧。東印度公司最後的二十四年內，印度對英國貿易的出超和公司向英政府上繳的稅款竟達一億五千二百萬金鎊。在1851年，僅上繳的稅款匯寄到倫敦的，就有六百二十萬金鎊^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輪船公司募集資本在印度建築鐵道干綫，把英國工業品大量輸入內地，促使印度手工業崩潰，於是破產的人們愈來愈多。因此各地人民暴動的次數也增加，反抗的

① “The Times”, London, June 27, 30, 1857.

②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2, 1857.

③ “London Commonwealth”, March 1, 1885.

④ Morton, 前揭書, p. 435.

⑤ “People's Paper”, London, May 7, 14, 21, 28; June 11, 18; July 2, 1853. “Ernest Jones, Chartist”, edited by John Saville.

⑥ Morton, 前揭書, p. 441.

⑦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rnest Jones”, edited by John Saville.

⑧ Bombay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1872-73, p. 41.

⑨ R. Mukherjee, 前揭書, p. 225.

情緒也再接再厉。终于1857年五月发动了大起义。时代急剧转变，不久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上升的先进的阶级成为下降的、衰落的、内部死亡的、反动的阶级”。列宁在1908年写着一篇“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时，特别提到印度。他说：“英国管理印度的制度，是无限的暴力及掠夺制度。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俄国当然是除外）如印度那样的民众穷困和连年饥饉的。……现在英国几种最有势力的报纸总是切齿痛骂那些破坏印度治安的‘鼓动家’。”①

但在列宁写这篇文章的五十年前，就是印度大起义时，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在印度和英国的商业垄断资本家（英东印度公司）抢夺地盘。他们之间在印度的内讧显然是英国工业化的一种结果。没有近代的工业化，就不会有工业资本家的势力。英国的工业化是在普拉西战役后，十八世纪下半期完成的。我们应当知道，用煤炭去替代木材做工业燃料始于1760年；蒸气机器在1768年才完成；近代织布机器在1785年才发明于英国。但仅靠机器的发明而没有工业市场，工业化就没有希望。在那个时期，英国虽然失掉北美的殖民地，还有印度那样大的地方去实行资本主义的榨取②。英国在印度所进行的剥削，无疑地促成了英国的工业化。美国一位早期的、有名的经济史家阿达姆斯就说过，英国工业的进展在1694到1757年（普拉西战役）时期较为迟缓，而在1760到1815年时期则有飞速奔放的现象③。

英国工业资本家们对英国商业资本家所给予他们的帮助还不满足，他们更要进而夺取印度市场并在印度投资。他们打击商业垄断资本的东印度公司是通过英国议会进行的。在美国反抗英国、高举独立革命旗帜的时候，英国议会议决在印度设总督府和最高法院。到了1784年更议决由英王指派六位枢密院人员组织一个总管印度事务的管理局。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的权威已转移到这个管理局去了。在这以前，代表英国工业资本家利益而提倡自由贸易的经济理论家亚当·斯密著有“国富论”一书，书中对东印度公司备加批判和打击。在这以后，又值法国拿破崙第一在欧洲大陆封锁英国贸易，以致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不得不加紧把产品倾销于印度。因此当英东印度公司在1813年向政府请求续给特许状时，英工业资本家通过议会打破了该公司的商业垄断。从1813年起英国工业资本在印度的势力开始占着上风，而到了印度大起义时在英国就引起了一片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呼声。

许多英国人责备东印度公司，说它的腐化导致印度起义。代表英国贵族地主的利益的巴麦斯頓勳爵，从1830到1865年支持英国的外交政策。当他听到印度

大起义的消息时，他就马上说东印度公司必须解散④。代表曼徹斯特工業界，主張自由貿易，反对軍事联盟，向来批评巴麦斯頓外交政策的急进派政治家柯百屯（Richard Cobden, 1804—1865年）也是反对东印度公司的。柯百屯写信给他的朋友阿希活斯曾表示他对该公司的意见。“我們都知道”，信上写着，“东印度公司到亚洲去经营的动机，那就是要争夺不仅对外国人而且也是对我们其它本国人的 一种 壟断生意”。柯百屯还说：“公司既然不会管理事务，引起土人反对，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⑤倫敦一个有权威的报纸，“每日电讯”，也有社论说：“统治印度的责任落在一个小撮不名誉的东印度公司的人身上。”⑥

事实上，印度大起义很明显地揭露了东印度公司完全无能而破产的性质。英国工业资本家乘机把该公司解散了。过去，在1853年史坦里子爵在国会的提案通过后，公司的特许状就没有再照例展期二十年，只是展期到国会另有决议时为止。嗣后史坦里子爵改称杜别子爵，1858年八月二日他的印度提案又通过了。于是英国王室直接统治印度，而东印度公司就宣告结束⑦。1858年印度提案通过的那天，马克思就在他的“印度大事记”中写道：“从此印度成为可怕的维多利亚女王帝国的一省了。”⑧马克思这预言到十九年后果然应验。因为完全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班杰明·狄斯拉列（即裴根斯非尔特伯爵）到1868年才继任杜别子爵为首相。从那时起英国内阁人物中十八世纪出生的已绝迹，而十九世纪出生的开始露头角。1872年狄斯拉列在曼徹斯特公开主张订立殖民地宪法以巩固英帝国的力量。在他建议由英国政府收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那年，1875年，他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把女王称为印度皇后⑨。第二年这议案通过了；到第三年，1877年，维多利亚才公布为印度的皇后。

① “列宁文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7页。

② James Mill,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1858, p. 105.

③ Brooks Adams,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p. 263—264; 259—260.

④ “Greville Diary”, edited by Philip Witwell Wilson, Vol. 2, p. 563.

⑤ J. Morley, “Life of Cobden”, Vol. 2, p. 205.

⑥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Oct. 7, 1857.

⑦ 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局”，译载“新建设”1953年第10期。

⑧ Marx, “Chronological Notes on India”.

⑨ Morton, 前揭书，p. 423.

代表英国工人阶级参加民权运动的琼斯，早就窥破曼徹斯特紡織工業家的企圖。他說这些資本家知道，棉花的来源不能全靠北美合众国，因此要倒閉东印度公司而在印度爭取这个原料^①。他固然反对东印度公司，但也不贊成王室去替代公司而統治印度。在他所編輯的“人民报”里，他屢次提到这問題。1857年八月一日他写道：“造成印度混乱的責任不能完全放在公司身上；如果把英政府去替代公司而統治印度，势必以一个掠夺者替代另一个掠夺者”。次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又写道：“如果把管理印度事务的权力从公司移交到政府手里，恐怕鬧得还要更坏”。琼斯所編輯的“人民报”因經費困难而在1858年六月停办了。但他繼續在“倫敦新聞”写文章。他写了很多同情于印度人民的文章。最后一篇登在1858年八月十五日报紙的，就評論了杜別子爵的印度提案。他說：“过去东印度公司曾阻擋了印度和我們輿論之間的联系。現在情勢改变了，关于印度事件的公众輿論应可表达它的力量了。但事实上是否能办到，要看英国的广大人民是否能負起他們应負的責任。”

在印度大起义期間，英国公众輿論和政府印度施行的政策是不对头的。最突出的一个問題就是应当不应当在印度努力宣傳基督教。英国政府宣傳反对法国革命，一向用“保护我們神聖宗教”为托辞的。但在印度却長期实施保护印度教和一切印度旧風俗習慣的政策。东印度公司在财务上和行政上一向支持印度教寺院，公司解散后直到1862年为止也是如此。在1813年以前英美各国傳教士到了印度就被驅逐出境。在印度大起义时期英方招募印兵，偏偏拒絕了数千印度基督教徒入伍^②。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用意，都是为要利用当地旧的封建势力去統治，而不敢开罪于印度教徒。当时印度土邦領袖和英国在印度所訓練的雇佣軍队，大多数属印度教。大起义被鎮压后，英国政策开始挑撥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情感，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始終是剝削殖民地，傳教不过是可用、可不用的手段罢了。

印度大起义爆发后，英国资产阶级却鼓動輿論，要使一般人相信，为要在印度傳教而提高印度人民的文化就不得不用武力去鎮压“叛乱”。倫敦泰晤士报的社論写道：“我們應該考虑，我們維持印度的目的是为將来的基督教和將來印度人民的文化而着想的。”^③自称虔誠的基督教徒如夏夫斯伯利伯爵还曾公开地这样說：“印度的叛乱正符合上帝的意旨。英国注定了要傳达他神聖的兒子（基督）的福音而將使几兆人类的文化有所改进。”^④当时在政治上属于急进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贊成用和平政策去促进基督

教在印度的宣傳的。他們要实行文化和經濟的侵略，但反对用武力。代表他們这种意見的是柯百屯。1857年十月十六日柯百屯在他給阿希活斯的信中说：“那些宗教界的人們以为我們如要傳教必須統治印度。最近事实演变應該使人們明白，派遣紅衣者（英兵）去傳教不一定能保証上帝給我們傳教士的福佑。……但在目前鼓動要用兵的气氛下，我深深了解我这种主張是不会令人欣賞的。”^⑤这就說明，英国资产阶级借口要宣傳基督教而鎮压印度人民，和他們过去借口要保护基督教而反对法国革命是一貫的作風。

远在1764年印度兵士第一次举行抗英起义时，英帝国主义者就采用恐怖政策去鎮压人民。把三十名印度兵士捆绑在砲口，然后开砲射击，血肉横飞^⑥。在1857年大起义期間，英軍在孟买登陸，看見任何印度人就用刺刀乱戳。德里被攻破时，城內所留下的印度人大部被杀死了。英軍入阿拉哈巴德等城市时，“也举行不分皂白的屠殺”。“印度叛兵常常不經审判就被吊死或被砲轟死”。駐印度西北部的一位軍官，名叫傅利度列克·柯坡，在一个乡村警察派出所一次就槍殺二百三十七人，把印度土兵第二十六縱队全部消灭了。剩下四十五人因为拥挤在一間很小的房內，沒有点名槍斃就活活地被悶死了^⑦。

在康恩坡城內一家富商名納納者，曾收留了二百英国妇女。当英軍进迫城下时，印度人將这些妇女逼进一間房內，全部用刀砍死。次日把屍首拖出来抛入井內。后来英軍攻进康恩坡城，迫使每个將被槍斃或將被吊死的印度人先去洗刷那房內的血迹^⑧。当时英国方面將印度人的暴行誇大宣傳，甚至斐根斯非尔特伯爵（狄斯拉列）也說过：“許多令人憤恨的暴行細節是有意制造出来的。”^⑨泰晤士报曾刊登一个讀者的

① S. Macoby, "English Radicalism", Vol. 2, p. 366.

② J. N. Farquhar, "Modern Religious Movements in India", N. Y., 1919, p. 9-10.

③ "The Times", London, October 7, 1857.

④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2, 1857.

⑤ John Morley, "Life of Cobden", Vol. 2, p. 205.

⑥ H. Mukerjee "India Struggles for Freedom", 2nd ed., Bombay, 1948, P. 48.

⑦ Woodruff, 前掲書, Vol. 1, p. 359, 376, 377. 可參閱 Frederick Cooper, "The Crisis in the Punjab"; Edward Thomps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al".

⑧ Woodruff, 前掲書, Vol. 1, p. 361.

⑨ House of Commons, July 27, 1857.

長函(署名为 Judex), 宣称大部分与印度暴行有关的故事完全是出于假想的①。

反战、反殖民主义的柯百屯居然相信印度傳来的暴行细节, 但他以为这是咎由自取, 不足为怪。他在写給他密友布萊特(John Bright, 1811—1889年)的信中說: “很清楚的, 英国人在印度的許多言行不能使印度人敬爱他們的。英人过去在印度所犯的罪行, 加上最近在那里所表現的殘酷无情的措施, 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 將必回击到我們和我們自己的子孙身上。我讀了英国軍官从印度来的信札, 我很惊奇他們在那里所放的血債。他們屠殺人家好似猎取野兽。”②

当时英国的急进派, 主張自由貿易的人們都反对英軍在印度屠杀。“晨星报”社論反对报复主义、反对德里三日屠城的提議③。“反国教报”也贊成采取“基督教精神的和緩政策”④。但英国地主、貴族和大资产者的代言人沒有不主張报复、要求严办叛乱者, 他們不惜用任何手段去鎮压印度人民。“每日电讯”报說, 惩罚印度的叛乱不可能不从严厉方面設法⑤。倫敦的“晨报”在社論里写道: “每个英国人必須效忠于他的国家, 使印度的那些惨杀英国妇女的謾骂默德和婆罗門魔鬼絕迹于这个世界。”⑥“紐卡賽尔紀事报”原为急进派刊物, 但自轉入帝国主义者柯文(Joseph Cowan)手中后也轉变論調了。它竟批評康寧的“溫和”政策, 而主張不顧一切地对印度人民实施严厉的报复, “我們的报复必須使我們印度的庶民听到德里二字而发抖”⑦。

代表无产階級立場而加入这个辯論的只有瓊斯。他曾列举倫敦泰晤士报所报道的、英軍在印度的暴行, 然后下結論說: “这就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的标本, 从此人們不必再談什么印度人的殘酷了。”⑧再一次他提到所謂印度人的暴行时, 他指出傳聞誇大的性質, 并說人們只是片面地听了一方面的話。他要英国人記得, 在美国独立革命战争中英軍如何殘酷地用印地安人屠杀美国人民。他說印度“叛軍”的行为决不会比英軍的鎮压更为兇惡。“血債是以血来偿还的, 殘暴只能更产生殘暴”⑨。

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早就投降于帝国主义者了。他們似乎想不通为何在印度的基督教徒竟被人杀害。他們听到大起义时的震惊, 据他們自己說, 好像前一时代听到里斯本地震那样。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領袖, 莫列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 在1857年曾做过关于“印度危机”的五次演講。他的結論是“我們必須尽力爭取保住印度那样的版圖”⑩。罗特洛, 另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所写的小册子中說: “有了一个快乐而繁荣的印度, 有了薩克遜人

(英国人)的智慧倡导于西方和回教徒或錫克族的忠誠随于东方, 英国足以称无敌于世界了。”⑪过去曾在格萊勒內閣中担任要职的格蘭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在这时候也回到保守的路綫。他宣称:

“放弃印度就会使我們开始墮落。保住印度就証明我們还没有退化。”⑫代表非社会主义工人們的觀點的报纸, “来諾尔特新聞报”, 也附和帝国主义而贊成保住印度为殖民地。它的社論說: “印度足供英国企業和貿易的一大活动地区, 我們要好好地設法保住它, 不可失去維持这个东方乐园的最后一个机会。”⑬

只有瓊斯的意見是代表有覺悟的无产階級的。印度大起义的消息傳遞到英国时, 他的1851年在獄中所写的詩“印度斯坦造反”又再版了。这个再版的序言中他写道: “太陽固然永远照耀着英帝国, 鮮血也永远不会乾的。”在1857年八月一日的“人民报”他簡略地叙述英人侵略印度的历史。“百年以前作为商人强盜的外国人夺去了印度人的独立。在这百年中无数千万的罪惡出現了。我們的建議是承認印度的独立。”他对印度大起义表示很大的同情。他以为“这次印度起义是世界史上最富于正义、最崇高、最必要的举动。奇怪的不是这許多被压迫的人們起来反抗, 奇怪的倒是他們过去会向外国人低头降服。如果他們中間的王公酋長等不彼此向外来侵略者出賣, 他們就不会失去独立的。这也証明帝王、王公、貴族, 無論在何国或在何时, 都是人民的仇敌”。他还說: “英国工人應該對他們在印度的兄弟們付与同情。印度兄弟們的運動

① “The Times”, London, January 29, 1858.

② J. Morley, “Life of Cobden”, Vol. 2, p. 208.

③ “Morning Star”, Sept. 29, Oct. 5, Oct. 7, 1857.

④ “Nonconformist”, Oct. 6, 1857.

⑤ “The Daily Telegraph”, Oct. 8, 1857.

⑥ “The Morning Post”, Sept. 5, 1857.

⑦ “Newcastle Chronicle”, July 17, Aug. 7, Oct. 23, 1857.

⑧ “People's Paper”, August 15, 1857.

⑨ “People's Paper”, Oct. 19, Oct. 31, Nov. 21, 1857.

⑩ F.D. Maurice, “The Indian Crisis: Five Sermons”, London, 1857, p. 10.

⑪ J. M. Ludlow “Thoughts on the Policy of the Crown towards India”, 1859, p. viii.

⑫ “Weekly Despatch”, August 23, 1857.

⑬ “Reynold's Newspaper”, Oct. 11, 1857.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历史

吳世璜

印度尼西亚是我们的邻邦，自远古以来，中、印两国就发生了接触。考古学家赫尔德森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四方形石斧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是从中国南部沿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而传入印度尼西亚的^①。印度尼西亚的青铜工具和铁工具也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的。卡连弗尔斯在“雅加达博物馆史前展览室说明书”上写道：“公元前数世纪，制造青铜工具的技术，从中国南部（尤其是云南）和印度支那传入印度尼西亚。”^②印度尼西亚史家雅明在“红白旗六千年史”一书中亦指出：“铁器加工的技术从中国南部，经过越南东京而传入印度尼西亚。”^③

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以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一步建立了经济联系，彼此之间有巨舶往来，互通有无，并互派使节访问，交流文化，从而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生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不仅有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两国人民也有不少互相通婚的。例如，印度尼西亚历史上著名的淡目国王拉登巴达的母亲就是中国人，雅加达市长苏迪罗1956年来我国访问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讲话中就曾提到这件事^④。印度尼西亚政府情报局出版的“今日印度尼西亚”一书中也曾指出：“巨港居民的血液中含有中国人血液的成分。”^⑤我国史书“海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加里曼丹新当“中华人初到彼，所娶妻妾皆獮子（大雅克族）”^⑥。在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时期，荷兰统治

者曾片面规定住在当地的华侨侨生为荷兰属民，这就产生了侨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种不合理的情况长期以来没有解决。1955年四月我国和印度尼西亚缔结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这是和平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的良好范例。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不单符合于侨民的切身利益，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两国邦交的发展，而且对于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1955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着。本文拟对两国人民的友好历史，从下述几个方面作些简略的介绍：

① 见赫尔德森：“荷印史前研究”，载“荷印的科学和科学家”，1945年版，第140页。

② 卡连弗尔斯：“雅加达博物馆史前展览室说明书”，1934年版，第30页。

③ 雅明：“红白旗六千年史”，1954年版，第20页。

④ 1956年6月11日雅加达市长苏迪罗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演说。

⑤ “今日印度尼西亚”，1950年版，第102页。中译本：“现代的印度尼西亚”，1956年新知出版社版，第83页。

⑥ 谢清高：“海录”，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3页。

就是你们的运动；他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间接胜利”^①。

瓊斯在1857年九月十二日的“人民报”上又写道：“在印度平乱的经费必然出于税捐，税捐必然出于英国工人們的口袋。英国工人們出了这笔钱能得到什么好处吗？得到利益的还不是那些贵族和财阀吗？大家试想一下，自从印度属于英国，印度已如何变得贫穷。如果我们以一个独立而友好的国家对待印度，我们在那里的商业早就会发展得很好”。同年十月三日，他在“人民报”又发表一篇长文章，力劝英国工

人們不要捐款救济从印度退回的英国軍民。他勸工人們节省他們的錢，留作自己組織政治运动的用費。同年八月一日“人民报”曾报道，有二百英国軍官和兵士排队经过罗徹斯特和坎省姆，引起很多观众的注意。因为他们都是在印度軍役期滿后返国的，尽管政府要发给額外的月費他們也不願在印度繼續打仗。这也很明显地反映了英国工农階級对印度大起义的态度和意見。

① “people's Paper”，Sept. 5, 1857.

一 經濟联系

根据“汉書”“地理志”的記載，远在公元前二世紀，中国和印度尼西亞即已建立經濟联系，中国商人已到馬六甲海峽和印度尼西亞商人互通有无。“地理志”中所說的“皮宗”，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認為是新加坡西北的皮声島（P. Pisang）意为香蕉島），即郑和“航海圖”中的毘宗^①。有些学者却主張皮宗为苏門答臘北端的皮声岸（Pisangan）地区^②。然而不論皮声位于新加坡之西北，或是在苏門答臘北端，其為在馬六甲海峽沿岸，那是無疑的。由此可知，远在二千年前，中国和印度尼西亞兩國之間已經建立經濟联系了。那时兩國之間貿易的物品，中国方面主要是絲綢黃金，印度尼西亞方面主要是珠寶和奇異物品。

到了公元五世紀，兩國之間的經濟联系进一步发展，彼此之間已有巨舶往来，公元414年晋高僧法显从爪哇（耶婆提）回中国所乘的巨舶，可容二百余人^③，即一例証。

到了宋朝，中国和印度尼西亞的貿易更有飞躍的发展，印度尼西亞的香料成为我国最大宗的輸入品之一，据“諸蕃志”“志物篇”所載，四十七种輸入品中有二十九种是香料，在这二十九种香料中有十六种是印度尼西亞的特产^④。香料的稅收是中国海关一項重要收入。“宋史”卷一八五：“宋之經費，茶、盐、礬之外，惟香之利博，故以官为市。”1077年（熙宁十年）仅广州輸入的乳香即已达348,673斤^⑤。

“嶺外代答”：“諸蕃国之富盛多宝貨者，莫如大食国（阿拉伯），其次閩婆国（爪哇），其次三佛齐国（苏門答臘），其次乃諸国耳。”^⑥中国輸往印度尼西亞的商品主要是絲綢、陶瓷器、鉄器、銅錢及各种日用品。絲綢是中国劳动人民著名的产品；極受印度尼西亞人民欢迎。印度尼西亞人“所穿沙郎水慢（花裙），貧者以布，富者則用中国絲綢”^⑦。中国的磁器亦極受欢迎，馬欢在“瀛涯胜覽”一書中写道：爪哇“国人最喜青花磁器”^⑧，常把它当作家傳之宝，在婚喪祭祀的仪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⑨。中国的銅錢宋代大量輸入印度尼西亞，对于印度尼西亞的商品貨幣关系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荷蘭殖民者侵占印度尼西亞之后，禁止在印度尼西亞使用中国銅錢，然而在峇厘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还使用中国銅錢。目前峇厘島居民还把中国銅錢作为一种祭祀品，供在神前，在火葬仪式上，亦有使用中国銅錢者。

中国和印度尼西亞兩國之間的貿易是平等互利的，彼此有无相通，丰富了兩國人民的生活。印度尼西亞对中国商品所抽的稅，“号称公平”^⑩。对中国

商人殷勤招待，“待以賓館，飲食丰洁”^⑪；而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亞商人亦热烈欢迎，在广州、泉州等通商口岸，特辟外僑居留地区，叫做“蕃坊”，区内事务，由外僑自己管理。印度尼西亞人蒲訶栗曾任蕃坊首長^⑫，由此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亞在我国国际貿易上所佔的重要地位。

二 使者互相往来

中国和印度尼西亞兩國在很古的时代就互派使者互相訪問，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促進兩國之間的貿易。三国时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到南洋各国訪問，据日本学者駒井又明的研究，認為朱应、康泰曾到印度尼西亞^⑬。中国史書上記載印度尼西亞使者最早来中国的是爪哇国王叶調，他于公元131年（永建六年）派遣师会来我国訪問，我国政府热烈欢迎，贈送一顆金印和承受印环的紫色綠条以为紀念^⑭。接着訶罗單（爪哇）、婆利（峇厘）、干陀利（苏門答臘）、淳泥（加里曼丹）等相繼來訪。我国亦屢派使者到印度尼西亞各地訪問，例如1370年派張敬之、沈秩訪問爪哇和加里曼丹^⑮，趙述訪問苏門答臘^⑯，1405—1433

① 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叢考”，1936年版，第87頁。

② 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叢考”，1936年版，第87頁。

又見韓振華：“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一世紀中、印海上交通的記錄”，載“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第96頁。

③ “佛国記”，商务印書館1939年版，第21頁。

④ 輸入中国的十六种印度尼西亞特产：腦子（樟腦）、金顏香、安息香、沉香、速暫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香、檳榔、白豆蔻、胡椒、畢澄茄、阿魏、麝香、龍涎。

⑤ 見梁廷楠：“粵海關志”，卷3。

⑥ “嶺外代答”，卷3，第10頁，知不足齋叢書。

⑦ 謝濟高：“海錄”，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52頁。

⑧ “瀛涯胜覽”，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5頁。

⑨ 范得爾胡甫：“雅加達博物館指南”，1948年版，第25頁。

⑩ 見“东西洋考”，商务印書館1937年版，第47頁。

⑪ “宋史”卷489。

⑫ “唐會要”卷100；又見“宋史”卷489，“三佛齐傳”。

⑬ 引自馮承鈞：“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年版，第16頁。

⑭ 見“后漢書”卷116，“南蠻西南夷傳”。

⑮ “明史”卷325，“淳泥傳”。

⑯ “明史”卷324，“三佛齐傳”。

年間鄭和七下西洋，几乎每次都到印度尼西亞訪問。

三 唐代高僧到印度尼西亞研究佛學

公元七世紀蘇門答臘（室利佛逝）是東南亞研究佛學的中心，各方學者來此研究佛學的有一千餘人。據又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載，唐代僧人到外國研究佛學的總計六十人，其中到印度尼西亞的共計十九人①，凡占三分之一。在這十九人中最著名的是又淨，他於672年到蘇門答臘，受到室利佛逝王殷勤招待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熱烈歡迎，“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咀撈僧，莫不大生敬禮；提婆是天，弗咀撈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②。又淨在室利佛逝停留了六個月，學習梵文的語音和語法，然後到印度研究佛學。十年之後，復到蘇門答臘，住了六年，從事譯述工作。689年回廣州，不久又回到蘇門答臘。他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并雜經論等十卷。這些著作是今天研究印度尼西亞古代佛教的重要資料。他主張中國僧人如果要到印度研究佛學，最好先在蘇門答臘學習一、二年，然後才到印度去。他說印度尼西亞僧人勤学好施，一如中印度，軌儀相同。他對於印度尼西亞文化給予很高的評價。他特別推薦印度尼西亞報時的銅漏，認為精巧準確，号召中國寺院向印度尼西亞學習③。此外他還介紹了印度尼西亞的木棉枕，說比中國的硬木枕舒服得多，又不會患頭痛④。

會寧也是唐代著名僧人之一，他於664—665年間乘船到爪哇（訶陵），住了三年，和爪哇著名高僧若那跋陀羅共同翻譯佛經“阿笈摩”中關於如來涅槃焚身的一部分。

到印度尼西亞研究佛學的中國僧人，除了研究梵文，還有研究印度尼西亞古代語（崑崙語）的，例如運期、大津、孟懷業等。印度尼西亞語發音優美，馬歡在“瀛涯勝覽”中指出，爪哇“國語甚美軟”⑤。中國人民一向重視印度尼西亞語，在正史中亦有記載印度尼西亞語的，例如“宋史”卷四八九“閩婆國傳”：“方言謂真珠為沒爹蝦羅，謂牙為家囉，謂香為岷熾盧林，謂犀為低密”。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亞亦極重視中國語文，蘇門答臘“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則用焉”⑥。1080年蘇門答臘公主曾用漢文寫一封信給廣州提舉市舶孫迥，信的內容是關於寄樟腦與布的事情⑦。

四 中國文化對於印度尼西亞的影響

我們知道，中國曾從印度尼西亞學到不少東西，同樣的，中國文化也曾給印度尼西亞不少的影響。首

先在農業方面，中國的農具和耕種方法曾給印度尼西亞一定的影響。李塞爾在“東南亞華僑”一書中指出：“由於中國人民和東南亞人民的接觸，中國的耕種方法給予東南亞人民巨大的影響。”⑧“荷印大百科全書”指出：印度尼西亞農民在旱田和農園中使用一種犁，入土較淺，叫做中國犁，顯然是模仿中國的犁製造的。⑨加里曼丹大雅克族杜順人種稻的方法完全是中國的方法⑩。

茶是中國勞動人民最早栽培的飲料植物，世界各國的茶，大都是由中國傳去的，這可從各國的“茶”這一詞彙源自漢語看出來。印度尼西亞語稱“茶”為“Teh”，顯然是漢語。十五世紀印度尼西亞尚無茶樹，無飲茶的習慣，“若渴則飲水，遇賓客往來無茶，止以檳榔待之”⑪。中國茶葉是從1681年才開始輸入印度尼西亞的⑫，“瀛環志略”也指出：爪哇“近年學種閩茶，味頗不惡，但不甚多”⑬，到了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茶種、茶樹和制茶技術傳入印度尼西亞。“荷印大百科全書”指出：“1829年中國茶種及茶樹傳入爪哇，1832年和1833年耶谷通往廣東聘請數位中國制茶技術人員到爪哇。”⑭中國茶樹傳入印度尼西亞之後，印度尼西亞茶葉迅速發展。後來又傳入印度阿薩姆茶種，發展得更快，占世界產量的第四位。

其次在手工業方面，中國文化亦給印度尼西亞不小的影響。印度尼西亞紡織絲綢的方法是向中國學習的。陶威爾·德克爾在“印度尼西亞歷史綱要”一書

- ① 到印度尼西亞研究佛學的十九位唐代高僧是：又淨、會寧、運期、彼岸、智岸、善行、智弘、無行、大津、貞固、孟懷業、道宏、慧日、新羅僧二人、法朗、明遠、常懋、道琳。
- ② “南海寄歸內法傳”，1925年支那內學院版，卷3，第21頁。
- ③ 同上書，卷3，第26頁。
- ④ 同上書，卷3，第9頁。
- ⑤ “瀛涯勝覽”，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4頁。
- ⑥ “諸蕃志”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2頁。
- ⑦ “宋史”卷489，“三佛齊傳”。
- ⑧ 李塞爾：“東南亞華僑”，1952年，第16頁。
- ⑨ “荷印大百科全書”，第2卷，第527頁。
- ⑩ 見李長傳：“中國殖民史”，1937年，第94、95頁。
- ⑪ “瀛涯勝覽”，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1頁。
- ⑫ 德漢：“古吧達維亞”，第491頁。
- ⑬ “瀛環志略”卷2，第15頁。
- ⑭ “荷印大百科全書”，第4卷，第326頁。

中写道：“的确，我們的祖先是向中国学习用蚕丝織綢的。不久，我們自己也会織綢了。”^① 斯里克在“印度尼西亞社会研究”一書中亦指出：中国种植桑树和养蚕織綢的方法傳布到巨港、楠榜、峇厘、加里曼丹等地区，不久遂成为这些地区的家庭手工业^②。

印度尼西亞的造紙术也是从中国傳去的。唐高僧义淨到苏門答臘翻譯佛經时，印度尼西亞还没有紙，义淨曾写信給广州友人，囑寄紙墨，抄写佛經^③。到了十五世紀初叶，馬欢随郑和訪問爪哇时，爪哇仍然没有紙，書写时以茛菪^④代紙，在叶上刻字^⑤。十六世紀初，中国紙已作为一种商品輸入印度尼西亞^⑥。到了十七世紀八十年代，中国人在雅加达設立紙厂，制造紙張^⑦，將中国的制紙术傳入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的甘蔗制糖業是吸取了中国的先进經驗而发展起来的。十七世紀以前，印度尼西亞的食用糖是棕榈树糖，用桄榔树(aren)花梗中的甜液制成。十七世紀以后才逐漸改用甘蔗制糖，这是由于从那时候起，中国人在雅加达建立甘蔗制糖厂^⑧，用中国的技术提煉甘蔗糖，同时又利用水力轉磨，产量大增，以前雅加达糖的年产量仅一百九十六担，到了1653年增加到一万二千担^⑨。

随着中国煉糖技术的傳入印度尼西亞，中国的应用甘蔗釀酒术也傳入印度尼西亞^⑩，用麴和醱使糖漿发酵，可以提煉出含酒精成分高达66%的美酒^⑪。

印度尼西亞人民三餐不可缺的醬油，是由中国傳入的。豆腐、豆醬^⑫也是从中国傳来的。此外还有豆芽、面也是学习中国的技术制造的。

制造磚瓦、漆的技术也深受中国的影响。1172年(宋乾道八年)苏門答臘三佛齐王写信給宋帝請求雇人造瓦运往苏門答臘^⑬。漆器是中国名产，尤其是福州漆器，更是遐邇聞名，“番商兴販，用……漆器……交易”^⑭。印度尼西亞語“漆”称“tjat”，字源是漢語，由此可知“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建筑方面中国文化对印度尼西亞亦有影响，巨港有座清真寺，是十八世紀的建筑物，完全是中国式^⑮。峇厘的房屋，一进门有照壁，擋住視綫，这种建筑法和中国的建筑一样^⑯。印度尼西亞建筑物上的“欄杆”和“卍”字形裝飾物，是向中国学习的，名称亦采用“漢語”^⑰。

我們知道，印度尼西亞民族是善于航海的民族，他們和中国人民頻繁往来，互相学习，吸取了中国造船的經驗，丰富了印度尼西亞船只的品种。他們模仿中国船只制造的帆船計有五种类型：(一)鯨(djung)，这是最大型的中国式帆船，有二、三桅樁；(二)舢舨(tongkang)，比鯨略小；(三)船尼阿(tjunia)；

(四)斯那特(Senat)；(五)大口船(taukau)^⑱。印度尼西亞最常見的“舢舨”也是模仿中国的舢舨制造的，名称亦用漢語为“Sampan”，印度尼西亞人民仿造舢舨时，青出于藍，制造了三十种不同型式的舢舨^⑲，充分表現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造船天才。

在艺术方面，印度尼西亞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一种滋养料，使得印度尼西亞艺术的花朵开得更加美丽鮮艳。“荷印大百科全书”指出：“亞齐若干苏丹坟墓上的裝飾物，很明显地是模仿中国庙宇的石灯和香爐的形象而制造的。爪哇和峇厘的屋瓦，有的很明显地是受了中国的影响，此外花裙的圖案，有的也受中国影响”^⑳。“印度尼西亞裝飾圖案画冊”选載了七幅受到中国艺术影响的圖案，其中有中国式的云、鳳凰、龙等圖案^㉑。

爪哇札巴拉是印度尼西亞著名彫刻中心地，这个地区的彫刻艺术和中国艺术有着密切关系。民間故事里盛傳麻喏八歇王宮中著名的雕刻师曾經到中国学

- ① 陶威斯·德克尔：“印度尼西亞历史綱要”第53頁。
- ② 斯里克：“印度尼西亞社会研究”，1955年，第234頁。
- ③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1卷，第11頁。
- ④ 茛菪是一种扇棕櫚，略似蒲葵叶，印度尼西亞語叫“lontar”。
- ⑤ “瀛涯胜覽”，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4頁。
- ⑥ 見沙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亞历史”，第一册，1950年版，第181頁。
又見弗玲·梅斯：“爪哇历史”，第二册，1925年版，第40頁。
- ⑦ 德汉：“古吧达維亞”，1935年，第275頁。
- ⑧ 同上書，1935年，第324頁。
- ⑨ 宇塞尔：“东南亚华侨”，1952年，第457頁。
- ⑩⑪ “荷印大百科全书”卷1，第56頁。
- ⑫ 胡沙英·巫那夫：“印度尼西亞百科全书”，第290頁。
- ⑬ 引自刘繼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年版，第35頁。
- ⑭ “諸蕃志”，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4頁。
- ⑮ 見1955年7月4日雅加达“新報”印度尼西亞画家苏約諾談話。
- ⑯ 柯华盧比阿斯：“峇厘島”，1942年版，第89頁。
- ⑰ “欄杆”印度尼西亞叫“Langkan”，“卍”叫“bandji”(万字)。
- ⑱ “荷印大百科全书”卷5，第445頁。
- ⑲ “荷印大百科全书”卷5，第442、443頁。
- ⑳ “荷印大百科全书”，卷2，第489頁。
- ㉑ “印度尼西亞裝飾圖案画冊”，1949年版，第65、205、221、237、291、293、314、361頁。

習①。十六世紀中叶札巴拉有一位名叫哈迪森的青年，曾到中国學習彫刻，回来后大大促进了札巴拉的彫刻②。雅加达博物館說明書上亦指出：印度尼西亞許多地区，例如爪哇的彫刻，很受中国文化的影響③。

印度尼西亞的音乐亦受中国影响④。其中有些歌曲富有中国風味。“薩林陀罗”（Salendro）曲調只有五个音阶，和中国音乐的“五音”（宫、商、角、徵、羽）一样。印度尼西亞的乐器，有許多与中国乐器相似，例如笛子、鐃鼓和鑼等，其中有一种鑼叫“bereng-bereng”，是中国乐器⑤。中国音乐与印度尼西亞音乐交流的结果，产生了一种音乐叫“甘榔·格罗蒙”，盛行于雅加达、文登一带，这种音乐用的乐器是中西合璧的，以印度尼西亞的敲击乐器“甘榔”和中国的三弦为主。演奏的曲子是中国調，但歌詞是用印度尼西亞語。演奏“甘榔·格罗蒙”时，有一种叫做“曲客舞”（tjokek），也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亞文化交流的結晶。印度尼西亞舞女穿着中国古裝，梳毛辮，裝扮得像京戏中的花旦一般美丽，但是跳的舞却是印度尼西亞舞。“海島逸志”指出：雅加达的甲必丹和富翁，聘漳州、泉州乐工訓練印度尼西亞女子演中国戏，有官音乱彈、泉腔下南二部，其服裝乐器，都是从中国运去的⑥，印度尼西亞作曲家巴煞伊甫亦指出，印度尼西亞民間戏剧“列囊”（lenong）“極富京戏气氛”⑦。峇厘的“阿尔查”（Ardja）歌舞，經常表演“梁山伯与祝英台”⑧，这也可以看出中国戏剧对于印度尼西亞的影响。

中国的古典文学在很久以前就介绍到印度尼西亞了。1859年狄岳用爪哇文翻譯“薛仁貴征东”、“李世民傳”，受到讀者热烈欢迎。不久有人根据此譯本轉譯成印度尼西亞文。1980年叶源和把“三国志演義”譯成印度尼西亞文，大受欢迎，几乎每年都要再版。1900年后中国小說譯成印度尼西亞文的更多，計有：“万花楼”“二度梅”“聊齋”“西遊記”“封神榜”“郑和七下西洋”“八美图”“鏡花緣”等。印度尼西亞著名詩人阿美尔·威薩亦將中国的“詩經”，李白、杜甫的詩譯成印度尼西亞文⑨，苏联作家奧斯托洛夫斯基在“印度尼西亞故事集”序言中指出：“中国的航海家和移民也帶來了不少的奇妙神話，到今天还是被爪哇人按照自己的解釋講說不絕”⑩。

印度尼西亞学者阿明·巴尼在“东南亞的印度尼西亞”一書中写道：“在印度尼西亞的服裝中可以看得到中国的影响”⑪，“海录”亦指出：加里曼丹新当“唯衣服飲食稍学中国”⑫。

如所周知，印度尼西亞語詞彙中包含着許多汉语（福建話），雅加达地方語的人称代詞，最常用汉语的“我”（gua）、“你”（lu）。在广东、福建的侨眷区，日常用語中夾杂着不少印度尼西亞語。这具体而又生动地說明了兩國之間的密切关系。

五 共同反抗殖民主义者

中国印度尼西亞兩國人民在历史上都曾遭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上，曾經互相鼓舞互相吸取經驗。列宁在“亞洲底覺醒”一文中指出：“爪哇和其他群島上的很多华侨从本国帶來了革命运动”⑬。勒霍斯論述印度尼西亞革命的高潮时指出：“1925年中国革命的高漲，对于印度尼西亞的革命斗争很有影响”⑭。苏加諾在他著名的演講“建国五原則的誕生”中說他深受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而批判了殖民主义者巴尔斯向他宣傳的世界主义⑮，苏加諾說得好，中国印度尼西亞兩國人民的“友誼是兩個战斗民族之間的友誼”，“大家共同为爭取独立而斗争”⑯。这种战斗的友誼，把中国和印度尼西亞兩國人民紧密地团結起来，为人类正义的、进步的事業而奋斗。

- ① “椰巴拉的艺术雕刻”，見1951年6月12日雅加达“新报”“印度尼西亞副刊”。
- ② “印尼的木刻”，載雅加达“印华經濟”第3卷，第8期，第6頁。
- ③ “雅加达博物館指南”1948年版，第20頁。
- ④ 見“荷印大百科全書”，第2卷，第813頁。
- ⑤ 見威爾京孫：“馬來語英語詞典”“bereng”条。
- ⑥ 見“海國圖志”卷13，第23頁，同治丁卯福州陳氏重刊足本。
- ⑦ 巴煞伊甫（pasaribu）：“談列囊”，見1954年12月1日雅加达印度尼西亞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報”。
- ⑧ 見柯華盧比阿斯：“峇厘島”，1942年版，第251頁。
- ⑨ 見阿美尔·威薩詩集：“东方的苏合香”，1939年版。
- ⑩ 見“南洋問題資料譯叢”，1957年第1期，第62頁。
- ⑪ 阿明·巴尼：“东南亞的印度尼西亞”1951年，第16頁。
- ⑫ “海录”，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51頁。
- ⑬ 列宁：“亞洲底覺醒”，見“列宁、斯大林論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頁。
- ⑭ 勒霍斯：“印度尼西亞”，1947年版，第160頁。
- ⑮ 見“苏加諾演講集”，1956年版，第14頁。
- ⑯ 苏加諾在北京市欢迎大会上的講話，見1956年10月4日“人民日報”。

資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党报和进步报刊簡介

文 琪

講授或研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参考当时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和有关的进步报刊，是提供这个时期的重要史料的来源之一。本文試圖以党的历史发展为綫索，以当时出版的主要报刊为重点作一簡略的介紹，以作搜集这个时期資料的一些参考。

当1927年蔣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叛变后，全国突然轉入黑暗，党和中国人民进入一个極困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在白区由于在国民党的反革命專政下面遭受到种种迫害，不得不轉入地下秘密出版；同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党在农村领导的武装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并建立了許多革命根据地。党在革命根据地，在人民群众自己掌握政权的新条件下也创办了大量的报刊。

和在农村领导革命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领导了革命文化运动的报刊和国民党的文化“圍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的强有力的一翼。

这个时期，党在苏区出版的主要刊物有“斗争”、“紅色中华”等，在白区出版的刊物有“布尔什维克”、“紅旗”以及其他小报。“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刊物，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这些党的报刊和在党领导下的进步报刊，无论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或在極端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始終高举着革命的旗帜，以革命精神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組織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真正起到了强有力的阶级斗争的武器的作用。現分述如下：

一 在白区出版的刊物

“布尔什维克”是党在白区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之一。它是在1927年1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極端恐怖的统治下創刊的。1931年一月二

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決議中，确定“布尔什维克”为中央理論性的机关报。現在已看到的影印本共五卷。为了避免敌人的檢查，封面曾采取各种伪装，如“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語教科書”、“中国文化史”、“經濟月刊”、“少女怀春”等。

“布尔什维克”曾大量报道了在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同时反复論証了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質，对說明当前的革命性質、任务等方面是有很大功績的，这是它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三次“左”傾路綫在党内占統治地位的时期，“左”的不正确的观点，在“布尔什维克”上面也就不能不有所反映。

“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出版的时间是1927年十月至1929年十二月。在这个期間，由于国民党新軍閥建立了大买办大地主新的反革命的軍事專政，白色恐怖横扫全国，党的組織与全国革命人民遭到極其殘酷的破坏与屠杀；又由于党内投降主义思想的影响及投机分子的叛变，党内思想極其混乱，在这一錯綜复杂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在指出革命运动的总的方向和从思想上巩固革命队伍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布尔什维克”发刊露布（类似发刊詞）一文中，分析了国民党叛变的原因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強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責任。一卷一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运动如何？”一文，批判了認為中国革命業已死亡、“国民革命成功論”的錯誤观念，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強調不能因失败而灰心，要努力推翻国民党的統治。同期“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文，繼續指出国民党已經因背叛三民主义而死灭了，今后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須进行武装斗争。

另外，“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根据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新軍閥所建立起来的反革命軍事專政，突出地表現为一方面向帝国主义投降，并且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軍閥連年混战；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新老軍閥联合起来殘酷地屠杀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例

如从1927年十月間爆发的蔣（介石）、唐（生智）战争以及后来的許多次大小軍閥混战，“布尔什维克”从第一卷第一期“反对南京、武汉的軍閥斗争”一文起到二十八期止連續发表了許多文章，指出国民党新軍閥的統治和旧軍閥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圍繞着这个直接影响到各阶层人民生活 and 最能說明国民党統治的反动本質的方面进行了連續的揭露。当1927年广州起义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和苏联絕交，“布尔什维克”在一卷十一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絕交宣言”，紧接着在1928年爆发的“五三惨案”国民党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屈服态度，“布尔什维克”从一卷二十期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侵占山东告全国民众”一文起到一卷二十八期“日本对华政策及阶级斗争之新发展”，前后发表將近十篇文章，徹底地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面貌揭露无遺。

此外，在一卷三期发表的“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一卷十六期的“从吳佩孚到国民党的杀人政策（紀念二七）”，一卷十七期的“最近之白禍”等文，集中地揭露了依靠白色恐怖来維持統治是帝国主义封建軍閥一貫的政策。

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和征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党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在1927年領導了“八一”南昌起义，以及“八七”會議后的各地秋收起义以至同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等，以挽救革命的失敗。“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期間出版的第一卷各期曾前后发表了將近五十多篇文章，論述和报道了各地的革命运动，如一卷一期“八一革命之意义与賀、叶軍隊之失敗”，一卷四期“江南农民大暴动之开始”，一卷八期“中国第一个苏維埃”（詳細介紹了海陆丰农民起义前的准备、起义經過，胜利后苏維埃政权的成立情况等），一卷九、十期有关广州暴动的論述和报导以及一卷十二、十四期“湖南农民革命的追述”等。

由于各地武装起义和紅軍、革命根据地的發展，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反映到党内来，使党内的“左”傾情緒很快地发展起来，形成党史上第一次“左”傾路綫的錯誤，这一錯誤路綫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上也有着明显的反映。

1928年七月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它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过去斗争的經驗，估計当时的革命形势，規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因此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大会通过的“政治議决案”和

“土地問題議决案”在“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二期都全文发表。

除上述內容外，“布尔什维克”第一、二卷在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反革命謬論以及批判当时以汪精衛、陈公博等反革命投机政客所組成的所謂“改組派”（如第一卷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第二卷第二、四、五各期）方面都有不少反映。（当时作为改組派的喉舌是“革命評論”，1928年六月在上海創刊，陈公博主編，經常写稿人有陈公博、施存統等。）

“布尔什维克”第三卷出版的时间是1930年一月至六月。在这个期間国内发生了大規模的軍閥混战，在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之下，党内“左”傾思想得到了发展，形成党史上第二次“左”傾錯誤路綫。这一錯誤路綫在第三卷上就有明显的反映，如第四、五期合刊上李立三同志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一文，包括“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論革命高潮”、“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等六篇短文中，不承認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目前革命运动从哈尔滨到广州是平衡发展的。全国是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在这一革命高潮下根据中国政治、經濟条件，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最主要的策略則是組織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以及組織与訓練工人武装等，同时还指出“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轉变，这是严重的錯誤”。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不可分离。目前主要危險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計不足的右傾錯誤。同期发表的韶玉（陈紹禹）“目前軍閥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重复發揮了李立三同志的“左”傾論点。

这一錯誤路綫到1930年九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糾正。

但1931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开始了“左”傾路綫对党的第三次統治。这一錯誤路綫在当时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四、五卷各期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在这个时期的“布尔什维克”所发表的文章中，強調反对立三路綫所謂“用左傾的辭句掩盖他右傾机会主义的实质”，認為当前反右傾斗争的主要内容仍是反对立三路綫，同时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綫的調和投降。（如四卷一期“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立三路綫”及“三中全会的錯誤与共产国际的路綫”等文）“九一八”以后出版的四卷六期发表的議决案：“由于工农紅軍冲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机逐漸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以及1932年七月出版的五卷一期上发表的“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

‘圍剿’与我們的任务的決議”等文，則是第三次“左”傾論点的繼續發揮。

“紅旗”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在白區出版的另一秘密機關刊物。先是周刊後改為三日刊，至1930年八月和江蘇省委的機關報“上海報”合併成“紅旗日報”，在上海出版，現在已看到的有一百八十二期（其中有幾期殘缺），第一百八十二期的出版日期是1931年三月八日。在1931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黨報的決議中，確定“紅旗日報”為黨中央的機關報。它的任務是“……登載每日的全國的政治事變，傳達各地的革命活動……發布中國共產黨對革命中各個問題的观点与主張。……”。從1930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紅旗日報”的特別緊急啓事中，談到由於敵人的進攻，編輯及印刷地址不能不遷至上海市外，因此在發行工作上不能有絕對的按時送到的担保等情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當時“紅旗日報”的發行是經常在敵人的迫害當中。九月二十九日“紅旗日報”上，又發表宣言號召工人階級支持黨報。當時為了避免敵人的檢查，“紅旗日報”的報頭曾用“海光日報”“東方日報”等化名。

“紅旗日報”的功績，也大體和“布爾什維克”相仿，但由於“紅旗日報”的出版，正當黨內第二、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因此在它宣傳的內容上，曾反映了許多“左”傾的錯誤論點。例如“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條件”、“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論革命高潮”（以上諸文曾在1930年五月出版的“布爾什維克”第三卷四、五期合刊上彙集起來發表過）和“再論革命高潮”等文，特別是“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一文，則是第二次“左”傾路線的集中表現。嗣後發表的“第三時期與中國革命”、“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與世界革命”及“重要省區首先勝利與割據觀念”等文也都反映了“左”傾錯誤。

1931年三月九日，黨又創刊“紅旗週報”，現在已看到的共六十四期（缺兩期）第六十四期出版的日期是1934年三月一日。

當時隨“紅旗日報”附送的一個副刊叫“實話”（五日刊）。1931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黨報的決議中，確定“實話”為中央經濟、政治機關報，它的任務是“對革命策略的進一步討論和黨的路線的更深刻的研究”，以補“紅旗日報”版面的不足。現在已看到的“實話”影印本，從1930年十月三十日的第一期起，截止於1931年共十三期。在這個期間正當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實話”一方面傳達了三中全會的路線和精神（第一期就是三中全會專號）

以及立三路線在各地執行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損失的報道，但另一方面許多篇幅是宣傳了有關第三次“左”傾路線的論點（如1931年一月出版的第七期四中全會專號及其後各期）。

此外，1923年十月二十一日創刊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在1927年十一月又改名為“無產青年”繼續出版，現在已看到的影印本共五期。其中第三期“中國共產青年團中央局擴大會議特刊”集中地指出了大革命失敗後團的工作方向，其他幾期在報道大革命後國內鬥爭形勢以及宣傳列寧主義（第五期為列寧、李卜克內西紀念特刊）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1928年十月，“無產青年”又改名為“列寧青年”，並曾用“光明之路”作為化名。到1930年九月又改為周刊繼續出版，1932年被迫停刊。

“中國工人”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此期間出版的自己的機關刊物，用它來指導在反革命血腥統治下的工人運動，於1928年十二月創刊。現在已看到的影印本截止於1929年五月的第八期。“中國工人”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國民黨極端恐怖統治下出版的指導和報道工人運動的唯一的機關刊物。在第一期卷頭語中就明確地提出了“現在全國工人的燈塔，工人階級的指導者——‘中國工人’復刊了，我們慶祝它永遠指導着工人階級，長久的照耀着全國工人，引導我們出黑暗而入光明”。為了避免敵人的檢查，“中國工人”曾以“漫畫集”、“愛的叢書”等名偽裝封面。

在卷頭語的思想指導下，“中國工人”在報道大革命失敗後國內外工人的生活與鬥爭情況（如第一期、第五期、第八期）、揭露帝國主義及其御用的黃色工會和工賊破壞工人運動的陰謀（如第二期反國際聯盟勞工局長湯麥特刊，及各期“鐵刀與斧頭欄”），以及鼓舞全國工人階級繼承先烈光榮的革命鬥爭精神奮勇前進（如第三期廣州暴動一周年專號，第六期“二七”周年紀念特刊）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影響。

在這個期間，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城市中領導的以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其主要內容的革命文化運動，和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魯迅先生是這一戰線的主將，在當時出版的刊物上，用他的雜文作為“匕首”和“投槍”與各色各樣的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比如當時他發表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新月派批評家的任務”，是用來和反動的買辦資產階級流派——“新月派”作鬥爭的武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是用來和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作鬥爭的武器；“論第三種人”和“又論第三種人”是用

以对“文艺自由論”和“第三种人”作斗争的武器；另外，他的“論語一年”、“小品文的危机”等文，則是和引导讀者脱离实际斗争的“帮閑文学”作斗争的武器。

当时，党是通过“左翼文化总同盟”来领导这一斗争的。左翼文化总同盟包括“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戏剧家、新闻记者……等联盟。各自出版了许多刊物。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机关刊物有“世界文化”、“文化月报”、“艺术新闻”、“文化新闻”等。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左联”秘密发行的机关刊物叫“前哨”（后改名为“文学导报”）。“社会科学家联盟”出版的机关刊物是“社会科学战线”，其任务为反驳非马克思主义及驳斥假马克思主义（如取消派的理論）为中心，并发表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指导理論等。除了“社联”的刊物外，在这个时期由于大革命失败后，人們特別感到革命理論的重要，从1928年起，社会科学的理論著作大量翻譯过来，据統計1929年一年里面，除文艺理論外，出版的社会科学叢書达一百五十多种，如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帝国主义論”等巨著，都在这时翻譯和大量印行。在宣傳馬列主义理論的刊物方面，則有“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中国农村”等。

“文化批判”是1928年一月創造社出版的一个綜合性的月刊。在它創刊的祝詞中，就明确地提出列宁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运动”的名言。它一方面用很大的篇幅广泛地向讀者介紹馬克思主义的各个領域的基础知識；另一方面还就如何建立无產階級革命文学問題提出若干主張，并发表了一些革命文学作品。

“文化批判”停刊后，創造社出版了“思想”月刊。它和“文化批判”一样，是綜合性的刊物，除刊登介紹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也常发表文艺作品，經常写稿的有彭康、李初犁等。从第三期起，根据讀者意見，取消文艺欄，成为純社会科学的刊物。

“思想”出了几期之后又停刊，接着出版的是“新思潮”月刊。“新思潮”是1929年十一月在上海創刊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論述中国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現狀和批判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理論。当时，为了粉碎取消派关于中国革命問題的謬論，这个刊物在第五期上发表了王学文等同志的文章，彙成“中国經濟研究專号”，引起了和托洛茨基匪徒关于中国社会性

質問題的論战。

“中国农村”是“中国农村經濟研究会”主办的以研究中国农村經濟問題为主的月刊，1934年十月創刊于上海，經常写稿的有薛暮桥、駱耕漠、千家駒等。在“新思潮”和托派的論战中，因为对托派的論点沒有徹底地清算，因而“中国农村”又曾和托派展开关于“中国农村經濟性質”問題的論战。此外該刊对旧中国的农村經濟和农民生活及其斗争狀況也有較深刻的論述和报导。

以上这許多的刊物，在当时傳播革命文学和宣傳馬克思主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向中国东北大举进攻，蔣介石政府坚持美国內战政策，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蔣运动的高漲。在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狀況的这一形势下，宣傳抗日救亡的民主报刊風起云涌，單在上海出版的就有一百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邹韬奋主編的“生活”、“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等一系列的刊物。

“生活”是1925年冬在上海創刊的，原是“中华職業教育社”的刊物。1926年起由邹韬奋主編，起初內容只是談些个人修养，和进行一些“職業指导”，1932年起該刊与职教社分立，独立出版，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它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号角，于1933年被反动派查封。“生活”被查封后，邹韬奋的朋友杜重远繼承了“生活”的傳統，主办“新生”周刊。1935年五月四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刊載了易水（艾寒松）著“閒話皇帝”一文，泛論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日本駐沪总領事借口該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議，要求封闭“新生”周刊社，懲办主編杜重远及“閒話皇帝”一文的作者等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当即表示全部接受。結果“新生”被封，杜重远被判徒刑。

“新生”停刊后，1935年十一月邹韬奋回国改出“大众生活”（周刊），这时正当“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大众生活”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高漲、特别是对“一二九”运动的声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出刊到十六期亦被查封。繼又出版“永生”周刊，由金仲华主編，出到十七期再被查封。1936年七月邹韬奋又将原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准备移到上海出版，但邹韬奋回到上海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撓，迟迟不能复刊，因此將原“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先行出版，但到同年十一月邹韬奋被捕后，該刊亦被封闭。

在这个时期，宣傳抗日救亡的除上述刊物外，还

有“世界知識”，“讀書生活”等。

“世界知識”是国际政治、經濟、文化半月刊。1934年九月在上海创刊，由胡愈之、錢亦石、張仲实、林默涵等主編，1936年起金仲华参加編輯工作，1937年十一月在上海停刊后迁武汉繼續出版。“世界知識”在揭露1929年世界資本主义經濟危机以来，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采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压迫手段，对中国和其他亞非国家的弱小民族进行瘋狂性的侵略，以及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利益的矛盾等方面都作了較詳細的介紹和論述；同时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进行着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苏联和亞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方面也作了較詳細的报导。在“世界知識”创刊辞上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它（指“世界知識”——作者）將帮助你認識世界，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的途程上，它將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讀書生活”是1934年十一月在上海创刊的，由李公朴主編，艾思奇、柳湜等为編輯人，該刊对象以職業青年为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最初即在該刊发表。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在1927年退出革命的民族资产階級，这时也开始改变了政治态度，要求抗日救亡。代表民族资产階級的“申报”反映了这个抗日的傾向，如申报館主編史量才，在“一二八”后的言論中，不仅要求抗日救亡，而且要求国民党变更“剿共”政策，1934年十一月被国民党特务在滬杭公路上暗杀。而这个时期的“申报”也相应地作了一系列的革新，如改組了副刊“自由談”，创办“申报月刊”、“申报年鑑”，編印“中国大地圖”等。副刊“自由談”是在1932年十二月一日改由黎烈文編輯，这个时候的进步作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叶聖陶、郑振鐸等經常在該刊上发表文章。“申报月刊”也是由史量才发行的，自1932年七月十五日创刊至1935年十二月十五日共四卷十二号，繼在1936年一月又改为周刊繼續出版，直至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而中輟。“申报年鑑”1932年创刊，嗣后每年改編出版，至1936年出至第四期后中輟。这些刊物都表現了抗日救亡的傾向。

二 在苏区出版的报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苏区也出版了不少刊物。中央苏区出版的党的刊物方面有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战斗”（1931年七月一日创刊）、“实話”（1932年二月出版）、“斗争报”（1933年二月出版），以及苏区中央局組織部出版的“党的建設”

和共青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話”等。

在中央苏区政权系統方面出版的主要报刊有1930年八月十五日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出版的“中国苏維埃周报”，和1931年七月中华苏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出版的“苏維埃”以及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紅色中华”（1931年十二月创刊）等。在軍事系統方面出版的主要刊物則有“紅星报”（1931年底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出版）、“火綫”（工农紅軍第三軍团政治部出版）以及1933年十月出版的“捷报”等。

这些刊物除“斗争报”、“紅色中华”、“紅星”等少数刊物外，大部分都因当时緊張的軍事斗争和極端困难的物質条件只出几期就被迫停刊了（如“战斗”报、“中国苏維埃周报”、“苏維埃”），一直到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战争取得胜利后，情况才有了較大的轉变。而在这个期間出版的刊物中，則以“紅色中华”报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党在革命根据地創办的第一个中央性的群众性的政治報紙。

“紅色中华”于1931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贛南瑞金县城北的叶坪出版。初为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自1933年二月十日第五十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維埃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但是在实际上当时它是执行着中央机关报的职务。因为这时党的临时中央已迁入中央苏区，原来党中央在上海出版的机关报“紅旗日报”早已停刊。

从1931年末创刊起至1937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新中华报”止，“紅色中华”共出版三百二十四期。头二百四十期是在江西瑞金出版的，1934年十月紅軍开始长征后，曾暂时停刊。后八十四期則是紅軍到达陕北后出版的。

“紅色中华”出版的时候，正是第三次“左”傾路綫統治了党的領導机关，因此，它曾傳播过不少“左”傾分子的各种錯誤主張，如傳播过左的土地政策，过左的工商業政策，过左的劳动政策，过左的肃反政策等；但“紅色中华”在帮助党建設苏区和組織当时的革命战争以及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各种罪行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宣傳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張，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曾起了重大的作用。

例如“紅色中华”从创刊到1932年六月第四次反“圍剿”战争开始之前，它宣傳的中心内容是圍繞苏維埃中央政府的指示，号召和动员全体干部起来積極参加以建設基層苏維埃政权为中心的建政运动。为此，并从第五期起辟“苏維埃建設”專欄来推动运动

的开展。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下，直接的战争动员就成了“红色中华”的宣传中心，在这个期间，它帮助党和苏维埃进行了多方面的战争动员；特别是帮助党和政府筹措战争经费的宣传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1933年三月至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党和苏维埃政府曾先后发起了查田、扩军、经济建设等几个对反第五次“围剿”准备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群众运动。“红色中华”对这几个运动都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比如当时登载的毛泽东同志写的“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重大中心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差别进行查田”等论文，都是为了指导和推动查田运动而发表的。此外，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志1933年八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即“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著名的论文。这篇论文第一次为我党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尖锐地批评了各种忽视经济工作的倾向和领导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扩大红军方面，这个期间的“红色中华”反复地向苏区广大人民宣传了党和苏维埃的指示，报导苏区人民热烈地参加红军的英雄行为，在广大人民中掀起了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到红军中去的热潮。

此外，“红色中华”还会连续地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我党与苏维埃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表的许多宣言、声明、通电。如1932年四月十五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了对日作战；同年十月六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的反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调查报告的通电，揭发了英美帝国主义出卖中国、讨好日本的罪行；1933年一月十七日发表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停止战争，共同抗日；同年六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的反对国民党签订塘沽协定出卖华北的宣言，重申了上述主张；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反对国民党对日直接交涉的宣言，指出了国民党直接交涉的美国阴谋；1934年四月十日，我党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民众书，提出了“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一致对日作战”；四月二十七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四一七”声明的谈话；同年七月十五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组

织了以方志敏、寻淮州同志为领导的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以上文件，“红色中华”均全文发表。

“红色中华”除了以显著地位刊登了上述有关国家命运的这些宣言、通电、声明外，它还尽力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广大人民进行了解释和宣传，号召为实现这些文献中的主张而奋斗。例如，当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时，“红色中华”发表了“纪念五一与拥护中央政府对日宣言”；当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抗日的宣言时，“红色中华”又发表了“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论，再次说明了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严正地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的他们之所以不抗日，是由于红军“捣乱后方”的谣言；当毛泽东同志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四一七”声明时，“红色中华”又发表了“国民党卖国贼的无耻和可憐”一文，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颂扬“四一七”声明的可耻行为，使两个声明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当红军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时，“红色中华”用走访毛泽东同志的形式，向全国人民阐述了红军这一举动意义，指出了“援助我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阻挠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是全国人民的重大任务。

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这些文献，对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中央苏区出版的刊物外，其他苏区地方党的组织也都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如陕西省委的“红旗”、“西北红旗”，陕北特委的“西北斗争”，河北省委的“出路”、“北方红旗”、“火钱”，满洲省委的“满洲红旗”、“斗争”，山东省委的“山东红旗报”，福建省委的“红旗”、“烈火”，闽浙赣省委的“红旗”，江西省委的“红色江西”，粤赣省委的“前线”，两广省委的“两广实话”和“两广红旗”等。但这些刊物，散失的很多，还需要进一步去搜集。

更正

本刊1957年8月号世界历史参考图片第三图的“石狮”应为“石羊”，第四图说明中“第二十王朝”係“第十九王朝”之误。

又10月号第23页右栏注②“В Индии”应排为“в Индии”，注③“голуб”应作“голод”，第25页左栏第8行“(要)”应为“(四)”，第27页左栏第9行“这次起义”应为“这两次起义”，第28页右栏第13行“鼓励者”应为“鼓动者”，第20行“争取独立”应为“争取独立史”。

記1930年九月中国工农紅軍解放吉安城

江西吉安高中历史教研組

吉安市，位赣江西岸，上距市中心約五里許的神岡山，有溶江合瀘水、禾川來匯，水陸舟車，輻輳于此，因而从李唐到清初，它就成为由長安到达广州港的必由之路。到了清室中叶，欧美資本主义入侵，通商互市，它在交通上的地位，不如海禁未通前的重要；但在江西本省來說，它不但还是南昌、贛州間的轉運要冲，而且还依然是吉安府旧属十县（以下简称为吉安区）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中心。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吉安东固的土豪、劣紳、地主階級又来統治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这时賴金邦同志即利用原农民协会的九支槍来武装自己，并联合附近各地的革命人民，割据东固，发动对地主的武裝斗争，不断扩大革命力量，經常在泰和、兴国、吉水、永丰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打击豪紳地主階級。

到1928年，吉安縣的地主武裝——值夏、陂头、新圩、新安、富田五市联防的靖衛队，在罗炳輝同志的领导下，由值夏开往新圩，举行起义，倒向人民，倒向紅軍，倒向中国共产党，扩大了紅軍力量与割据地区，形成了对吉安城四面大包围。

1930年夏秋之交，紅軍形成对吉安城的大包围之前，吉安区各县的豪紳地主，一个个莫名震駭，紛紛逃亡。其中少数有钱的向南昌、贛州、長沙等地逃命，而大多数的則是逃向吉安城。在其逃到这座孤城而后，即与反动的地方政府和反动駐軍，串通一气，今日发电报，明日发快邮，頻頻向反革命头子蔣介石請願請兵，向紅軍进攻。而反动的吉安縣長彭学游和反人民的吉安駐防軍師長邓英，則强迫当地人民，从螺子山經眞君山、天华山而到神岡山，建筑一条兩端接着贛江的战壕，在战壕边架設兩重鉄絲網，还在上述諸山頂上，增筑些堡壘，企圖保此孤城，等待其所謂的援兵的到来。然而事实上，恰恰和敌人的幻夢相反，英勇善战的紅一方面軍，在毛澤东同志、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結合各县工农武裝，对吉安城連續进行了八次圍攻后，终于在1930年九月（即农历八月十三日）深夜，突破了敌人的眞君山陣地，由北門进入吉安城，吉安市民热烈地欢迎紅軍的到来，庆幸着自己获得了解放。据说紅軍突破眞君山陣地的

一角，得力于軍民合作捐草填壕所致。因此，当时吉安流傳着这样一个歌兒：“不怕你邓英壕溝修得好，只消我一人一把草。”

紅軍首次解放吉安城，为时虽仅四十五天，但是，由于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紅軍在解放吉安城后的种种正确措施，給予吉安市民以永远不可磨滅的印象：

（一）紅軍具备了鉄的紀律：在旧历八月十三日上午，双方有过一陣槍砲声，下午便慢慢减少，到夜晚，便“槍林彈雨寂无声”了。这时，躲在吉安城的豪紳地主，滿以为是紅軍退了，那知“槍林彈雨寂无声”的时候，正是反动軍隊邓英在偷偷地逃跑，也正是工农紅軍快要进城的时候。由于紅軍有鉄的紀律，以至在进城后，沒有惊动市民的睡夢，直到第二天早晨，市民才发見一队队、一排排站在屋簷下的都是紅軍，知道他們正在等待命令，确定住所。在未得命令以前，沒有一个紅軍进入民房店鋪。在分配住所后，又認真貫徹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比如：当时城内夏官第某戶有一产妇的房門，拿給紅軍做床板，后被官長发现了，認為产妇非尋常居民可比，不能受風受寒，馬上叫士兵把那扇門上回去。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总之，工农紅軍，具备了鉄的紀律，真正做到了“武力与群众相結合，武力是人民的武力”。

（二）解放吉安后的具体措施：

（1）組織方面：党的組織是贛西南特別委员会，其下設贛西南办事处，指导县市苏維埃执行政令，配合政府执行党的政策。在群众团体方面，則有：总工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医师公会、工人糾察队、少年先鋒队、兒童团等組織；其中以工人糾察队維持治安，以兒童团檢查交通，非有組織上的放行条子，任何人不得进出城防，防止坏分子的逃跑与混入。其他各种組織，亦是積極行动，發揮了組織力量与个人力量，做好一切工作。

（2）鎮反方面：成立肃反委员会，发动各县群众，进行清乡。由是各县各乡的赤衛队，都来到吉安城，清查本县本乡逃亡到吉安城的豪紳地主，分別輕

重，給以应得的处分。

(3) 財經方面：为了解决紅軍給养問題，在进入吉安城后，正确地执行了毛澤东同志对待中間階級的政策，糾正了以往打击小資產階級的过左政策，禁止高抬物价，平买平卖。因此，在紅軍进城后，市面异常活躍。关于筹措軍餉，亦是通過商民协会，分別殷实，决定認筹数目，在这样的正确措施下，吉安市商民踴躍輸捐，單是第一次，即募足六十萬元；第二次則募得了更大的数字。其次，紅軍在吉安城的四十五天中，还印刷了一种紙幣，但未在市面行使。至于繳获貪污土豪地主买办階級的金銀財物，一概归公。

(4) 济貧方面：紅軍在解放吉安城的四十五天中，对于城市貧民，加意爱护，加意救济。救济的办法是：一方面將沒收地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买办商人及重利盤剝穷人的典当業的衣物用品等等，散給平民；散发时，以鳴鑼为号，齐赴中山場（今井冈山紀念堂）領取。另一方面开放吉安义倉，把积谷散給貧民。

(三) 对党和紅軍領袖的回忆：吉安市民对于1930年党和紅軍領袖毛澤东同志、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的来临，现在还记忆犹新。尤其是对毛澤东同志，印象更加深刻：他們还說得出他住的地方，是吉安正大街的一个商店，这个商店便是現在中永叔路的源源商場；他們亦說得出他在吉安城时，常常工作到深夜，連吃飯都沒有工夫；还說：他对人和藹，有暇就会和店員們談天，問長問短。有一次，一个市民送他一个柚子，他当即剝开，分給在他旁边的人們共吃。因此，人民群众和他，亲密得不得了，而他亦从此了解了吉安市的許多真实情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他真是說得到，做得到。

紅軍解放吉安城，引起了反革命头子蔣介石的震駭，馬上調兵遣將，从樟樹、宜春等地分別向吉安城进犯。这时候的紅軍，还处在敌强我弱的情況下，在解放吉安城的四十五天以后，已完成任务，便作了主动的退却：首先是將在吉安市所募集和所繳获的物資与用品，如金銀、食盐、煤油、藥品、五金、印刷机、縫紉机等等，撤退到最安全的后方。其次把所有到达吉安及其附近的紅軍，分批分头由神岡山方面渡河，回到东固等革命根据地集中，准备迎击未来的敌人。直到紅軍安全撤退完毕后，敌军罗霖雨部的77师，在用飞机偵察后，才敢由北門进入吉安城。

1930年九月紅軍解放吉安城，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十五天，但在革命史上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 紅軍解放了贛江中游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的吉安城，引起了敌人的極大震駭，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內（1930年十二月——1931年七月），曾經三次集結兵力“圍剿”紅軍，結果，紅軍報之以反“圍剿”，徹底粉碎了敌人的“圍剿”。这，不但扩大了紅軍的力量，而且还鼓舞了和提高了吉安区人民对革命会取得胜利的信心。

(二) 紅軍在解放吉安城的四十五天中，散財发粟，周給貧困，满足了貧苦市民及郊区貧雇农民的要求，使吉安区人民深深認識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紅軍是人民的救星，同时亦認識到誰是自己的敌人。因此，在紅軍撤退时，有許多青年工人、店員和市民踴躍参军，扩大了紅軍队伍，发展了党的組織，壯大了革命的力量。

(三) 厉行肅反工作，斗争或鎮压了向吉安城逃亡的各县的豪紳、地主、惡霸，給吉安区的封建势力以严重的打击，鼓动了整个江西的人民，加强了反封建斗争。

(四) 在解放的四十五天中，得到了吉安市民的热烈支援，筹集了相当的物資与用品，再加上沒收地主、豪紳、买办、貪污分子的財物，解决了紅軍給养上的困难，为此后三次反“圍剿”創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七月十六日，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軍，終于最后解放了吉安城！

（上接第39頁）可見当时五行观念的深刻。至于門上鋪首之側，有的尚刻有執戟、帶劍，作拱立的亭長（汉守門吏）。墓門背面有文武官象，文官執笏，武官執節，南陽汉墓即有此例，此等画像殆可視為后代陵墓神道前翁仲的濫觴。至于經濟史方面，更有重要的材料，像过去各地所出土的画像石或画像磚上面，所雕刻的弋射象、收穫象、煮盐象、东市門象等，反映封建社会初期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小市場的容貌，真是历历如繪。八百余年前哲学家朱熹在他的“跪坐拜說”里，已經注意到实物的重要。他說：“其后乃聞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清代的考古学家阮元，在他的“車制圖解”里，結合着文献和实物就能指出：“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画像，石虽殘闕，形尚可辨。其車轡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与古鏤鑄法已不能尽合。”画像石的价值是很重要的。希望学者將現存画像石作一番精密的調查和有計劃的考察、研究，將石刻中有关历史的材料分門別类地选印專集，予以評介，以与文字史料互相參証，則其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上所起的作用一定很大。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選輯 (四)

关于拜占庭的階級斗争

耿淡如 譯注

本节包括两个文件，說明早期拜占庭帝国内階級斗争的尖锐程度。

文件(Ⅰ)——摘自普洛科比阿的“波斯战争史”——說明在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年)君士坦丁堡的尼卡起义(532年)。普洛科比阿是著名的拜占庭官方史家。在本文里，他描写尼卡起义的全部过程，从开始到结束，表明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情形，市民所受的残酷剥削，群众(包括若干元老在内)反抗政府的激昂情绪，以及镇压“叛乱”的血腥行动。他称这起义为“叛乱”，起义者为“暴徒”；但从性质来看，它是一次壮大的民众起义，一次激烈的阶级斗争；因用“尼卡”(意即胜利)为暗号，它被称为“尼卡”起义。

文件(Ⅱ)——摘自“提奥斐的續述者”(Theophanis Continuatus)——說明普馬斯拉夫起义的范围。作者是有偏见的，强调起义中的混乱和破坏情况，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占领的领土内普馬斯拉夫竭力禁止搶劫，維持秩序。这次起义从820年延續到823年，几乎波及全部小亞細亞；被压迫的不滿意分子大批参加起义軍。对下列兩点，該予注意，(1)这次起义是拜占庭封建化过程中农民反对封建主的一次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其中斯拉夫人的农民公社起着很大的作用；(2)这次起义是有阿剌伯人的外援的。

——譯者

Ⅰ 君士坦丁堡的“尼卡”起义 (532年)

約在同一时期，拜占庭民众間突然爆发了叛乱，这叛乱出乎意料地特別广泛地蔓延开来，它对民众和元老都有極大危害的結果。下面就是这次叛乱的經過情形。好久之前，各城市的居民已分成为藍党和綠党^①，但是，有人为了这些名义，为了看賽馬所坐的位置，竟至花費金錢，遭受極殘酷的肉刑，甚至恥辱的死亡而不惜，那还是新近的事情。他們和反对党进行毆打，連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遭受着危險；相反地，明知他們在毆打中，即使能够打败对方，但所可期待的，不外乎是关进牢監和身首异处而已。他們对反对党的仇恨，是无緣无故地兴起来的，而且永远存留着。他們对所有的亲属、姻戚、朋友的关系，

都可相应不理；甚至同胞弟兄，一人加入一个顏色党，另一人加入另一个顏色党，常常互相爭吵着。他們所关心的不是神事，也不是人事，祇是要打胜反对党人。他們漠不关心任何方面有触犯神明的行为；也不注意自己人或反对党人破坏法律和侮辱市民团体的罪行；因为他們即使在自己穷得要死，可能衣食不周的时候，即使在祖国危急存亡的时候，都是无动于衷，只要他們方面〔党〕是順利的話；他們称自己的同謀者为“自家人”。甚至妇女們也参加这类勾当；她們不一定依循其丈夫的意見，而且甚至加入反对党方面，尽管自己不要去看賽馬，尽管没有什么理由来激动她們这样地参加。我无以名之，名之为精神病。各城市中居民間所发生的現象，原来便是这样！

約在那个时候，城市当局把这些暴徒中的若干人，判处死刑。于是兩党言归于好，联合起来，要救出那些將被处决的人。他們立刻冲进牢監，釋放那里所有的犯人，不管和暴动有关与否；而且不問情由，把城市政府的官員痛打一頓。

当时，所有和暴动不相干的市民逃到对面的大陆上去。城市好像已落入敌人的手里，各处起火焚燒。索斐亞大教堂、塞夫克西伯浴場、皇宮，从“柱廊”起直到所謂阿里宅邸，都化为火燼；此外，还有那条綿延到叫做君士坦丁廣場的巨大柱廊，好多富翁的住宅以及大量財物也同归于尽。皇帝和皇后連同几个元老被困在皇宮內，不知所措。城市居民^②互相傳述暗号“尼卡”(胜利)，因此，这暴动至今被称为“尼卡”叛乱。

① 藍党与綠党是賽馬場上的競技党。它們以顏色为标记，是帶有政党性質的。参加藍党的有隶农和城郊佃人。参加綠党的有水手，小商人，手工業者。——譯者

② 这里原文是“吉姆”(Дим)。按广义“吉姆”指城市的全部住民。按狭义，“吉姆”是和競技党相联系的組織，联合这个或那个街区的住民，支持这个或那个競技党(藍党或綠党)。——譯者

在这个时期，約翰·卡巴杜基雅宁是皇宮總監^①，突列波尼安是皇帝的顧問大臣，或者像羅馬人称之为大法官，生于旁非利亞省。約翰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从文法教师那里，只学会一些書写信件，此外沒有別的，而他所写的信件既恶劣又不連貫；但是論及他的机謀，在我們所熟知的人中，却无有出其右者。他能当机立断，并善于应付最困难的局面。正因为是最坏的坏人，所以他使用其一切才干去做坏事。他目无上帝，而在人前，也不觉得有羞耻之心；由于自私自利，他毁灭了很多人和好几个城市。在短期內，他发了大财，遂沉湎于狂飲；在午飯之前，他掠夺居民的财产；在午飯以后，他消磨時間于狂飲，于最下流的淫乐，而对于这些，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自抑止。不到厭膩，不到嘔吐，他决不停止狂飲大嚼。他随时准备盜窃金錢，而且更加准备濫用金錢。約翰便是这样的一个傢伙！

突列波尼安^②很有才干，在學問方面造詣很深，不遜于当代的任何人，可是他利慾薰心竟至荒乎其害，在司法方面随时談生意經。他每天依照請求者的需要，有时取消，有时制定法律来出售。

当城市里不同的顏色党发生爭吵的时候，誰也不去注意这两个傢伙对社会所干的犯罪行为。但是，当兩党像上面所說，联合发动叛乱的时候，大家就公开辱罵約翰和突列波尼安，并到处找寻他們，想要杀死他們。皇帝为要討好民众，立刻把这两个傢伙免职。他任命貴族福卡为皇宮總監，一个很有理智而正直的人；又擢任瓦希利德为大法官。后者系出显貴家庭，在貴族之間以和藹著称。虽然如此，动乱还是繼續有力地展开。在叛乱的第五天晚上，皇帝查士丁尼帶領了故皇帝阿那斯塔希的姊妹所生的外甥——伊伯第和波姆比——溜到自己的住宅去。他疑慮他們会謀害他的生命，或者命运本身会引导他們走到这个地步……。另一方面，他們因为恐怕民众要迫使他們接受皇位，像后来果然发生的那样，告訴皇帝說，他們認為在这样危險的局面下，不該离开自自的皇上。这句话反使查士丁尼更加疑心，因而馬上命令他們滾出去。他們就听命回家，安靜下来，时已深夜。

第二天黎明时，民众間傳布着消息，說那原住在皇宮的兩個人已經离开那里。民众大家奔赴他們那边，宣布伊伯第为皇帝，并蜂拥他往廣場去，要迫他接受管理国家的大权。伊伯第的夫人曼丽，一个聰明而又以淑德著称的妇人，拼命拉着丈夫，不肯放手，高声叫喊說：民众把她的丈夫綁赴刑場；央請所有的亲人給予救助。但是，民众声势汹涌，因而曼丽不得不把丈夫放走。民众不管其願意与否，拥伊伯第到君

士坦丁廣場去，并請求他接受最高政权。因为叛民沒有置备好皇冠或其他可裝飾皇帝的东西，所以他們就把黄金鏈子，套在他的头上，并宣佈他为羅馬人的皇帝。其时那些留在皇宮外的元老召开會議。会上，有很多人发表意見，主張即用武力来进攻皇宮，当时有一个元老奧列汉，站到前面，发表如下的演說：

“羅馬人！目前局势除战争以外，沒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大家承認：战争和皇帝政权应認为人世間的最重要的事件。但是偉大事業，决不能倉猝完成的，而只有依賢明的意見，以强大的实力，并在長时期內，才可實現，所以，如果我們立刻进攻敌人的話，那么把我們的事業，像俗話所說，放在剃刀的鋒芒之上；我們的命运在瞬息之間，即可決定；我們应对所可伴隨而来的后果負責；不論感謝幸运也好，埋怨幸运也好；因为一般講，所有倉促进行的事情都依靠幸运的威力；可是，如果我們能多些沉着地締造我們的事業，我們就有可能在皇宮中活捉查士丁尼，尽管我們不想要这样；而且只要讓他尽速逃去，他会乐于逃走的。凡是被人輕視而天天喪失其力量的政权，照例要崩潰的。我們另有其他皇宮，如普拉基尔宮以及所謂爱里尼宮，从那里，新皇帝可指揮作战，并最适合地管理一切。”

奧列汉这样地說完了。当时，其他元老像在群众大会中所存在的情况那样，想要尽快开始行动，主張事情干得愈快愈妙。伊伯第本人的意見也是这样。他認為自己一定要被毁灭；所以他命令出发往賽馬場去。有人說，他所以往那里去，只是因为要对皇帝保持忠忱。

其时，在皇帝那边也进行會議：討論應該怎么办；留在宮里，还是搭船逃亡。意見紛紜，莫衷一是。最后皇后斐娥多拉講話說，“今天如果有人还在議論婦人不該在男子中間放言高論，那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現在男人們对于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的問題，处于躊躇莫決的状态中。在这样危急的局势中，應該找出最好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的問題。依我的意見，今天，逃亡是最下的下策，即使它能够使我們获救，對我們來說，也是比任何办法更多不利。人生在世間，不可能不死，但一度曾做过統治者而变为流浪飄泊者——那就不堪容忍了！願上帝不讓我失掉这件紫袍，而活到使相逢者不把我看作皇后来迎接的那一天呀！所以，皇上！如果要逃命的話，那是不难的！我們有很多錢，这里有海，这里有船！但是請您想

① 皇宮總監的权力仅次于皇帝，被称为“无冕皇帝”。

——譯者

② 他也是編訂“查士丁尼法典”的指導者。——譯者

想：在您逃命之后，会否觉得当初宁可死去，不该作此偷生呢。我爱这句常言：‘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殭屍衣’。”

皇后講完这番話后，大家都被感动。各大臣变为意志坚定，进行討論：如果叛徒向他們进攻，將怎样来保衛自己？当时，駐在皇宫附近的军队以及其他部队，并不效忠皇帝，观望形势的发展，因而他們不願公开参加行动。所以，皇帝的全部希望寄予貝利撒留和蒙德身上。

其时，伊伯第到达賽馬場，昇登那皇帝的位置，并坐入那皇帝的宝座上，从那里皇帝往常观看賽馬和操演。貝利撒留一开始，就直向伊伯第和宝座撲去；当到达那座常驻守衛队的附近房屋时，他大声叫喊守兵，命令他們立刻开放大門，使他能够走到篡夺皇位者那边。但是当胜利誰属尚未分曉的时候，兵士不願站在哪一方面，所以裝痴作聾，置若罔聞。貝利撒留回到皇帝那边，告訴他：对他來說，一切完蛋，因为甚至那些受命保衛宮殿的兵士也反对他了。皇帝命令貝利撒留向霍尔克和那里的“柱廊”走去。貝利撒留費了巨大气力，不是沒有危險地穿过廢墟和半燒毀的地方，进入賽馬場。于是他站到皇帝的位置右方的藍柱廊旁，起初要想進撲伊伯第本人，但是就在这里，有一小門，那时已經鎖上，并由伊伯第的兵士在門內保衛着。因此，他害怕民众將在这样的路上进攻他，歼灭他以及他的队伍，然后他們將更易于进攻皇帝了。所以他决定最好先进攻民众，进攻那些站在賽馬場上毫无秩序的、互相挤軋的无数人群。他抽出宝剑，命令其兵士学他的样，向群众队里边喊边冲。那些烏合的群众，当看到那享有勇敢和战斗經驗盛名的全副武装队伍猛烈地进撲时，即拔脚奔竄。喊声震天。当时，蒙德，一个勇敢而有冒險性的人，站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想要参加行动，但是在目前情況下，他已不知道怎么办。最后，他猜想貝利撒留已在行动，所以他就穿过那叫做“尼克拉的”〔死的〕入口处，冲入賽馬場。那时，伊伯第的叛徒受到兩面的夾击而归于歼灭。結果，完全胜利；大批民众遭受屠杀。据估計，被杀者在三万人以上。那时，再也沒有人敢反抗查士丁尼了。他的两个侄兒伏萊德和尤斯特，把伊伯第从宝座上拖下，并帶領他連同波姆比走到皇帝面前。依皇帝的命令，他們被关入窄狹的牢房里。波姆比痛哭，并講些訴苦的話，他从来没有嚐过人生的苦难；但是伊伯第責备他說：无辜遭到死亡的人，不该哭泣，一开始，他們不得不迁就民众的暴力，而后来到了賽馬場去，也沒有反抗皇帝的意圖。第二天，那兩個人被兵士杀死，而他們的屍体被投入海

中。皇帝查封他們的财产以及一切参加过他們方面的元老财产，并使之归入国库。后来皇帝对全部元老及伊伯第和波姆比的兒子們，恢复他們原来的地位，并归还那些尚未被他的亲信分去的财产。拜占庭叛乱的結局，便是这样。

（譯自柯斯敏斯基主編，“拜占庭社会經濟史文献彙編”，莫斯科，1951年，頁54—57）

II 督馬斯拉夫起义（820—823年）

那一时期，在东方开始的骨肉相殘的內战，充滿着各色各样的灾难，并使人口趋于縮减，因为父亲武装起来反抗兒子，弟兄反抗同胞弟兄，朋友反抗最好的朋友。这事件的发动者是督馬。关于督馬，有兩种傳說……一种傳說——那是我所相信的——是根据若干文件的，說：督馬出身于非貴族的貧穷的父母，其时为斯拉夫人，那些斯拉夫人在东方时常可碰到。由于飢寒所迫并找寻幸运，督馬潛入我們的大城市……〔后来〕他逃到阿剌伯人区。由于多年的适当办事，他获得阿剌伯人的信任，并由于放弃基督教，成为军队的首領，武装反抗基督教徒，并允許阿剌伯人征服羅馬人，把統治权归入他們手中。又为了要在羅馬人間出現而沒有阻礙，并使其全部党人为他置生死于不顧，他冒称自己为契那之子，君士坦丁……又因广大的冒險事業与成功的玫瑰色的希望，需要心腹助手的参与，所以督馬收养义子，給予充分军队，并賜予君士坦丁的姓氏。

另一种傳說是：那个督馬就是过去和伏达尼一起的，并从称帝的利奥，获得榮寵。他指揮“联邦軍”，駐在阿那托利亞州〔軍区〕。当时，他听到迈克尔杀死利奥的消息。督馬决心要为利奥复仇（同时，发洩其对迈克尔的私人的嫌隙，从青年时期起，兩人即告不睦）。对于費洛米利修道僧所作关于自己命运的神籤^①，他又半信半疑。所以，督馬起兵反抗迈克尔，使一切能执武器的成年人都站在自己方面。当时，大家不满意迈克尔，因为他属于惡毒的河芬加尼^②昇端派；又因为他說話口吃，有怯懦人的声名，特別因为他的性質像他的說話一样，优柔寡断。民众嫌惡他，并把他作为他們的負担。另一方面，督馬虽然跋扈与出身蛮族。但有令人尊敬的斑白头髮，又有特別可爱的、和藹可親的态度。此种态度为士兵群众所

① 神籤涉及当时同党派的三个人——利奥、迈克尔与督馬。預測皇冠似乎將归于前二人（利奥第五与迈克尔第二），而第三人——宣布为皇帝后，即將死去。

② 阿芬加尼（Афингано）是小亞細亞的一种很神秘而尚未完全了解的教派。

爱好。他从青年起，即具有这些特点，而且在体力和勇敢方面，又不遜于任何人。所以，督馬能吸引政府稅員到自己方面，并用慷慨賜与方法，努力使群众听命于己，因而他由微賤而变成偉大。对于一切唯恐天下不乱、企圖发财的人，他用劝說与友誼来拉攏，而对于那些由于自己的經驗認識內战灾禍的人，他用威力与不容置辯的命令来压迫他們。因此，內战不是以清水，而是以鮮血灌溉土地，好像尼罗河水灘的洪水暴瀉一样。当时，奴隶反抗主人，兵士反抗將校，中隊長反对大隊長，互相殘杀，可以說，全小亞細亞呻吟于严重灾难之下。有些城市，由于恐怖，投誠督馬，而有些城市，由于对皇帝还有信任，往往反抗，但在市民被杀与被俘的压力之下，后来也不得不俯首听命。全小亞細亞都归向督馬，除在奥伯西基軍区的喀塔基尔与在阿美尼克軍区的奥尔維安兩座砲壘外……阿剌伯人看到这种情况以后，乃欣喜若狂，乘机开始无阻碍地，无恐惧地搶劫地方与島嶼。

督馬，恐怕这种肆无忌惮的劫掠会引起自己軍隊的譁变，乃采用軍法来防止搶劫，并批准以前和阿剌伯人所締結的协定，即他要使所有的羅馬人的統治区屈从他們。此后，督馬由那时安提阿的总主教雅可夫加冕，宣布为皇帝。他招集大軍，不仅从鄰近我們的阿剌伯人中，而且从甚至远离我們的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亞述人、阿美尼亞人、加尔底亞人、伊維爾人、塞科人、卡維爾人以及一切曼尼教派^①的信徒中招募……，督馬把他們圍繞着自己，并在各方面防衛着，于是为打算更好的前途，在新秩序下，改变自己的名字，并收养义子为助手。

〔督馬和迈克尔的斗争，起初胜败互見，后来于823年由于督馬的失敗而告結束。〕

（譯自格拉斯基“中世紀史文獻”，卷I，頁201—203）

① 曼尼教是第三世紀波斯人曼尼所創立。即明暗派，基督教的異端派。——譯者

中苏关系史上的新文獻

（苏）A·H·布洛依娜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苏中兩國人民之間建立了新的友好关系。年輕的苏維埃政府首先决定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享有的全部特权 and 利益。1924年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了苏中协定，这是中国第一次和列强間簽訂的平等条約。

但是，两个鄰国代表之間在个别問題上簽訂单独的协定，却要早得多。我們在新西伯利亞省国家档案庫中所发现的文獻証明远在1921年九月苏中兩國便在边境塔城举行談判，并簽訂了友好协定。苏維埃方面簽訂协定的是西伯利亞革命委员会^①派往中国的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伯利亞革命軍事委员会特派全权代表И·М·波科金。中国方面簽訂协定的是新疆省督軍的全权代表朱方坤（譯音）和翻譯員鮑英圖（譯音）。

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証消灭在苏維埃軍隊攻击下从俄国逃亡到中国的白匪部队。1920年时，白匪魁首之一，沙皇从前的將軍，后任高尔察克的將軍的巴基茨便积极活动，將奥林布爾斯基哥薩克軍团的殘余編成了一支二百人的部队。因受到苏联紅軍的追击，巴基茨便于1921年逃窜到蒙古西部，在那里又与凱科

罗多夫和卡扎捷夫等白匪軍联合在一起，与蒙古人民革命軍展开了武裝斗争。在来帮助蒙古人民的紅軍的打击下，巴基茨被迫退却并隱藏在中国境内。由于巴基茨匪徒威胁了苏維埃俄国和中国的安全，新疆省当局請求苏維埃政府帮助消灭这伙反革命队伍。1921年八月新疆省督軍和西伯利亞革命軍事委员会的代表开始了談判。

談判是在塔城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的。当苏維埃代表团逗留中国期間，中国政府代表团公开表示希望与苏維埃俄国和平友好相处，指出中国和苏維埃共和国的政治經濟利益是一致的，提議在兩國之間尽速締結通商条約，并对紅軍的偉大力量倍加贊揚。

苏維埃代表团团长И·М·波科金在答复的声明中說，中国和苏維埃共和国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并且指出“苏維埃俄国对待被压迫民族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竭尽一切力量帮助他們和帝

① 西伯利亞革命委员会是特設的軍事和行政机关，在1919年至1925年期間它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机关。

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而且愿意与他们完全真诚地和平友好相处”①。И·М·波科金在关于谈判的报告中写道：“我确信，在现在的政治情势下，中国人确是真诚地力求和我们友好相处。”②

协定于1921年九月二十六日签署，其内容如下：

“鉴于巴基茨和其他白匪所率领的队伍于1920年越过中国国境③，并且已在塔城一带停留一年，而现在又违反国际公法，用武力攻占沙拉苏区域，已成为两个邻接共和国安全的威胁，中国方面任命朱方坤和翻译员鲍英图出席谈判关于消灭在省境内白匪队伍的新疆省督军的全权代表，苏维埃方面任命И·М·波科金同志为出席谈判关于消灭在中国境内白匪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伯利亚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特派全权代表，缔结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军进入沙拉苏区消灭该区白匪队伍的协定，其条款：

一、为了彻底消灭在沙拉苏区的白匪部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军可以自行决定作战行动。中国军队要承担保卫后方，防止白匪进入中国内部各省的任务。

二、为了顺利地进行战斗和配合行动，中国的战地司令部和苏维埃的战地司令部应相互交换代表。

附注：即使中国或苏维埃战地司令部的指挥人员代表缺席时，战斗也不能停止。

三、对巴基茨和其他白匪部队的战斗，被认为是两个友好国家的共同事业，中国新疆省当局应该从红军在中国领土战斗那天起供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军作战部队的粮食，四千人每天按六千斤计算，即大约等于一九〇普特的面粉和大米，各按二分之一比例无价交付。中国当局应把粮食运送到布龙——杜哈依城，交给苏维埃红军的指挥部。

四、在对巴基茨进行战斗中，必要时，苏维埃红军指挥部应对中国军队给以炮弹和子弹的支援。”④

第十条规定，为了防止白匪在新疆省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境上重新组织队伍，中国当局“保证把从前和以后进入中国国境潜伏的全部白匪交还给苏维埃政府。其中特别是拘留在杜伯留金要塞的四十九人必须立即交还”⑤。协定用俄罗斯和中国两国文字书写，从签字时起生效。

苏维埃军队和新疆省军队的紧密团结的战斗，终于获得了胜利，全部白匪被歼灭。

新疆省当局在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书中提到“两个

邻接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早在巴基茨和诺维科夫匪徒初次违反国际公法，开始威胁两个邻接共和国的安全时起，就已建立，现在这种友好关系更加巩固了，苏维埃军队进入中国境内，以及这项协定的签订，就是很好的证明。现在，战斗已经结束，我们恳切地希望两个邻接共和国加强友好关系，共同携手朝着经济繁荣的道路前进”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1921年十一月四日的通报中指出，由于实现这个协定，一部分红军从中国当局获得大约一九〇普特的面粉和大米，并得到慰劳品一千隻羊和一百头牛⑦。

战斗行动结束以后，按照条款的规定，协定失去效力。但是，它为以后中苏两国关于友好互助的谈判奠定了基础。关于这一点可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1921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会议记录中得到证实，记录中记载，新疆省督军曾派遣全权代表到沙拉苏谈判关于缔结在边境地带进行贸易的协定⑧。

关于和中国谈判的资料以及И·М·波科金关于调整苏维埃俄国和新疆省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塔城设立苏维埃领事馆、签订贸易协定等项建议，曾发送到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Г·В·契切林于1921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电报中答复了这个问题。电报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表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同意“通过塔什干的对外联络机关，采取适当措施在塔城设立必要的机构”⑨。

由此可见，1921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协定，是1924年协定签订以前中苏友好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吴奇衍译自苏联“历史问题”1957年第3期）

①、②新西伯利亚省国家档案库，15c/p-1全宗，二号目录，五十二号案卷，第四张。

③ 中国政府在1946年才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在这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属中国管辖，并作为中国全部领土的一部分。

④、⑤新西伯利亚省国家档案库，15c/p-1全宗，二号目录，五十二号案卷，第十二张。

⑥ 同上，五十二号案卷，第二十四张。

⑦ 同上，七十二号案卷，第七十张。

⑧ 苏联共产党新西伯利亚省委委员会党的档案库，一号全宗，三号目录，九号案卷，第一一二张。

⑨ 新西伯利亚省国家档案库，15c/p-1全宗，二号目录，五十二号案卷，第一张。



略談汉代画像石及其史料价值

孙 宗 文

画像石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造型艺术，题材往往是写实的，反映着古代社会中的風俗制度。正如俄国作家果戈里所喻：它們是“石头的史詩”，因为它上面能讀到各个不同民族的历史。

一 画像石的起源和它的早期作品

产生画像石的正确年代，因历史久远，难以稽考。依照目前考古材料，在新疆西北部的霍城、昭苏和特克斯以及南疆和閩鄰近的皮山，都曾发现过刻在崖石上的圖案。所刻内容多半是一些牛羊牧群或騎馬射猎等日常生活的描写。它的技法表现出：线条粗壮、形象單純，而且显然看出它是用極尖銳的石塊来刻画而成的。它們是游牧民族的石刻画，我国内地各省很少見到，和汉代画像石有所不同。汉代的画像石，据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所收，存世者以山东沂水鲍家山的元鳳时代（公元前80—75年）之鳳凰画像为最早。其次則是清代在云南昭通出土的孟璇碑，碑面的碑文兩旁，刻有龙虎，其下部則刻有古代人称做“玄武”的龟蛇之象^①，画像为平淺浮雕。依照罗振玉从碑文中的月日干支推考，定此碑为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所建立^②，故石刻画像之風，大約于西汉时代已开其端，主要是碑飾。及至东汉初期，画像由碑飾进而为石闕雕飾，如叶奕苞《金石录补》卷六所称位于会稽（浙江绍兴）东部的都尉路君闕，系永平八年（公元65年）的作品，計有前后兩闕，闕身各浮雕着扶杖負劍的人物，此实为我国石闕刻象有年代可稽最早之例，惜遺物不存，仅凭著录，我們已不能考見它的雕刻風尚。其次是山东平阳县的北陵山石闕。因为平邑在西汉时代是南武陽县的县治，所以过去一般人都称它做南武陽石闕。此闕是現存汉闕中年代仅次于川中梓潼李業闕的一闕^③，闕身周圍有凸起的边框，框內即雕有画像，画像的取材都是些神話中的人物和車騎、演武、乐舞等事迹，虽因石質風化模糊难辨，但細觀其雕刻手法，頗与孟璇碑下部的画像約略相似，

依它的立闕年代来計算，則此实为傳世石闕画像中早期杰作之一。

画像既先施之于碑飾，但怎样又会应用到闕身上面去的呢？原来闕的式样就是从碑演变而来的。因此現存早期的石闕与碑碣的形制，可說極為相似，所不同者仅在它的最上部加一頂盖而已。如上面所談到过的李業闕、平邑三闕均如是，前者系独石所制，銳上而丰下，原系二闕作左右对立狀（俗称双闕），惟現仅存一，并且台基和闕頂也早經遺失。后者闕身几近方形，上部闕頂作四阿式屋盖，屋簷之下雕有斗拱，全体形制頗为壯碩穩健。到了后期的石闕，始在闕身旁边外側另附加一子闕（或称扶壁），闕頂遂呈一高一低狀。試以沈府君闕与高頤闕来作一比較。

按此二处画像墓闕，沈府君闕在四川渠县燕家場，共有二，右者正面刻“汉闕者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左者正面刻“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二闕闕身外側石面特粗，并有榫眼痕迹，殆当初为与圍牆相連着的。闕身上刻朱雀画像，中勒銘記，下琢螭螭，側面复鐫蒼龙及螭（此为川东諸闕特有的作風）。闕頂之下浮雕斗拱一列，其間杂飾人物画像，姿态秀逸，线条頗为生动；虽沈君生卒年代无考，但按照闕的建筑形制与画像雕飾来考察，当与同县馮煥闕約略同时为延光、永建年間（公元122—131年）的作品。至高頤闕在雅安县姚桥，原为东西二闕，現东闕仅余下段之一部，西闕大体完整。一題“汉故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史举孝廉諸部从事高君字貫方”，一題“汉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

① 玄武为古代四灵之一，相傳是保护死者的神物，能守北方，辟去不祥，但其代表物有的指龟，有的指龟蛇合体。除玄武外，其他三灵为守东方的青龙，守南方的朱雀和守西方的白虎。

② 參見神州国光集第八。

③ 李業闕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至中元二年之間（公元36—57年），为四川現存最古的一闕。

举孝廉高君字貫口”。闕系由闕与子闕結合而成，其下承以台基，闕身及子闕表面，均隱起柱枋，其上雕作斗拱，复以四阿式屋盖，闕身重簷，子闕則为單簷。闕的建立年代，因高頤死于东汉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則此闕当是汉末之物。

二 东汉盛行画像的原因和画像石墓的出現

据史籍所载，汉代厚葬和崇飾祠墓之風，不一而足。“生不極养，死乃崇喪”的風气，非常流行^①。到了东汉时，更趋于極端，不仅穷奢極欲的皇室如此，即州郡豪貴以至中人之家亦然。因此随着陵墓建筑的发达便有了画像石刻之風行。

当时不仅建在地面上的陵墓附属建筑如此，即建在地面下的陵墓本身建筑也这样；所以在东汉时代，就有一种專門以画像裝飾为主的石室墓出現，此种將画像石（或画像磚）砌入墓室壁面及主要構件上的坟墓，在今日考古学上就称它做“画像石墓”。依今日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当时画像石的主要应用范围也就在此。

画像石墓导源于古代的石室墓制，但最初墓室之內不施雕刻，如水經注卷八引戴延之西征記所述山东秦王陵制即如此。又同書載“荷水又东逕汉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按朱鮪即朱長舒，冢在金乡县，据宋沈括夢溪筆談称此冢曾遭发掘，其墓室的內壁，即有人物、祭器、乐器等刻画。至此石室建置年代約在公元一世紀中期，殆即当时石室墓壁最早施有雕刻之例。惟山左金石志曾指为唐宋以后物^②，今如細細地去观察此画像拓本上的人物和背景，其綫紋配置等等，的确含有吳道子式样的風格，故迄今它的画像年代，犹屬一謎。汉代更盛行一种就山崖鑿洞墓葬之制，一般人称它做“蛮子洞”的崖墓，其中每有極精致的石刻浮雕圖案，也可算是画像石墓的变体。現在所知道的均屬东汉时代的作品。

汉代画像石墓除发现在上述的山东、江苏、四川諸地区外，河南也是一个重要地区，如約在三十年前所发现的河南南陽之草店、沙岡、石橋、广陽等处汉墓，其墓室的門楣栋梁上許多画像，表現出人兽相斗、乐舞等都極緊張生动。同时依照今日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凡发现規模宏大、画像丰富而制作特精的石室墓，几乎全屬东汉时代的作品。自汉亡以后，这种营墓画像的風气便驟然衰退。但成为許多人士避乱的辽东地区，却仍繼續，不过將刻画改成为繪画，故今日东北所发现的壁画墓，有属于曹魏时代的，如辽陽三道壕令支令張君墓即其一例^③，由此发展而至高句

丽，因此高句丽也盛行了一种以彩繪壁画作为墓飾的石室墓，如在吉林輯安、朝鮮平壤、安岳等地，今日发现得就很多。汉以后画像石墓虽然也有发现，如在四川的宜賓、南溪和在貴州的遵义、湄潭，就都會发现过宋代的內有雕刻的石室墓^④，但这些墓的規制都很小，并且画像也沒有什么独特之点。由此我們可以更了解到兩汉时代画像石的发达，实在是基于社会上的厚葬之風。所以画像雕刻特別盛行于汉代。

画像表現技法的原始形态是“綫刻”，它是用鋒利的刀筆，直接刻画在光滑的石面上的一种具有雕刻手法的陰刻綫画。其后发展成全面凸出的方法，并且在雕刻中含有繪圖的趣味。这在兩城山、武梁祠等处画像石中都可以見到。这种圖画是以凸出画面的平面为其表現方法，我們現在称它做“画像石”，那实在是一个最恰当的名詞了。仔細看来，各地还有不同样式。孝堂山祠和武梁祠，縱然有陰刻、陽刻之分，但一般都是接近平面的綫刻画，可以称之为拟繪画的。河南南陽的汉墓室刻画，已显出浮雕的造型。四川汉闕上的浮雕，更成为明显的凸出形式。又在体裁上，亦因不同地区而各有特点，如陕北綏德近年所发现的汉墓室，它的刻法，是用極薄的减地法，使主体突出，很类似剪貼圖案，这又与山东、河南的刻法有所不同了。

汉代画像表現技法，最常見的約有下列各种雕刻方式：

（1）陰刻綫紋。以綫为画面構成的基础，刻法比較原始簡朴，是早期石刻的主要特征。其代表作有山东沂水鲍家山鳳凰画像、汶上县路公食堂画像、金乡县朱鮪石室画像、平邑县北陵山石闕画像、沂南汉墓画像、肥城孝堂山郭祠画像（但綫条比較粗些）諸例。

① 王符潜夫論十二，浮侈篇：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养，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鑲玉，槨梓槨棺，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廬舍祠堂，崇修上僭。

② 金石萃編卷二十一引山左金石志：案濟寧州志云，汉平狄將軍扶溝侯朱鮪墓石室画像，沈存中載入夢溪筆談以为真汉制，今以拓本驗之，其中人物、衣冠，蕭疎生动，頗类唐宋人画法，或是扶溝后人追崇先世而作耳。

③ 參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五期，李文信：“辽陽發現的三座壁画古墓”一文。

④ 參見营造学社彙刊七卷一、二期，有关宋代石室墓各文。

(2) 陰刻凹入。可分二类：第一类是人物的上面制作光平，但底部任其粗糙，代表作有山东济宁县慈云寺天王殿画像例；第二类是人物的衣服一部分平滑，一部分却很粗糙，系用以表现成不同的衣料质地者，代表作有山东鱼台县舞乐画像（今藏日本东京大学）。

(3) 浅浮雕式的陽刻，上施陰刻綫紋。先在石面上浅浅地雕成凸出人物的輪廓，輪廓上再施雕陰紋的綫紋，然后鑿去輪廓以外的部分，底部磨平。此较之第一种刻法技巧要进步得多，是晚期石刻的主要特征；其代表作有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画像、四川新津崖墓墓門及石棺画像諸例。

(4) 深浮雕式的陽刻，上施陰刻綫紋。此种画像，人物周圍比較刻得深一点，雕出的人物仿佛是用陽綫条来構成的，底部或任其粗糙，故是一种最接近浮雕式样的刻画法。其代表作有山东济宁县兩城山画像以及河南南陽各地汉墓画像等。

(5) 網狀紋陽刻。代表作有山东滕县宏道院画像。

(6) 半立体浮雕。此种画像，起伏最大，其周圍剔去部分最深的自十公分至四十公分不等；其代表作有山东沂南汉墓藻井花朵、四川乐山享堂和各地石窟，大都如此。

(7) 立体浮雕，再施陰刻綫紋。此种为数不多，代表作有山东沂南汉墓斗拱旁边的半身龙例。

三 画像石在历史资料上的价值

从艺术发展上看，史書所記汉代壁画的取材和石刻画像多相吻合，自洪氏“隶續”，叶昌熾“語石”，以至德人費道的“汉代繪画”，都当石刻画像为研究汉代繪画的最上資料。而石刻画像本身还另有其独特的地位。当时的雕刻家們在处理雕刻与建筑的统一性上是頗費苦心的，并且也有其一定的原則的。他們在墓門上的橫額和門的支柱上都施以較凸起的浮雕，目的在將几幅主題画特別显出，并以增加墓的雄偉气概；但对室內的雕刻，則尽量保持牆壁的平面感，用浅浮雕和陰刻綫紋来显出事物的形象，使雕刻服从于建筑物。这是十分符合建筑原理的。

再以建筑史为例談談汉画像石在历史資料上的价值。过去研究汉代建筑时，除文献材料外，在实物上往往只依靠出土的明器来考察当时的建筑特征和風格。这样的答案是不够确切，因为明器只能表示一座建筑物的形制，不能表示建筑群的組合方式，而中国建筑是习惯于把各个單独的建筑物成組地配列起来，使它符合于生活的要求，这种成組有计划的高低錯落的建筑群，所給我們的一种抑揚頓挫的动的感觉，就

是我們建筑上民族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汉画像石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住宅圖、城郭圖、門闕圖以及桥梁、高楼、市鎮圖等等。这些在明器中是沒法看到的。但是我們如果依靠了石刻画像的材料，那么就可以补充建筑历史的一部分，为研究我国建筑史丰富了实物的資料。

山东沂南所出土的画像石和四川宝成路以及川南出土的画像磚上，都有整所房屋的透視圖，沂南画像石上雕有一座有兩層庭院的四合院，中綫上三进房屋都是五間，前兩进当中一間是过廳；后一进当中一間好像是客廳但沒有裝門窗而在正中綫上有一根柱子，上面托着斗拱，兩側各有六間廂房。并在全座建筑后面伸出一間抱廈，右側前后兩角各有一座角樓。前院中間还放了一架織布机，后院中則放着日用器皿，这无疑地是一所祠堂的形式。这一幅画說明了汉代房舍平面布置的形态，也說明了四合院的形式至少在汉代已經有了，它填补了建筑史上对整体布局研究的一大段空白。因为在現存古代建筑实物中关于平面配置形式，仅只知道三四处辽金时代的例証，在壁画石刻中也只看到过六朝及唐代的平面，西安的汉代未央宮遺址仅只有一个大体的范围，因此汉以前的平面布置形态本来只能从文献中去推测，而文献記載决沒有像画像石上所表現的那样可以具体看出它的形象的。

至川南出土的画像磚上，更雕有一种少数民族的居住建筑圖案。据聞有所編“四川汉代画像选集”收有一幅欄居象，拓片左側为一牛車，車前有一人，已漫漶。右側为一屋，下層是空的。右方有一梯，供登降之用。这是今日西南、中南一帶兄弟民族間盛行的欄居住宅，在僚語里称为“干欄”的。据旧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南平獠”条：“部落四千余戶，土气多瘴癘，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樓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欄。”我們过去只在銅鼓圖案中得見有干欄的面影，同时又只知道有关的記載最早見于魏書和北史等書，現在又注意到汉画像石里也有此种典型的表現，在時間上既远早于魏書北史，在形式上也更比銅鼓圖案为逼真，它真是我国建筑史、文化史、民族史上一种極珍貴的历史資料。

当然，汉画像石的历史資料价值不仅建筑史一項，其他像服飾、車制、音乐、奇禽、异兽……等等都有相应的資料。石室墓画像的墓門正面必刻鋪首（一种兽头銜环的門环），鋪首上面往往还有蒼龙、立虎、鳳鳥等的彫飾，这大約是由于墓門方向的不同而采用了各式各样的动物圖案，因为墓室的后面（絕大部分为北向）不开門，故迄今尚未发现鋪首上雕有龟蛇之例。从这等雕刻題材上面，（下轉第31頁右欄）

教 学 问 题

关于繼續學習貫徹历史教学大綱 改进教学的几点意見

湖北省教育厅教研室

近一年来,我省中学历史教学工作,由于学校的重視和历史教师的積極努力,已經有了显著的改进,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績。最主要的是不少历史教师重視了对历史教学大綱的學習,端正了过去对大綱的一些不正确的認識和态度;在鑽研教材方面,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大綱的啓发和指导,初步克服了教学上的盲目性,同时也改进了对教材的处理;在講授中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及其縱橫关系,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概括。同时还加强了历史課堂教学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最近一学期)。有些教师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并且摸索了一些途徑,比較普遍的是在教学中,重視联系现实进行了劳动教育。有的教师对于檢查旧課或复习旧課,在内容上或在方法上,也有很多改进;对于历史教学的課外活动,如举办历史問題討論会、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中心的晚会等,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績。这些成績,具体說明了历史教师在工作上的艰苦努力、历史教学工作的显著改进和历史教学質量的逐步提高。

不可否認,历史教学工作在改进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和問題,这些缺点和問題,突出地表现在:

(一)对教材的鑽研,仍較普遍地存在着教一节鑽一节的現象,而鑽研一节教材时又往往止于表面熟悉教材,对教材内容的精神實質却没有深刻地領会掌握。教师要教好課,注意熟悉教材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我們鑽研教材的目的。鑽研教材主要是为了掌握教材的中心内容及其錢索,弄清楚重点所在和教材的前后关联,也就是它在單元教材或全部教材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教好課的首要前提。但是不少教师,却忽略了这一点,因而在教学中,对教材虽很“熟悉”,但究其所講内容,多半是重述教材或照本宣科,一堂

課究竟要求学生懂得什么問題,往往不够明确,甚至在教学中形成变相背誦課文或就課文空洞議論,这就不可能保証教学效果和教学質量。

(二)历史課堂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还没有很好地依据教材,联系实际来进行。有些教师对教材的內在思想教育因素,沒有深入发掘,在教学中又往往沒有很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观点,只从教材的表面引伸或詞句的解釋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實質上就脫离了教材,成为所謂“外加思想性”,而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又沒有很好地联系实际甚或脫离实际,这就使得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貧乏,思想性不强,目的性不明确,影响了教学質量。

(三)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还存在着公式化的傾向。有些教师在教学中不問教材的特点和学生年齡特征,千篇一律地采用講述的方法,其形式就是提問、講述、巩固等几个步驟。以致有些問題,應該教师充分講述的,却不能充分地講述;有些課題,應該引导学生分析綜合巩固的,却不能在課堂上得到解决;有些課題或段落結束以后,必須加以概括或系統化的时候,又不能相应地安排总结复习課。这就使教学方法,不可能成为达到一堂課的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的有效手段,也就不能为学生提供当堂基本上領会教材的有利条件。

上述缺点和問題,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現或存在的,克服或解决这些缺点与問題,也还需要一定时期的努力。1956年寒假举行的历史教学座談会,曾就当时历史教学情况作了一些分析,并提出了“关于改进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意見”和“关于学习中学历史教学大綱的参考意見”(載湖北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資料第一輯)。半年以来,我們的工作虽有新的进展,但总的來說,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那些意見,至今

仍可繼續研究执行。至于师范学校的历史教学如何“面向小学”的問題，虽已有了一些經驗，但这是一个較艰巨复杂的工作，在这方面还需要从实践中繼續积累經驗努力研究改进。現仅就下列三个方面，提出一些改进意見，供各校历史教师参考。

一 关于繼續深入學習大綱，鑽研教材， 注意改進教法方面

(一) 將學習大綱和鑽研教材緊密結合起來。大綱的重要性和它對於教學的指導作用，我們在實踐中已經有一些認識，為了進一步明確大綱揭示的歷史教材的科學系統性、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特點以及每一歷史事件在一定歷史時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們應該把深入學習大綱和鑽研教材進一步緊密結合起來，從整體到部分，又從部分到整體，反復學習鑽研，並在教學實踐中加以檢驗，進一步發揮大綱在教學中的指導作用。

學習大綱與鑽研教材相結合，一般可以分三個步驟：

第一、通覽大綱和教材，以了解其全貌和一般內容；

第二、在鑽研單元教材時，先體會大綱說明文的相應部分和正文相應部分的精神實質，並與單元教材結合起來，反復鑽研領會；

第三、單元教學之後，對照大綱說明文和正文相應部分，進行檢查驗證，吸取經驗和教訓，然後開始下一單元的鑽研。

(二) 在通覽大綱和教材的基礎上，當前應特別重視對單元教材的鑽研。目前多數歷史教師對於每一課時教材的鑽研是重視的，但這不是鑽研教材的好途徑，因為僅僅是鑽研一課時的教材，就使我們對教材的透徹領會和掌握受到很大的限制。現在，有些歷史教師已經体会到：

(1) 歷史學科的特點，是通過具體歷史事實科學地闡明歷史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這就必須掌握一個歷史時期的面貌及其特點，才能進一步研究種種歷史現象的本質及其規律性。

(2) 歷史教學大綱分別概括了各個時期的歷史，在總的體系之中，又分別自成系統，必須首先對它有所了解，才能深入鑽研教材。

(3) 歷史課的教學，要求我們在鑽研教材時，找出教材內容的主要線索，找出章節之間的內在關係，這就要求把一節教材在一個單元中的地位弄清楚。如何才能弄清楚一節教材在一個單元中的地位，重要的是鑽研單元教材。

(4) 重視鑽研單元教材，是符合我們歷史教學的進展情況的。有些教師已經在鑽研單元教材方面，摸索了一些經驗，吸取這些經驗，重視系統深入地鑽研單元教材，就會有效地克服教一節鑽一節的現象。

目前鑽研單元教材，要求作到：

(1) 鑽研單元教材的基本線索：對於單元教材的基本線索，主要是依據大綱說明部分所提示的精神及正文所提出的主要內容，進行鑽研。

(2) 鑽研單元教材的主要內容和教學目的：深入鑽研主要內容和教學目的，有助於我們深刻領會基本線索，同時也是我們鑽研每一課時教材的必要前提。這樣，在確定各個課時的教學目的，培養學生的歷史概念以及明確課堂教學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內容，就有了更充分的依據。

當然，強調系統深入鑽研單元教材，並不是放鬆對每一課時教材的鑽研，其目的正是為了更好地領會和掌握每節課的教學目的和內容。所以注意對每一課時教材的鑽研，加強備課，仍是鑽研教材重要的一環。

(三) 根據教學目的和教材中心內容，組織教材。我們鑽研教材，明確了教學目的，掌握了教材的中心內容，就要善於依據這些來組織教材。在組織教材時，應該注意：

(1) 一個單元的教材，應根據它的教學目的和中心內容進行組織，使各個課時的教學成為有機的結合。

(2) 根據每一課時的教學目的，把最能闡明中心內容的教材，縝密地加以組織。視教學的需要，對教科書的教材，可以審慎地作一些必要的精簡和補充。

(3) 重視教材內容的連貫性。每一個章節的教學的內容，固然要注意與單元教材的基本線索連貫起來，同時也要把有關的縱橫關係連貫起來。至於時間順序，更有必要加以注意。

(4) 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在組織教材時，注意知識的內容與分量，要求適合於學生的接受能力，以免加重學生的負擔，或降低對學生的要求。

(四) 注意改進教法。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是分不開的，方法是為內容服務的。既然教材具有不同的特點，這就應該有相適應的不同的教學方法。我們注意改進教法，克服目前教學方法的公式化傾向，其目的是為了在教學中更好地闡明課的內容，以保證收到更好的教學效果。改進教學方法，應依據教學目的、教材特點和學生年齡特征，在教學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多種多樣的方法，累積經驗，以逐步提高教學法的水

平。

二 关于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

通过历史教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近半年来是比较加强了，但是应该承认这还不够的。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应该重视：

(一) 充分认识历史课是最富于思想性战斗性的一门课程，自觉地在历史课中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我们知道，历史课具有强烈的思想性战斗性，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通过历史课来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比其他课程有着更丰富的内容，有着更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培养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任务中，历史课所承担的任务就显得尤其重要。可是有不少教师对历史课的主要特点认识不足，不了解或者不去考虑历史课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历史教学中还存在着单纯传授知识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因此，当前的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历史教师首先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充分认识历史课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觉地在教学中来贯彻。

(二) 在教学中，要注意依据教材，结合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该指出有些教师由于对课堂教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理解得不够深刻，因此课堂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往往脱离教材，脱离实际，特别是脱离当前建设实际和政治斗争实际，以致政治思想教育内容空洞，效果不好。所以在教学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要依据教材结合实际。

(三) 教师对教材必须有深刻的领会和感受，先使自己受到教育。对教材深刻地领会和感受，主要系于教师自己思想观点的明确性和对教材内在思想性的深入钻研。如果教师缺乏明确的思想观点，不为教材内在的思想性所感染，在教学中，只是客观主义地叙述历史，那就会使本来思想性战斗性很强的历史课，也不可能起到教育学生的作用，因此教师以正确的观点深刻领会教材的内在思想性，先使自己受到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四) 深入了解学生实际，加以分析，并联系学生实际，进行教育。学生实际就是当前现实的反映，要使课堂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有的放矢，就应该注意联系学生实际，因此，要求教师注意：

(1) 经常对学生的思想、生活、学习作比较全面的观察和了解。

(2) 正确分析学生思想认识上的主要矛盾及其

本质所在。

(3) 联系主要的本质的问题，进行正面教育。

(4) 不要使课堂学习的政治思想教育，形成简单急躁的训斥或生活琐事的告诫。

至于在历史教学的课外活动中，注意有目的有内容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历史教师应该根据各校具体情况尽可能举行历史学习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通过历史教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们的经验还比较缺乏或不够成熟，希望每位历史教师注意从实践中积累经验，总结经验，努力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三 关于历史教师进修提高方面

在政治思想上和业务上进修提高，是我省中学历史教师的普遍要求，也是提高历史教学质量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事实上有些历史教师，对于自己的学习是很努力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和偏向，现根据一般情况，提供几点参考意见：

(一) 首先必须重视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对于人民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历史教师来说，就更为迫切。因为历史教师的任务就是教育学生学习人民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说，教师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就直接关系着或决定着他的教学质量。目前我们还不能很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教学，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受到政治思想水平限制的缘故。可是至今仍然有些教师把提高工作过分侧重于业务方面，因而也就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提高，也就从根本上阻滞了业务的提高，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为了在政治上有所进步，在思想上有所提高，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观点，学习时事政策，以逐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二) 必须努力提高业务知识水平。我们提高业务知识水平的目的是为教学服务。是为了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因此应该围绕教学来进行，有些教师，规划自己的学习，曾经严重地脱离了自己的教学业务，其结果不仅不能保证自己规划的实现，而且使教学工作受到损失，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在职业进修是当前提高教师的主要环节，一般应根据“教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学习。比如教哪年级的历史课，就可围绕哪年级的历史课程内容学习。如果在历史教学中，对某一部分，特别感到困难的就学习某一部分，如对中国经济史部分的教学特别困难，就学习有关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材料和著作等。

(下转第13页右栏)

河北省中等学校历史教学情况 及今后改进意见

河北省教育厅教研室

几年来,我省中等学校历史教学,在各級党政机关领导下,经过全体教师辛勤劳动,获得了显著改进,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首先,大部教师注意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鑽研并講授教材,努力克服资产阶級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和自由講学的态度,这对于提高教学的政治性、思想性,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多数教师組織教材克服了以多为胜,好高骛远的偏向,加强了教学目的性和计划性,減輕了学生負担,提高了教学效果。再次,不少教师初步注意了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講述,并要求学生记忆和掌握必要的史实知識。还有部分教师开始重視了历史教学的直觀教具,增多了課堂类型,初步克服了不顧学生接受能力,死板注入的老一套教学方法。此外,少数教师并能运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統地掌握教材,重点突出地講述教材,能較好地利用形象語言和圖表教具、历史文献、文艺作品等材料,使历史形象在学生头脑中再现,并进而引导学生探求实质得出結論,这对于克服历史教学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历史科教学虽获得以上成績,但从目前整个情况来看,还存在許多問題,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掌握和組織教材上有以下几个問題:

(1)割裂和肢解历史现象,看不出它們的相互关系。由于教师不注意系統地全面地鑽研教材内容,不注意历史发展的联貫性和事物間的相依性,所以在組織教材时往往前后左右显然脫节,对某一历史现象既不能根据历史的发展变化加以闡述,也不能从它所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例如:不少教师講授古代奴隶制社会,不能从埃及、巴比倫、希腊、羅馬等的整个講授中使学生看到奴隶制在各个不同阶段里所形成的特点及它們之間的联系;講述世界近代史不能从英、法及欧洲各国资产阶級革命的講授过程中使学生看到資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衰亡的一般規律;講授秦的中央集权不引导学生回忆农村公社瓦解、貴族領

主控制削弱及商鞅变法等教材中有关部分;講述中国近代史,很多教师提不出受到世界形势的影响与制約;講述十九世紀俄国革命不談及它受到法国资产阶級革命的影响。这样孤立片面地講述的結果,使学生把人类历史现象看成是一堆偶然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辯証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

(2)平列問題,沒有重点,反映不出历史实质。由于教师不能認真鑽研教材,不能发现历史进程中关键性的問題,所以在組織教材时把次要内容和貫徹教学目的的主要内容,不分輕重地平列起来。例如:講授十八世紀法国资产阶級革命雅各宾專政时,对雅各宾派当权的社会条件、革命过程、对外战争、内部矛盾、霧月政变等一般内容,均一一作了講述,但对于反映雅各宾派政权本质的革命措施却講得很少;在講授維也納會議和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欧洲革命运动时,对維也納會議、神聖同盟的一般过程講得很詳細,对于当时各国革命运动反而講得过少,特别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講的更为簡單(二、三分鐘);講解巴黎公社起义,对革命背景、爆发战争綫索、公社的成立講授時間較多,而对于公社的組織机构、社会經济政策相反地講得过少,特别是沒有紧紧抓住“絕大多數劳动人民参加选举,工人阶級出身的分子成为公社委员会及国家各个机构的主要领导成員”以說明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級破天荒地第一次掌握了政权,并以之推行各种社会經济政策进行阶級斗争,講解初中中国史商鞅变法时,只是堆砌了廢井田、獎軍功、設郡县等經济政治措施,但对这些措施在打击奴隶主、解放奴隶为中国历史走入封建社会开辟了道路这一重要历史意义,反倒沒加以分析;講授高中中国史專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时,对“皇帝”、“朕”等称号的来源,对“黔首”、“廷議”等名詞的解釋,对皇帝总攬大权的細节和統一中国的各种具体措施,均一一詳尽地作了講述和解釋(事实上有些内容初中已經学过了),但对本节教材的中心内容“專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基本精神和它的社会經济基础,政治制度

的特征”反倒沒有闡述。这样組織教材并进行講述的結果，往往模糊了甚至掩盖了問題的實質，不能发掘历史事件的真實內容，而影响了学生認識能力的迅速提高。此外，不少教师对若干重要历史現象、历史概念有时交代的十分模糊、片面，甚至发生严重的錯誤。如有的教师講授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时，把皇帝与地主的矛盾夸大成当时的主要矛盾；講述法国资产阶级內部矛盾时（产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就忽略了人民大众与整个资产阶级不可調和的冲突；还有的教师談及经济基础时，就忽略了上层建筑对它的反作用；講到意識形态时，就把它夸大得脫离开物質基础；講完雅典、斯巴达以后，学生还鬧不清奴隶制的貴族政治与奴隶制的民主政治的区别；講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前身的官僚与官僚资产阶级混淆起来。这样講授的結果，使学生对好多重要历史概念沒有清晰的認識，解答得不清楚不准确，严重影响历史教学的科学性、思想性。

（二）在教学方法中存在的几个問題：

（1）很多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忽視了从感性到理性这一条基本認識原則。即从具体史实出发，并在充分叙述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結論。如在講波希战争时不是先講述战争的发生和进程，然后得出結論，而是凭空地先向学生提出“这一战争对希腊來說是正义战争”；在講北伐战争时不是先講北伐軍的組成，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和胜利进军的情况，而是先提出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战争，因此是革命战争”；在講巴黎公社时不是先讓学生掌握巴黎公社产生的条件及其革命措施，而是一开始就非常概括地提出“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有时虽然不是先提出历史結論，但不善于叙述具体的历史事件，不能描述重要的历史人物，还没有充分地講述历史材料就忙着下結論，形成几条干巴巴的道理。如講高中本国史西汉后期土地兼并的发展时，仅抽象地提出了“由于賦稅勒索、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不得不出卖土地降为依附农民，使土地高度集中到地主手里”，而对于豪强兼并农户大量流亡的許多细节及其过程并没有向学生交代，特别是对反映当时豪强兼并的典型例証也一字未提，所以学生对土地兼并这样一个重要問題得不到較清晰的概念；有的教师講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二十世紀德国工人运动时，只是从道理上論述了“由于資本家的壟断，工人生活惡化，所以曾发生几次工人运动，既有經濟要求，也有政治要求”等一般內容，而对形成运动的具体原因及运动中的斗争情况均未談到，对闡制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及革命領袖蔡特金、罗森堡、李卜克

內西等也未作具体的評述和講解，因之，学生就不能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接受教訓，也不能深刻認識修正主义对革命事業的危害。

另一偏向是罗列历史現象堆砌材料，不能經過具体分析归結到問題的實質。如講初中中国历史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产生时，只是簡單地背誦了“从1861年以后福州商人向外国購買制造磚茶的机器，上海洪盛米店开始用机器碾米，广东商人开办机器織絲厂”等內容，很少加以分析，就簡單地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及特性，使学生很难把概念与事实联系起来。这两种偏向就使学生所得到的历史知識，不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就是一些片段的历史現象，自然也就不能使学生正确地掌握历史材料并培养他們分析概括历史現象的能力，因而也就不能从中受到教育。

正由于教师不注意或不善于講授历史事实，而習慣于傳授結論，所以檢查学生的知識也就往往滿足于概念和条文的記憶，反而忽略对史实的复述，根据史实进行分析概括。有的教师在学生回答問題时仅讓“說兩头”（即史实发生的原因和結果）。有的仅提問一些有关目的意义和作用的內容。如“波希战争，希腊为什么胜利？”（答：希腊是正义战争。）“亞述为什么很快就灭亡了？”（答：因为它是軍事国家，經常对外侵略。）有些学生为了迎合教师的要求經常复述教师簡略的总结 and 教材中概括的詞句。如問“太平天国发生內部矛盾的結果如何？”（答：摧毁了领导核心，削弱了革命力量。）問：“洋务运动的目的和影响是什么？”（答：为了巩固統治阶级的地位，使中国不能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这样就錯誤地引导学生丢掉具体的教材內容，仅死記一些簡單的公式。他們几乎对某些历史現象的評價都有一套現成的公式可用。对任何战争的胜利与失败都归結到正义与非正义；对任何时代农民起义的原因都归結到封建統治，帝国主义侵略，其失败的原因只籠統地归結于沒有先进阶级（或政党）的领导；对任何国家的衰亡，都归結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尽情勒索……等。不会养成学生实事求是地对具体問題作具体分析的习惯，也不可能培养他們独立思考和認識問題的能力。

（2）教师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語言和鮮明的圖表等直觀材料，使历史形象在学生面前再現，使学生受到充分的感染和教育。多数教师詞彙不够丰富，語言囉嗦，不能用自己的語言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生动史实形象而准确地傳达給学生，几乎都是按照課本或教学参考書的詞句，平板而枯燥地复述一遍。如講亞述的军队时，不能以形象的語言描繪他們的服裝，以及用皮囊渡河，用战车冲锋，用銅槌攻城等古代战术上的

重要发展,以引起学生的想象。講“中法战争”时,对黑旗軍抗击法軍的激烈战斗,楊著恩的壯烈牺牲和馮子材的英勇指揮,也不能通过教師的語言作生动的反映。个别教师甚至连課本中很形象的詩歌也避而不講,教师既然不注意史实的講授,自然对于教学中語言和表情的直觀性、感染性就更忽視了。有的甚至把悲憤壯烈的事实用輕佻玩笑的口吻講述而引起哄堂大笑。

一般教师虽承認圖表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注意把圖表和教材內容紧密結合起来充分地加以运用,使地圖不能鮮明而恰当地体现教材的有关內容。有的画得过于复杂,不符合課堂教学的要求;有的以此代彼,頗多牽强;有的圖虽然适用,但不能充分利用于講述过程中,往往是开始或結束講述时讓学生草草地看一看,使得費很大力量繪制的圖表几乎成为課堂教学的点綴;特别是書中插圖的运用更为一般教师所忽視,不善于對圖画內容加以描述和分析,把有关教材內容自然地傳授給学生;有的教师根本就不組織学生看插圖。所有这些都影响了直觀原則的更好貫徹,而降低了教学效果。

此外,一般教师还不能根据教材特点和教学需要,組織多种課堂类型,而是千篇一律綜合課,即使綜合課中几个环节,也不能灵活地运用;还有好多教师用过于繁瑣的标题,按条講授,不仅容易割裂了教材內容,并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对課本的認真閱讀;也有的提問过于簡單,一問齐答,或分量过重过难要求过高,学生力所不及,因而影响学生思维能力的正常发展。这些現象也是几乎普遍存在着的,急需大力加以糾正。

产生上述缺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几年来,由于教育事業的迅速发展,历史科教师变动也很大,新任課或任新課的教师較多,并且一般历史教师都沒有經過專業学习,加以教材不断改变,从內容到形式都还存在一些問題,給历史科教学帶來了很多困难。这是历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根本問題,須經各方面長时间的努力才能得到解决,但从目前教学活动上看也存在一些問題,必須迅速加以改进和提高。

首先,不少教师对历史科的任务、性質、特点的鑽研重視不够,忽視大綱对教学的指导作用,缺乏明确的工作方向,心中无数,特别是不能够独立地系統地鑽研与处理教材,备课極為膚淺,粗通課文記住一般史实后就机械地按照参考資料講授,不是深入地正确地挖掘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并恰当地确定教学目的,因而也就不能恰当地选择与配置教材。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这是目前

历史教学不能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

其次,不少教师对加强教学思想性、政治性与減輕学生过重負担还存在不正确的看法,認為“加强思想性、政治性就可以脱离具体史实,多講些原則、意义、教訓等一般概念”,“史实可以不講,道理不能少說,少說道理就脱离政治”,把丰富的史实抽繹成几个条文,讓学生死記教材結論;更有的教师怕犯錯誤,只是照本宣讀,不作任何發揮和补充必要的事例;部分教师認為历史課是冷門“升学不考,平常不看”,丧失了改进和提高的信心。不少领导干部对历史科教学在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識方面的重大意义認識非常不足,而放松了对历史科教学的積極领导。这些模糊思想,也影响着历史科教学的改进。

二

根据上述存在的問題,提出今后改进意見:

(一)充分明确历史課教学的目的、任务和特点,并据以鑽研和处理教材。

(1)历史科是讓学生切实地学习祖国和世界史上最主要的历史事件,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具体过程,从而引导他們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認識社会发展規律的一門学科。它在教学实践中既有別于政治課,也不同于文学課。政治課主要的教学任务是通过馬列主义的一般理論原則的闡述,树立和坚定学生的共产主义政治方向和道德信念;文学課主要的教学任务是通过对語言所塑造的典型形象的講解和分析,以扩大学生对生活的認識,并培养他們对生活的正确感受与表达能力;历史課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真实的具体历史事实的講解,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运动法則,并引导学生理解这个法則,从而正确地認識现实,明确將来的方向。它不同于政治課教学仅以必要的史实印証一般理論,而是根据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归結出具体的历史結論;它不同于文学課教学仅提供典型人物的生活片段,而是介紹并揭示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全貌。因之在历史課講述过程中就不能像政治課那样从一般的理論着眼,也不能像文学課那样从片段的的生活講起,而要系統地具体地講述史实,从史实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归結出一定空間時間中历史事件的具体的結論。这就要求教师在講授过程中必須是按照历史年代次序,事物的前后联貫,講述主要的历史現象、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并在此基础上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解釋和評價这些現象、事件和人物,使学生不仅牢固地記憶这些內容,并保証他們正确地具体地認識和理解这些內容。

(2)为了較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和正确地反映

历史教学的特点,以及克服目前处理教材的許多缺点,历史教师必須系統地全面地鑽研教材。首先是理解和掌握自己所教的全部教材,要清晰地看見許多不同时代的历史現象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并发现它們之間的因果关系及相互制約的作用。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辯証法法則对千头万緒变化多端的历史現象,既能有条不紊地掌握其史实,并能从全部事件发展中发现其規律,作到对整个教材了如指掌,心中有数。其次就是要根据历史現象本身的历史作用及教材組織形式,鑽研每一章节的教材在整个教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其与前后教材的联系,全面地考虑整个課題的内容和教学目的,恰当地把大綱的要求分配到有关課时中去,自然而密切地联成一气,从而正确地确定每一堂課在整个課題中所占的地位,以保証課与課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及每一課本身的完整。

(3)教师系統全面地掌握教材,目的在于作到心中有数,并不是要把所有历史材料全部都教給学生,而应从历史发展过程中選擇具有关键性的主要材料教給学生,这就是所謂教学重点。历史課教学重点,就是从某一历史現象所包含的許多事实中,選擇出来的对这一历史現象起主导作用的主要事实。教学重点必須与教学目的一致,它是反映教材最本質的东西,它体现着一堂課的主导思想,它是使学生能够作出历史結論并受到教育所必須領会的東西。所以教学重点是根据大綱的指示、教材内容、学生情况和教学目的所决定的。为了准确地确定教学重点,必須作到真正理解大綱精神,深入鑽研大綱中有关說明的部分,从中研究对有关課題的原則指示;对教材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結果、意义、作用和评价必須进行研究分析,以发掘貫串这一事件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的基本規律,再斟酌学生的思想和知識水平,十分具体地确定教学目的,然后据以明确教学重点,并圍繞重点組織一系列的講授教材。不能把重点突出認為是仅講重点,为了說明重点,必不可免地要講到一些次要的史实,就是說沒有非重点也就无所谓重点,也不能認為仅講一个問題就是重点突出,因为問題本身不一定是重点,同时,重点突出也并不意味着仅是一个問題;也不能認為結論就是重点,重点与結論是一致的,但不是等同的,重点是教学中所講授的事实,結論是对事实經過分析、概括提高到理論上加以認識;也不能認為重点突出就一定是对重点材料多說多講,实际情况有时是对反面的、側面的、次要材料詳細闡述后,而重点就突出了,当然在一般情況下要集中精力闡述主要史实及問題,一些次要的材料可以略講,甚至不講。为了突出重点,不能只限于复述教科書内容,必

要时还須适当地补充和引用一些有关材料。

(二)在深入鑽研大綱掌握教材的基础上改进教学方法。針對目前在教法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意見如下:

(1)生动形象地講授史实,具体准确地提出結論。教师必須根据教材系統和学生的認識过程来安排教学順序。必須明确历史事实和現象本身是历史認識的源泉,在历史教学中,要从具体历史材料出发,讓学生充分地牢固地掌握有助于完成教学目的的基本史实,然后再經過分析概括得出結論,这样作不仅結論有事实根据,能够使学生信服,而若干复杂史实也能条分縷析地从理論上認識其本質。当然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先提出某些結論和概念,然后再講授史实,也不是不可以的。

为了作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教师能根据不同性質的教材内容,克服千篇一律呆板乏味的复述,要灵活地运用各种适宜的教学方法。一般地說,关于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需要用鮮明、具体的語言,有系統有情节地加以叙述;关于史实发展的某一特定場面,就需要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語言,加以描繪;在揭示某一历史事件的意义、作用及其本質时,就需要以明确肯定具有邏輯力量的語言,进行闡釋或总结;在分析若干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解釋某一历史概念时,也可以用談話法启发学生思惟,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結論。但必須知道这些方法,不是各个孤立的截然分开的,必須根据教材特点、教学目的以及学生的程度,灵活地互相配合加以运用。使用哪种教学方法是由教材、教学目的所决定的,但不論哪种教学方法,使用得是否成功,則决定于教师的各方面条件,特别是講授时的語言条件。所以教师在講授时要詞彙丰富、語言簡洁,交代問題要明快,安排内容要条理清楚;对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能自然地运用相适应的語气和表情,以表达正确的思想感情;根据史实发展本身的不同情节,要詞語有詳略,进程有緩急,声調有高下,以正确地体现不同历史阶段历史現象的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些原是很生动具体的史实在教师的講述中再現出来并为学生所接受,借以培养他們爱憎分明的階級情感,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但是必須知道,任何教师仅凭自己的語言交代問題是不够的,为了更好地树立史实的空間、時間觀念,补語言形象的不足,教师必須十分重視直觀教具的恰当使用,如圖表、画片、模型、古物、照片、文艺作品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等。这些材料必須經常注意收集、制作和积累。

(2)用比較和对比的方法闡述复杂的历史現象和

历史概念。把某一历史现象和其他同类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对比是历史教学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发掘某一历史现象发展进程中某种基本因素的演变（如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工具的演进，封建剥削制度中地租形式的演变等）；区分同一历史现象，在不同的条件下，所形成的特点（如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划清一些字面类似而实质不同的历史概念的界限（如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揭示不同历史现象的本质（如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这样作，可以避免以简单的一般公式代替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可以经常抓住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进行钻研和讲授；可以培养学生善于发现各种历史现象间的异同，分析综合历史事件，以发展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并可起到系统复习作用，使所得知识更深入、确切和巩固。对比和比较的方法的主要作用是判明在不同历史情况和不同历史环境中所发生的同样现象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即是历史发展的一致性与特殊性。在进行这种工作时，须先找到若干共同点，然后在这些共同状况的背景上发现若干不同点，即区分它们的一致性与特殊性。但进行时要抓住主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避免支离破碎纠缠在细枝末节中，这样作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相反地会造成思想的混乱。

（3）经常组织复习和进行检查，以巩固、加深学生的知识。尽管课前准备得好，堂上讲授得好，如果不注意经常组织学生复习并进行检查，必然得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为此，首先要发动同学经常自觉地进行复习。重要的条件，在于教师讲解清楚、分析精辟、结论正确，能引起他们钻研人类祖先历史的兴趣；同时教师还必须在讲课过程中，能够利用尽可能多的机会，启发学生回忆已经学过的、甚至是很早以前学过的知识，这样作不仅使新旧知识密切联系起来，也会使学生深切了解所学过的旧知识随时都是有用的，不是学过就可以丢掉不管的。必要时也可以用提问的形式（不一定记分），更能加强督促作用。其次就是正式组织复习课，它不仅能够使学生把学过的史实再一次地加以温习，更重要的在于把讲过的教材进一步系统化深刻化。在复习课中要求教师能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从一系列的复杂史实中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或历史的规律。组织复习课不应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教师在单元开始（或全部教材开始）时就考虑在结束时如何组织复习课，在每节课中应该让学生掌握哪些有助于学生在复习课中获得系统知识的史实。在进行复习课时同样要作充分准备，不一定完全按照课本

的排列顺序来组织教材，有时也可以围绕某一历史现象的中心问题来组织教材。在进行单元或期末复习前，必要时可给学生列一复习提纲，并了解学生对哪些教材或问题的理解有困难，以便教师胸有成竹地把复习课组织得更好。复习课固然可以看出学生知识质量，但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复习，不在于考查，不应把复习课变成考查评定学生知识的检查课。再次是利用旅行参观指导学生注意古迹、古物及历史文献等，通过对它们的观察，以回忆历史教材；在低年级也可组织晚会，结合文娱活动，熟悉学过的教材；在高年级可以组织专题的墙报、講演、讨论、辩论等，以进一步切实深入掌握教材。

考查与评定学生知识质量，不仅可以督促学生学习，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起到复习、巩固的作用。首先是随堂提问，其内容应围绕教材的主要部分，既是学生力所能及的，也必须是经过思考才能回答完善的。要求学生在答复问题时，不论是属于材料的记忆、因果关系的分析和历史现象的认识和评价，都要有充分的史实根据，决不应该满足于简单的一般的概括的条文。其次就是正式组织定期的检查课，不仅要系统地有重点地检查学生记忆的程度，还要发展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引起全班学生的积极思维。提问检查中的评分，要作到正确反映学生知识质量，必须根据提问的要求、内容的难易，适当地掌握评分标准。检查课有时也可用书面测验，测验题目不宜过于简单零碎，要能系统地包括全章、全节的主要内容。

为了达到上述各项要求，教师必须从两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1）经常阅读一些与理解教材有关的书籍和报章杂志以及一些思想性较强的文艺书籍（如斯巴达克斯、巴黎公社诗选、鸦片战争文学集等历史小说和诗歌），以丰富自己的感性知识和词藻，培养自己的阶级情感和描述史实的能力。

（2）努力学习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并注意当前国内外革命进展的形势，广泛接触（直接或间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认识能力。

各校领导应从各方面协助教师，根据教师的业务水平 and 教学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并注意组织教师总结推广教学经验，以把我省历史教学不断地推向前进！

試談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思维問題

刘 方 义

在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提高教学质量克服教学中的形式主义的根关键之一。学生在学习中，只有通过积极思维，所获得的知識才是真正被理解的知識，才有可能被牢固地掌握。但有的同志却把它当作是單純的方法問題，認為只有通过談話法才可以进行，甚至拿一堂課中提問学生的次数多少，作为衡量是否能启发学生积极思维的唯一标准（当然它是重要方法之一）。我認为这是不够全面的。在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必須从学生思维活动的特点和基本过程以及历史科学的特点和任务，来寻求解决这一問題的途徑。

思维是一种認識活动过程，它概括地反映事物之間有規律的联系和关系。学生的积极思维活动的发展，是在理解知識、掌握知識、运用这些知識的过程中实现的。历史的发展虽然十分复杂，但畢竟是个有規律的过程。中学历史課的主要任务，即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揭示其內在联系和关系，認識社会发展的規律，借以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觀。从中学历史課的内容及其固有的特点和任务来看，历史課是最有利于发展学生思维活动的一門学科。

学生思维的发展是在不断积累和掌握知識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首先必須在教材内容的組織和講授上，保持严密的系統性和邏輯連貫性，深刻地揭示历史事件或現象的內在联系及其規律性。这是发展学生思维的根本問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學習中，循序漸進地掌握知識，使前一問題成为理解后一問題的阶梯，后一問題成为前一問題的必然結果，引导学生跟随着教材内容的邏輯系統和教师的思想进程，进行思维活动，自觉地掌握知識的相互联系，認識历史发展的規律。相反地，如果在教学中丧失了或削弱了这个基础，就損害了学生思维活动的前进道路和条件，所获得的知識将是缺乏互相联系、无系統的孤立史实的堆积，也将不能被学生理解和掌握。很难設想，当不知一个历史事件所由发生的

条件时，便能够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必然規律性。更不能設想一堂杂乱无系統的历史課，还能唤起学生的密切注意和积极思维活动。

教师根据教学大綱和教科書，进行深入的細致的备课，切实把握教材内容的本質联系和邏輯系統，是解决这一問題的基本关键。教科書一般是有較严密的邏輯系統的，但也不能把教科書上的材料机械地搬用于課堂教学，必要时可以变动教材的組織和增减一些材料。授課前拟定一个系統的講課提綱是很必要的，通过講課提綱可以体现教材内容的系統性。例如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中“美国的內战”一节，可列这样一个提綱：

（一）美国內战的原因：

1. 南北經濟制度的矛盾
2. 階級关系及其政治要求的冲突

（二）南北战争的爆发和北部的胜利

（三）美国內战的意义

关于課本內“共和党的成立，林肯当选总统”一題，不必单独講授，可在“內战的原因”一題中，与講授北方资产階級和南方奴隶主在經濟、政治上的矛盾結合起来。其次，应在前节美国南北經濟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特点的知識基础上，通过分析南方奴隶制度和北方資本主义制度的对立，来闡釋內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再次，应在叙述代表北方资产階級利益的共和党領袖当选总统后，南方奴隶主相繼脱离联邦、成立新政府并发动軍事叛乱、产生两个敌对政府等事实的基础上，使学生認識战争的不可避免。

根据上述提綱，就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順序和教学的邏輯系統，向学生揭示历史事件的內在联系和发展規律的过程，也就是学生在积极的思维活动中，循序漸進地理解和掌握知識的过程。

二

分析和綜合是思维活动的基本过程，是相互联系的思维方法。历史教学中只有对复杂的历史材料进行正确的分析、綜合和概括，才能揭示历史事件或現象的本質联系和規律性。因此，学生思维的发展是和注

意培养学生分析综合的能力相互联系着的。

首先，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或现象，进行正确的、深刻的分析和综合工作，有意识地使学生学习这种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以教师正确的思维影响学生的思维活动，逐步培养他们能从复杂的历史材料中，独立地进行分析综合并作出结论。

例如，高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编）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一节的主要目的任务，是阐明“中国工人阶级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第一步就应在概述中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一般优点和独有的特点。在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之后，就要把这些特点综合起来系统起来，并得出结论：中国工人阶级固有的特点，规定了它的进步性、革命意志的坚强性、斗争力量的集中性和广泛性等。当它有了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共产党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是任何其他阶级都担负不起的。

其次，归纳的方法，也是发展学生思维的途径之一。在学生已经基本上理解了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教师是可以引导学生归纳概括得出结论的。这样，学生就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通过独立思考自觉地掌握知识。叶菲莫夫在“近代世界史教学法”一书中说：“归纳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方法可以培养学生进行概括的能力，使学生通晓已经被我们研究好的思想成就，同时使学生觉得仿佛自己是在积极地参与科学的发明，虽然这些发明是早就被别人做好的。应用归纳法可以发展学生创造性的思维。”^①

例如，讲授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课本第八章第一节“空想社会主义”，首先应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名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所处的时代、地点和条件的具体史实出发，分析所以产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提。接着就要分别阐述这三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主张。最后，引导学生根据已经理解了的关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前提和具体内容的知识，归纳概括得出结论。这个概括过程，就是从已经讲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条件和三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内容中，抛弃次要的个别的特征（如他们的不同出身和从不同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等），抽出主要的本质的共同的特征（如都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都否认阶级斗争等），并加以引伸和系统化，

揭示这种社会思想的内在规律性和历史意义。从认识活动方面看，就是离开具体材料上升到抽象概念的过程。也许学生不能立刻就得出系统的完善的结论。应该认识这是一个锻炼和学习的过程，正是要通过这个过程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如果学生所得出的结论和概括不够完善，教师应设法加以补充和修正，这对学生思维的发展不但有所帮助，同时也可使正确的结论在学生记忆中巩固下来。

再次，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方法，也是发展学生思维不可缺少的手段。比较是一种思维活动，它能认识历史事件或现象之间的异同或差别，不仅是理解教材的重要因素，而且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揭示概念内容，促进历史知识的系统化。乌申斯基说：“……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要通过比较来认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如果我们设想一种既不能用什么东西来和它相比较，也不能用什么东西来和它相区别的新对象……那么我们就不能构成关于这个对象的一点思想，也不能说出关于它的一个字来，比较在人的整个理解过程中的这种重要情况指明了，在教学方法中比较应当是一种基本的方法。”^②

历史科学的对象主要是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总和，它的发展都是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因此，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法对于学生掌握知识和发展思维，更有重要的作用。比较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同类历史现象的比较，如古代东方奴隶制和希腊罗马奴隶制的比较；有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对立方面的比较，如战争双方的某些问题的比较；也有一般历史现象和特殊历史现象的比较，如一般帝国主义的特征和个别帝国主义国家特征的比较；也有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历史现象的比较等等。

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八章第二节“从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蒋介石集团的动摇，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发表”一课，主要是讲明徐州失守前后，“亡国论”和“速胜论”者大肆叫嚣，很有碍于抗战的进行，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发表之后，就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者的荒谬论调，科学地指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前途，大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为阐明这个问题，可以根据“论持久战”一书的基本精神，作如下的比较：首先让学生弄清敌我作战双方——日本和中

① 叶菲莫夫主编：“近代世界史教学法”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第51页。

② 转引自符·阿·阿尔捷莫夫著、赵壁如译：“心理学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第90页。

国的特点。指出日本的长处只是战争力量（包括兵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强于我，而其短处则有三个，一是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退步的和野蛮的；二是国小人少，人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三是国际上的寡助。我国虽然有战争力量比较薄弱的短处，但其长处则很多。其一，战争的性质是进步的和正义的，我国有比任何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其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其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其三，由于战争的进步性质，能够得到国际力量的援助和支持。在学生弄清楚这些特点之后，再把敌我的特点加以比较，就可以使学生得出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敌人灭亡中国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有许多不利条件，而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我们也不可能速胜，因为敌人的战争力量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暂时还是强大的，我们还处于劣势的地位。可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形势会发生变化，敌人的短处会逐渐发展，而削弱了他的长处；我们的长处却会逐渐发挥作用，能弥补短处的不足，力量逐渐强大，最后战胜敌人。因此，中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亡国”和“速胜”等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通过这个结论，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一光辉著作的伟大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

三

心理学告诉我们，当学生明确地知道要他完成某种学习任务时，思维才会积极活动起来。学生为渴求完成一定学习任务而进行深入探究活动，是思维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思维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问题就是知和无知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是以知克服了无知，向学生提出问题就是揭示学生知与无知的矛盾。因此，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思维活动的过程。学生遇到问题，就会积极思考，寻求解决的途径。例如教学第二国际的历史时，会讲到自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猖獗的问题。但是究竟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学生不了解，这就是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的知与无知的矛盾；教师及时地向学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引导学生发现这个矛盾；到这个问题被学生充分地理解了，矛盾才算解决。因此历史教学中，以灵活的方式，及时地正确地向学生提出些问题是必要的。

当引入新课后，一般可以向学生简明地提出该课题的基本学习任务，使他们明确知道在该堂课中应该

了解哪些问题，引起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兴趣和希望获得解决的要求，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上，同时也给学生指出了应该遵循什么线索，才能有目的地展开思维活动的道路。例如教学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一章，当从已有知识引入该课题之后，就可向学生指出学习本课主要应掌握如下几点：（一）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它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的？（二）工业革命进行的基本过程是怎样的？（三）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

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教师应该灵活地运用谈话法，谈话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可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进行启发式的谈话，使学生自觉地接受新知识，并引出新的结论来，这种谈话常带有复习的性质。比如教学世界近代现代史“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一章，大纲要求三课时授完，最后一课时就可考虑采取上述谈话方式进行。可以提出如下十个有逻辑联系的问题进行师生之间的谈话。

（一）什么原因促成“普法战争”的爆发？

（二）“色当战役”后普法战争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

（三）说明1870年九月四日革命后所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阶级性质。

（四）举出“临时政府”（国防政府）的叛国罪行。

（五）1871年三月十八日的革命是怎样爆发的？

（六）“巴黎公社”是什么性质的政权？

（七）公社主要实行了哪些社会经济政策？

（八）凡尔赛政府和公社政权能够长期共存吗？为什么？

（九）公社和凡尔赛政府斗争的经过和结果如何？

（十）公社虽然失败，但它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前七个问题是复习旧知识，谈话内容应尽量概括，时间应尽量缩短。在复习前七个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第八个问题，过渡到新知识的讲授。最后两个问题可以边启发边讲述，并以公社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作为本课的结束。

有时，在讲课中可插入启发性的谈话。所提问题并非都要求学生回答，有些问题可采用教师自问自答的形式，或用不把问题完全揭示出来，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的方法来引起学生的求知欲。以谈话形式传授新知识的方法，也可叫作边提问边启发边讲授的方法。总之，运用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寻求

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引導他們開展思維活動。但所提問題必須是較重要的，確實能啓發學生積極思維的，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能起聯繫前後史實的關鍵性問題，有必要進行深刻分析以揭露實質的問題或促進知識系統化的問題等等。前面所提“英國工業革命的開始”一節綫索中的第三個問題，若在講課中間提出來進行談話，就屬於這種形式的。

講課中，教師應有意識地喚起學生回憶和思考與新知識有聯繫的舊知識，利用已有知識理解新的歷史事件或現象，把學生已知和未知之間架起一道橋樑，這不但能使知覺和思維積極化，並能幫助學生透徹地理解新知識和保證知識的系統性，因為新舊知識相互聯結的過程是在思維中進行的。例如講“法蘭西第二帝國”時，就可啓發學生追溯“第一帝國”曾在什麼時候存在過，第一帝國崩潰後法國曾有哪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變革等問題。這個追溯過程就是喚起學生積極思維的過程。不用思考，這種聯繫是很難建立的。

四

思維的發展是和語言直接聯繫着的，語言是表達思維的工具，在語言之外，思維是不存在的。在歷史教學中，語言對學生的掌握知識和思維發展更有特殊的作用，因為要把學生所不能感知的大量歷史事實教給學生，只有凭借語言。

歷史教師的語言應具有以下的基本特點。第一，具體而明白易懂，準確而有表現力，避免空洞的說教。只有這樣，才能具體地再現過去歷史現象或人物的形象和真實面貌，強烈地影響和感染學生。第二，嚴密的邏輯系統性和誘導力，令人信服的結論和概括。遵循歷史發展固有的特點，以有嚴密邏輯性並合乎語法結構的語言，啓發學生積極思考尋求問題的結論。第三，使用直觀教具時，教師的語言必須和直觀教具的演示密切結合，用語言指導學生的觀察。第四，表述的明確性。歷史上充滿了進步與落後，壓迫與反壓迫，革命與反動等各方面的鬥爭，如果對思想內容的表述不明確，它是对教材理解不透和認識不清的反映，必然會影響學生對歷史知識的理解和正確地思維。

歷史教師這些語言特點，是相互聯繫並以教材內容性質和學生實際為轉移的。如有關事件過程或人物形象的教材，就應用敘述或描述的語言形式；有關基本理論的闡明，就應用別的語言形式，但是也不可能

截然劃分。總之，“善於清楚地、鮮明地、有說服力地發表自己的思想是優良教師的基本品質之一”^①。

以教師的語言影響學生的思維發展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同時還要注意培養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對教材的理解，是明白表達教材的主要條件，也是思維發展的表現。系統地進行提問，是歷史課培養學生語言能力的重要方法。提問的方式很多，但無論採用什麼方式，提問的內容和要求必須正確。蘇聯歷史教師們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參考的。柯羅甫金說：“提問就是教會學生全面闡明歷史課題。學生在闡述任何歷史現象時，首先應當說明這個歷史現象的前提條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指出這個歷史現象發生的年代，或這個現象發展的各個階段的年代，確定這個歷史現象在地理上的範疇。以結論，對現象的評價，指出現象的意義和結果來結束自己的講述。”^②類似這樣的回答，才是發展學生邏輯思維和語言能力的實際練習。不過這只是總的原則要求，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對某一學生回答某一問題的要求，自然不能包括上述所有部分，需要根據具體內容和對象來考慮，是不能千篇一律的。

五

發展學生思維的問題，是歷史教學中的中心問題之一。學生的掌握知識，思維和語言的發展，認識能力的提高，是在統一的教學過程中實現的。因此，在歷史教學中啓發學生的積極思維問題，不能單純地從某一方面去考慮，應把整個教學過程的各个方面、思維活動的過程和特點、歷史學科所獨有的特點結合起來全面考慮，它包括教師的教學活動也包括學生的學習活動，包括教材內容也包括教學方法；它是在教師的領導下和在學生的積極參加下，通過掌握知識和運用知識的過程實現的。

以上所談是一般的原則和方法，在具體教學中還應根據各方面的主客觀條件，如學生年齡和知識水平的增長，思維發展的程度，具體的歷史教材內容以及教師的主觀因素等來考慮，然後才能確定採取什麼具體的適當的方法。

① “蘇維埃教師心理概論”，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81頁。

② 費·彼·柯羅甫金：“蘇聯中學高年級歷史課提問教學法”，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9頁。

我怎样依据教学大纲讲授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

哈尔滨第一中学 刘 瑜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特别是大纲的说明部分,对我们掌握每节课的教学目的和改进教学方法,有很多启发性的指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具体的实际的教学问题。在这里,我拟以高中中国历史第一册第六章第二节“各国的变法”的教学为例,来说明我学习大纲的一点体会。

(一) 关于教学目的确定。

第六章讲战国时期的历史。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开始,但它也是夏商西周春秋历史的继续。那么,从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什么呢?大纲启示我们应该从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农村公社的发生发展和崩溃去认识。在大纲的说明中写道:“大纲的第二部分包括我国奴隶占有制社会的历史。……氏族公社逐渐转化为农村公社。……贵族控制了村社。……在村社农民和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商的生产事业和文化发展了。……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区域普遍地存在着农村公社。春秋时期,由于铁农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发展起来。……村社土地所有制破坏了。土地的私人占有为封建剥削关系的发生准备了条件。……”并要求教师使学生理解:“我国的奴隶占有制社会里,农村公社普遍存在,奴隶劳动在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里不占重要地位。”在谈到大纲的第三部分时又指出:“生产事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农村公社进一步瓦解,土地被私人占有。”从上面这些说明可以看出,农村公社在我国全部奴隶占有制社会历史中始终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战国时期的历史就是从这个基础的动摇开始的。教科书对村社的记载不够明确,大纲则系统地阐明了有关村社的问题。根据大纲的提示,就使我们对各国的变法运动的实质有了探讨的线索。

从哪里着手分析各国变法运动的实质呢?大纲的说明中有一段话很扼要地指出“变法运动为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决定,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分析变法运动实质的出发点。

根据大纲所指出的线索和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对“各国的变法”一课教材作了如下的分析:

大纲的说明指出“变法运动为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决定”,那么,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时期是否奴隶制经济已经发生危机而封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呢?根据大纲指示和教材内容来看,我国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社会经济的根本变化,不是在事实上仅居次要地位的奴隶经济发生了变化,而是作为奴隶制生产基础的农村公社发生了变化——村社土地所有制转化为私人土地占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说明封建经济已充分发展了呢?大纲指出:“土地私人占有为封建剥削关系的发生准备了条件。”再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就使我理解到新的封建因素(如战国时的封君就是地主)是发生了,但还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够证明在变法前封建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方式,已经显示出它比奴隶制更为优越。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变法呢?大纲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战国时期冶铁事业的发展,铁农具使用的比较普遍,水利事业的兴修,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手工业也在多方面发展起来。……生产事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农村公社进一步瓦解,土地被私人占有。一向控制村社的贵族逐渐没落,有些贵族占夺了大量土地,掌握了国家权力。没落贵族和村社的上层分子从村社里游离出来,成为游士,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国家直接控制农民,向农民征收租赋,贵族的采邑逐渐消灭,国家设置了郡县。国家的政权机构里逐渐任用游士作官吏,世卿制就为官僚制所代替。这样中央集权的政治出现了。在战国时期,各国展开了变法运动。……”这就是说,变法运动是在普遍使用铁农具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农村公社进一步瓦解、土地转化为私人占有的情况下发生的。

变法运动又怎样“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呢?根据商鞅变法的内容来分析,其中主要的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人占有的事实,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力量,对已经发生的封建因素的逐渐成长创立了最有利的前提,这既符合地主的利益,也符合了农民的利益。特别是“鼓励农民耕田织帛”,更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土地兼并程度日益

加深,但在生产力突飞猛进、出现了进步的封建剥削关系的当时,新的土地占有者采用奴隶劳动的可能性是愈来愈小了。同时,变法以后的秦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从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势力,在客观上维护了新兴势力(主要指土地占有者),更加速了封建因素逐渐成长趋势。所以变法的結果,不是消灭了奴隶制,也不等于封建制的确立,正如教科書所說的,而是“給封建經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主要环节。

以上分析虽不成熟,但使我理解了本课题在全部教材中的地位,掌握了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我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向学生讲清楚我国封建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和中国的历史发展在符合一般规律的情况下所走的自己的特殊道路。阐明本课题中最本质的东西——“变法的社会背景和变法意义”,对于使学生逐渐弄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能起一定的作用的。根据以上的理解,最后确定了这一课题的教学目的:

(1) 使学生認識战国时期土地私人占有和自由买卖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是各国变法运动的基础。

(2) 通过对各国变法运动,特别是对商鞅变法成功的理解,認識变法运动怎样給封建經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阐明本质問題必須通过具体史实的講授,而商鞅变法正如大綱的說明所說,“集中地反映了变法运动的实质”,因此就被确定为这一课题的教学重点。

(二) 关于教学方法的改进。

我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是在大綱所提示的基本教学原则指导之下,从教学目的、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三方面进行考虑的。教学目的已經明确了,为了貫徹目的,我就分析一下教材中哪些是基本部分和次要部分,哪些内容比较容易被学生接受或不容易接受,然后再看高二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旧有基础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等。我对“各国的变法”这一課的教法是这样确定的:

课题的第一小节“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是說明各国变法的社会背景。内容虽然龐杂,脈絡却很清楚,就是圍繞农村公社瓦解、土地被私人占有來說明战国时期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各国的变法运动。学生对理解这一問題,是有基础的。因为在学习第四章“春秋”时,对农村公社瓦解、土地被私人占有导致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已有了明晰的概念。小节中的三个要点,也都有旧知識作基础,如国君权力的加强与奴隶主贵族的没落,是春秋时期大国爭霸的結果;士的政治活动所要

阐明的“士”和“封君”的問題,正好运用学生从語文課“庄暴見孟子”和“信陵君列傳”兩篇文章中所学到的一些知識;关于农民的贫困破产,也有“爭霸战争里的人民生活”一小节的已有知識。我想,如果能很好地把握住“农村公社瓦解土地被私人占有”这一中心綫索,系統地运用旧知識,采取談話的方式引导学生去理解新課内容,使学生自觉地得出非变法不可的結論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课题的第二小节“商鞅变法”是教材的最基本部分。教科書中所列的五項条文比較呆板,学生比較难于接受,同时新教材与学生在初中所学的論点又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怎样才能使学生掌握商鞅变法的要点,并正确地理解变法何以会为封建經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需要仔細地考虑,簡單抽象地論述不能滿足高二学生的要求。經過分析,我發現商鞅这个历史人物有着动人的斗争事迹,引用一些有关他的具体材料,就可以使課講得生动些。五項条文集中地反映了經濟和政治(包括軍事)兩個方面的变法措施,經過簡化就比較容易使学生掌握,这一段可以采用叙述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对于变法意义,是在透徹講解变法内容的基礎上寻求結論,可采用討論的方式,啓发他們積極思惟,来共同进行分析。对討論中可能发生的細节問題,我也作了估計和准备。下面談一下我在課堂上的进行情况。

上課开始,我向學生提問兩個問題:

(1) 从什么地方看出战国时期的經濟比春秋时期发展得多了?

(2) 春秋时期經濟发展的結果引起社会发生哪些变化?为什么?

从总结提問轉入课题,用談話法引导学生認識各国必然要实行变法以后,接着概述各国变法的一般情况,然后詳細叙述商鞅变法的經過。先講商鞅是什么样的人,入秦后怎样促使孝公接受变法意見,何时开始变法,变法前夕怎样用在城門口懸賞移木的办法換取群众的信任等等,接着就引导学生接触反映变法内容的主要条文。叫学生翻開課本,然后逐条朗讀并講解。

先讓一个学生讀第一項,由教师詳細講解其中心内容,并說明为什么要这样規定,这对誰有利或不利,会引起什么后果(講解时結合課本插图)。講完第一項,再召喚兩個学生分別讀二、三項和四、五項,教师逐項講解。全部講完,就把条文内容归納为經濟的和政治的兩個方面,指出二者的关系,并說明这是春秋以来經濟政治变化的結果。接着教师指出变法既然标志着新舊的轉变,必然有矛盾有斗争,并补充太子反对迁都和太子老师受处分,孝公死后商鞅被



問 法兰克宮相查理·馬泰爾改革的主要內容如何？

答：从公元六世紀起，法蘭克王國經歷着深刻的社會變化：一方面是農村公社自由農民的日益破產而趨向於農奴化，他方面是貴族封建主的勢力愈益增長。這一變化的政治

後果是大領地貴族日益跋扈而趨向於政治上的分裂。結果，在六世紀中葉法蘭克王國分裂為三——紐斯的里亞、奧斯達拉西亞與勃艮第。而王權在這以後逐漸轉入大貴族宮庭主管宮相之手。這時，在各領地貴族之間爭奪統一的政治領導權的鬥爭日趨劇烈。687年，奧斯達拉西亞宮相海斯陶爾·丕平成為全法蘭克王國的統一宮相。在他的繼承者查理·馬泰爾時期（715—741年），曾力求鞏固他的政權。他的改革即是其鞏固政權的重要措施。

在六至七世紀時，作為法蘭克人武裝力量的基礎的，主要是由自由農民組成的民軍。這時，由於依附農民（即農奴）階級之形成和自由農民經濟狀況之日漸惡化，他們已沒有在民軍中服役所需的財力了。另一方面，查理·馬泰爾在反阿拉伯人的鬥爭中，在對萊因河東岸諸部落、對普洛文斯等地之討伐戰中，逐漸顯露了他的由騎兵組成的親兵的作用。查理·馬泰爾為組成一支龐大的職業軍人，創立了“軍事采邑”制度。這就是以服騎兵兵役為條件而恩賜的終身領地。在這以前，墨洛溫王朝所實行的則是完全私有土地之賜予，現在的“采邑”則不得世襲。如果采邑的承受者去世而繼承人想繼承采邑，或者封建主死后采邑承受人仍欲享有采邑，則都需重新封賜。受封者如不履行義務（例如服兵役），或者采邑承受人經濟破產，則采邑均須收回。自然這一慣例並未永久繼續下去，在九至十世紀以後，便被取消了。

采邑土地之主要來源是國家土地，即因反叛而被沒收的貴族領主的土地及部分教會的土地。

在實行軍事采邑制度的同時，他還規定了对自由

車裂的故事來說明。最後以商鞅雖死但新法已經實行來轉到討論實行新法的重要意義上去。

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各國的變法，主要是商鞅變法的成功對當時社會發生了哪些巨大影響。由學生自由舉手回答。先要求學生得出一般的簡要結論，然後再從中抽出“土地私人占有和自由買賣為什麼會引起封建剝削關係繼續發生發展起來，而沒有引起奴隸制的繼續發展”這一問題引導學生作深入的討論。課堂里很活躍。學生對變法與秦統一中國的關係說得很透，但對沒有引起奴隸制繼續發展則說不出充足的理由，

農民的領主保護制度。這就是在自由農民“需要”保護的時候，可請求領主保護。對於這種保護互相約定在戰時向領主效忠，盡臣下之職。這種制度之樹立，實際為封建主掠奪和奴役自由農民開了方便之門。

查理·馬泰爾的改革的社會政治後果是很大的。首先由於廣泛的采邑封賜大大地加強了查理·馬泰爾政權的武裝力量的基礎。這使他以及他的繼承者在一個相當長的历史時期內保持了法蘭克王國的政治統一，並進而形成後來的查理曼帝國。

其次，這一改革，由於封賜土地的結果，大大地增加了中等地主階級的数量，構成後來的騎士階層，他們在正式領主階級之中，雖然居于最下層，但却是数量最多的階層。後來在領主階級內部的鬥爭中，他們往往成為王權的支持者。

第三，由於采邑封賜制度的確立，固定了領主與附庸間的權利義務。它不僅確定了封主與封臣之間的從屬關係，並且賦予這種關係以法權的形式，從而確立了封建社會的封建等級制度，使封建關係更具有“完備”的形態。

最後，基於大量土地封賜的結果，不可避免地使定居於采邑上的居民——已淪為依附地位的農民，成為這些封臣的貢納者——以徭役或代役租形態所付出的地租，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農民農奴化的過程。封建制度的基礎進一步完備和鞏固起來。

總之，查理·馬泰爾的改革，在封建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是具有積極意義的。這一改革，一方面加強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一方面確立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基礎，並在一定時期之內使王權加強起來。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查理·馬泰爾的繼承者——查理曼在後來創立了西歐空前的封建大帝國。但是由於領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發展的結果，這一改革的政治後果就轉化為它的對立物。這就是由於伴隨著封建制度的形成與農民反農奴化鬥爭的發展，地方領主基於對農民實行直接強力統治的需要，在查理曼以後，統一的封建帝國，迅速分裂為政治上分散的封建國家。（程丁）

經過一些啟發才初步弄清。最後教師用一些時間總結說明變法後奴隸制與封建制是同時並存的，但是後者卻在生產發展過程中很快地取得了主導地位，因此說，經過戰國時期的各國變法，我國開始走上封建化的道路，而戰國時期就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起點。對於變法的性質和對商鞅的評價只作了簡要說明，沒有再討論的必要了。

總之，我講這堂課從確定教學目的到課堂實踐，都是在大綱指導下進行的，因之教學效果較好，使我体会到認真鑽研教學大綱對提高教學質量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教学”第十四卷(一九五七年七—十二月号)目录索引

(一) 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坚决维护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 遵循

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社论)..... (11, 2)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 如潜(11, 6)

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傅容(11, 14)

人类历史的胜利..... 邓初民(11, 22)

为保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而奋斗

斗..... 杨文甫(11, 25)

坚决地、自觉地、向苏联历史科学学习..... 郑天挺(11, 27)

× × × ×

光荣的三十年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 黄涛(8, 2)

(二)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

历史教师们, 积极投入伟大的反右派斗争

的革命行列中来!(社论)..... (9, 2)

为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

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社论)..... (10, 2)

粉碎历史学界中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 吴廷璠(9, 5)

驳斥雷海宗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

谬论..... 陈乐素 邱汉生(9, 9)

揭露雷海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

..... 杨生茂(10, 5)

雷海宗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

的一些问题”一文的政治目的何在..... 魏宏运(10, 6)

从雷海宗的历史分期论和工具决定论来看

他的反动政治目的..... 祝瑞开(11, 29)

中学教师质问雷海宗反动谬论的来信..... (9, 13)

我们愤怒地声讨历史教师中的败类、资产

阶级右派分子罗海沙、黄心平的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言行!

..... 北京实验中学历史教研组(9, 11)

揭发披着历史教师外衣的右派分子黄心平的

反动言行..... 天津第三女中薛玉清等(9, 12)

天津科学界对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右派分子

雷海宗展开斗争..... (9, 15)

披着史学家外衣的老牌右派分子雷海宗的

反动面目被进一步揭穿..... (10, 7)

京津史学界对右派分子向达、雷海宗、

荣孟源、陈梦家展开斗争..... (10, 32)

(三) 教学参考

商鞅变法与西方秦国以及秦汉统一帝国

封建制的成长..... 叶玉华(12, 2)

两汉时代的手工业..... 曾庸(7, 19)

唐宋时代的造船业..... 冯汉鏞(10, 10)

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 方 棣(9, 17)

金田起义前广西的农民起义..... 梁任葆(10, 14)

试论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及其反动的本质..... 马汝珩(8, 7)

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 王炳义(10, 18)

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

态度和活动..... 何若韵(9, 25)

从烟禁看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 唐垂裕(12, 9)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斗争路线..... 譚双泉(7, 23)

二十年前的蘆溝橋事變..... 何 壽(7, 30)

談談古代东方专制国家..... 日 知(9, 30)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的奴隶起义对

罗马社会的影响..... 刘文鹏(11, 33)

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度..... 齐思和(7, 33)

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的土地政策..... 魏 越(9, 34)

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A·H·克拉辛(10, 29)

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

..... 陈翰笙(12, 14)

1857年的民族起义..... [印] 阿约艾·高 士(8, 13)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历史..... 吴世璠(12, 19)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发展

的特点与德国帝国主义的特征..... 关勋夏(8, 15)

采取武装起义方针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 [苏] 克里穆舍夫(11, 37)

1946年的印度海军起义..... 彭树智(10, 23)

· 资 料 ·

我国对时辰鐘的發明和制造..... 賈敬顏(8, 29)

明代初期西北七衛的設置..... 賴家慶(8, 30)

湘軍——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反动地主

武装..... 景 珩(9, 43)

德国人在中国..... 朱士嘉譯注(8, 2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

和进步报刊简介..... 文 琪(12, 24)

記1930年九月中国工农紅軍解放吉安城

..... 江西吉安高中历史教研组(12, 30)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选輯(一)(二)(三)(四)..... 耿淡如等

(8, 27; 9, 39; 10, 34; 12, 32)

中苏关系史上的新文献..... [苏] A·H·布洛依娜(12, 35)

(四) 讀史參考

讀史与古汉语知識..... 姜亮夫(7, 48)

(五) 教學問題

- 关于精簡1957年秋季初三、高一和高二历史教材的几点說明……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編輯室(9、46)
- 关于繼續學習貫徹历史教學大綱改进教學的几点意見……湖北省教育廳教研室(12、40)
- 河北省中等學校历史教學情况及今后改进意見……河北省教育廳教研室(12、43)
- 我对鑽研教材的中心內容和中心思想的体会……辽宁实验中学 張紹庭(10、37)
- 加强直观性改进历史教學的体会……西安第十中学 劉海濱(11、55)
- 試談历史教學中發展思维問題……劉方义(12、48)
- 我怎样在历史課堂教學中运用談話法和进行复習提問……重慶四十一中学 饒裕德(11、50)
- 历史課怎样適應学生年齡特征进行教學……北京第八女中 朱仲玉(10、43)
- 怎样巩固学生的历史知識……蘭州二中历史教研組(10、37)
- 漫談历史知識的巩固問題……健平(11、48)
- 我怎样依据教學大綱講授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哈爾濱第一中学 劉瑜(12、52)
- 我对“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課的教學准备……長春第八中学 关昭容(11、42)
- 笔談“改进中学历史教學”……(7、2; 8、33)
- 我对中学历史教學質量和教科書的看法和意見……鹽城中学 戴金平(9、48)
- 改进历史教學的初步体会……揚州中学 鈕均义(9、49)
- 对“改进中学历史教學”的意見……东北师大附中 張文生(9、51)
- 如何提高中学历史教師水平……上海育才中学 劉一鵬(10、45)
- 結合教學进行自修的体会 浙江瑞安中学 馬允倫(10、47)
- 我是这样进修的……湖南益陽一中 周雨初(10、48)

(六) 圖 片

中国历史參考圖片(31—36)

丁村人的牙齒和石器,伏羲女媧神像圖(七月号); 鄭州發現的商代文化遺存(城牆,帶釉硬陶尊,銅鬲,八月号); 周代青銅器的銘文(散氏盤,毛公鼎,九月号); 木俑,宴樂銅壺(十月号); 西漢的交通工具(軛車模型,木船模型的部分复原,十一月号); 漢画像石紡織圖; 唯物論者王充(十二月号)

世界历史參考圖片(18—23)

原始社会(尼安德塔人复原圖,旧石器时期穆斯卡文化的石器,新石器时期湖居民的工具,原始人的洞壁画——野牛,犀牛,七月号); 古代埃及(尼罗河泛滥时期的景象,皇后海特歌布苏特的紀念石碑,卡納克神庙前大道兩旁的石羊,第十九王朝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石像,八月号); 古代兩河流域(兩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彩陶,烏尔王国的祭塔,赫梯古碑,亞述王拿西拔二世石像,九月号); 古代印度(商賈地方的大塚塔婆的东門,卡里地方的石窟佛堂,耆那教廟堂大理石屋頂的内部,瓦德那卡地方印度教的石門,十月号); 爱琴文化(克里特島諾薩斯王宮的壁画,諾薩斯王宮,太林斯的壁画,克里特陶器,十一月号); 古代希腊(希腊古陶圖案,古希腊雕刻[少女],古希腊石棺上的浮雕:亚历山大战胜波斯圖,古希腊銅馬,十二月号)

(七) 問題解答

- 什么是会要?我們有哪些会要?其价值如何?……馬襄答(7、55)
-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农民的剝削是什么性質的剝削?……日知答(7、55)
- 古埃及自公元前3200年統一后,奴隶制为什么沒有高度發展?境内氏族制度的农村公社仍旧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日知答(9、54)
- 斯巴达的亞基斯和克利昂米尼改革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是什么?……丁名答(11、58)
- 西歐封建社会内“王国”“公国”的区别如何?“基輔俄罗斯”为何称为“基輔国”?……耿淡如答(7、56)
- 法蘭克宮相查理·馬泰尔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何?……程丁答(12、54)
- 英国航海條例的内容如何?英国頒佈航海條例的目的何在?它对英国历史的發展起了什么作用?……乔明順答(10、50)

(八) 其 他

- 史学論壇 •
- 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雷海宗(7、41)
- 文物介紹 •
- 安徽省新發現的太平天国几件文物的考釋 葛召棠(8、52)
- 略談汉代画像石及其史料价值……孙宗文(12、37)

世界歷史參考圖片(二十三)

古代希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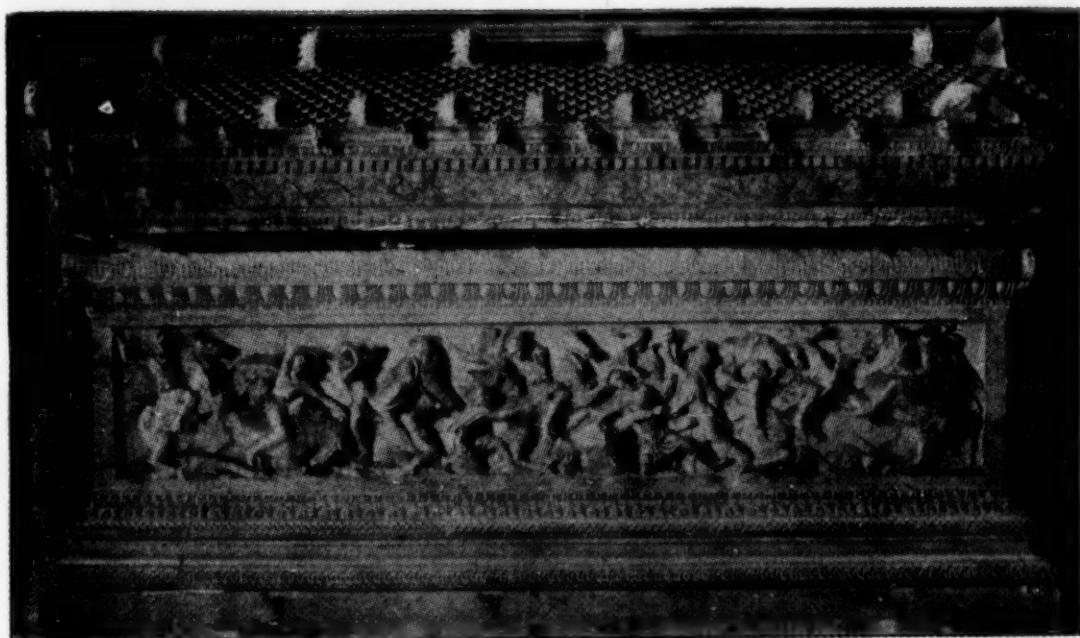
圖一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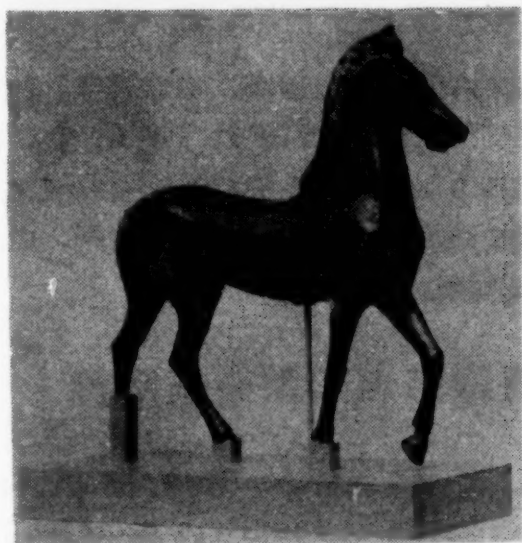


圖三



說明

圖四



圖一 希臘古陶圖案(公元前490年)。圖案表現古希臘人救護負傷武士情形。著名畫家攸弗朗尼作。采自利文斯頓:“希臘的遺產”頁227。

圖二 古希臘雕刻:少女。采自利文斯頓:“希臘的遺產”,頁362。

圖三 古希臘石棺上的浮雕:亞歷山大戰勝波斯圖。采自利文斯頓:“希臘的遺產”,頁371。

圖四 古希臘銅馬(公元前五世紀)。采自照片。

新書預告

中学高年級歷史課的復習（排印中） [苏] 列边格魯勃著 陈 玢譯

本書是为苏联历史教师所写的有关中学高年級历史課復習的参考書，对我国历史教师也很有参考价值。本書对于教师如何领导学生进行每堂課的復習、每課題結束或教材一章結束后的綜合復習、升級考試和畢業考試前的总復習，在理論上和方式方法上，都作了詳細的提示，对于教师如何准备復習計劃，如何編制復習提綱，如何确定復習重点，如何进行復習提問等，都結合实例作了全面而具体的闡述。

最近新書

山野的春天 [苏] 亞·阿夫捷因柯著 乃文、振江譯 1.50元

本書是“蒂沙河上”的第二部，在“蒂沙河上”一書中所述的間諜敗露后，美国的間諜机关又派出了自己得力的間諜潛入苏联外喀尔巴阡省，去調查前一批間諜敗露的原因，并策划炸毀苏联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極其重要的鐵路隧道。但是，这个間諜和他的助手，也沒有逃脫他們前輩所遭的命运。英勇机智的苏联国家保安机关工作人員，在群众的协助下，通过周密的調查和緊張复杂的斗争，最后將間諜又一網打尽。

地下城末日記 [苏] 卡里尼茨基著 田 怡譯 0.80元

北冰洋一个無名小島上有个从海下入口的“地下城”，这是当年希特勒設立的俘虜营，强迫各国俘虜在那里开采战略物資，战后，这个秘密的“地下城”为金元王国某金融巨头所接受，繼續讓俘虜們為他們做苦工。后来俘虜們在“地下城”起义，得到苏联探險队的援助安全脫險，重見天日。

敌占區偵察記 [苏] 欧·乔尔內著 高一清譯 0.26元

苏联衛国战争期間，一个年青的偵察員到敌占区去进行偵察，不幸被俘。他經受了种种殘酷的折磨后終於設法逃了出来，繼續进行偵察工作，获得了重要情报，但已身負重伤，难以返回了。司令部派出一批偵察員去將他找到，他們的归路却被敌人封鎖了。在这紧急的时刻，熟悉当地路徑的房东姑娘勇敢地將全部偵察員找回。由于获得了重要情报，苏軍展开了反攻，战綫很快向前推进了。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